

# 羊君衆

第十卷 第十八期

## 目 要

論文化界的「拒檢運動」(社論)

新時代的輪廓

論中蘇條約產生的背景及其意義

目前局勢和今後任務

美國共產黨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訓

如何處置漢奸資本

「民主」人

于懷

懷湘

美共中央決議

解放日報

韋中梁

洪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論文化界的「拯救運動」(六三〇)

新時代的輪廓

論中蘇條約產生的背景及其意義

如何處置漢奸資本

美國共產黨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訓

「民主」人

目前局勢和今後任務

世界職工大會的籌備工作

論科學預見(上)

問題討論

嚴懲漢奸與和平建國

排除民族的渣滓

晉察冀行進

租佃制度的調查研究

原子彈二題

極權主義的白日夢

復古論者的新裝

文 雜

(六三〇)

于 懷(六三一)

懷 湘(六三三)

章中梁(六四〇)

解放日報(六四三)

洪 深(六四五)

美共中央決議(六五一)

M·塔拉索夫  
以 紳 譯(六五六)

華西里也夫作  
凱 豐 譯(六五八)

公 敬(六六五)

辛 固(六六八)

周而復(六七二)

怡 然(六七六)

黎 望

(六六九)

(六七〇)



# 社論 論文化界的「拒檢運動」

最近十六個雜誌社（中山文化教育季刊、東方雜誌、憲政月刊、中學生、現代婦女等）在九月初集議自即日起，不再把原稿再送檢查，這個舉動立刻得到成都文化界的響應。成都十七個報紙、雜誌、通訊社也隨着決定了實行向檢止送檢的辦法，接續檢舉兩地其他雜誌和別的地方，也紛紛起而參加這「拒檢運動」。許多大學對於禁報一向也有檢查制度，現在這些報也開始停止送檢了。這個文化界中的拒檢運動又影響到了別的方面，工商業所組之四川復興協會在九月十三日開會，決議中有一項說：「就所有各界，應向新聞雜誌出版界自動停止送檢運動，對於一切戰時統制法規、捐稅、攤派，自動予以廢止」。

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民間運動。抗戰期間，在戰爭的藉口下，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蒙受了種種不合理的限制和束縛。其實中國的抗戰是一個民族解放戰爭，應該廣泛動員人民，使人民普遍地自動自願地參加戰爭。一切戰時的統制辦法在政治上只是造成了民意壟斷、民氣蕭條的現象，在文化上只是造成了這八年來中國的思想教育的停滯甚至倒退的結果；在經濟上更使民營企業萎縮，生產極度萎縮，而工商大業陷於無限困難狀態中。這種種限制、統治在戰時本已不合理，到了戰爭既已停止時，自然更沒有繼續保留的任何理由。國民政府在九月三日曾有命令說：「所有在抗戰期中頒佈之各種戰時法令，着各主管部會立即分別檢討，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時規範者，得先申請廢止，以期符合約法之精神，而作實施憲政之準備。」但自從這命令頒佈以後，已二十日，我們還并未聞當局正式宣佈廢止任何一種戰時的統制法令。

九月十一日當局頒佈國民政府中常會通過的「管理收復區報紙、通訊社、雜誌、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其中有一項說在收復區內仍暫實施「非常時期報紙通訊社管理辦法」，但到了十三日中央社發表更正說這條文應改為「依實際情形另定限制辦法」。查所謂「非常時期報紙通訊社管理辦法」是在民國三十二年公佈施行，完全是一種專制統制民間輿論的辦法，現在倘拿來行在收復區中，自然是極不合理的。譬如其中有一條說：「在人口五十萬以上之省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及其近郊地區，以報社五家，通訊社三家為原則，逾額得限制增設。」要是照這條文來做，那麼新收復的平津滬漢各地也都能限制到五家報社了，誰都知道，報社這樣做，那是異常荒唐的，因為這些城市無論在戰前或在戰中為保護經濟期間，向來都是有一二十家報紙的。現在在國策當局新訂的規章中硬已自動取消了實屬非常時期管制報社的明文，但這種管制辦法是否徹底廢除，仍未明白宣告。舉此一例，就可

知道，戰時對文化出版的統制，除了檢查制度外，還有許多不合理的法令規定等等，都是應該立即廢除的。

其他有礙人民自由的，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以及其他限制人民的結社集會的法令等，有關工商業的，如食鹽、素類的專賣條例，生絲羊毛的統購統銷的辦法，煤炭、土鐵的官理辦法，以至對技工人員的管制辦法，——這些也都是不應再繼續存在的了。工商業和一般人民，多年來忍受種種捐稅和攤派，雖明知其中有許多是不合理的，但因為戰時的大帽子，也就被壓得一聲大氣也不敢出。現在要再不廢人民說話是已不可能的了。

政府當局在這個抗戰結束，建國開始的關頭，應該有決心，有毅力對於一切應與應革之事，斷然執行，把對中國的一切壞現象澈底肅清，走向民主新中國的建立。但是一切依賴政府當局是不行的。我們常說，這是人民的世紀，那麼人民就應該負起責任，對於政府盡其提議、督促、協助之力。我們重慶各地文化出版界的自動拒檢運動和工商業的響應，這就表示中國人民已經開始積極地從實際上努力於推動國家的進步和民主化了。要知道，中國在戰後假如還保留着一切不合理的戰時統制辦法，那是中國的恥辱，也是全體人民的恥辱。人民自動起來，以行動表示態度，促成改變，這是人民的不可推諉的責任，也是神聖的權利。

我們更說這件事，又因為這里表現一種對於法治的新觀念的建立。人們常說，民主必須行法治，這話是可以說的，但問題是對於法治究如何了，假如按照對專制時代的傳統觀念，以為法是上面規定好了，下面無條件地遵從，那麼這所謂法治與民主毫無一點相通之處。民主的法是應該由人民的同意而決定，並且人民有權加以改變或廢止的。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人民要有創制權和複決權，說着中山先生是怎樣說的，他說：

「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制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交政府去執行修改的舊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複決權。」（民權主義第六講）

所以假如以為人民自動取消不合理的法令，是「與法無礙」的事，那麼就讀一讀孫中山先生的話吧。人民應該改變過去的不問是非，只管守舊的態度，主動地執行創制權和複決權；政府當局也應該尊重人民意見，根據人民的表示而決定法令的存廢和改革。那麼中國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民主的法治國家。



# 新時代的輪廓

于 懷

由於日本的投降，我們堅持了八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地結束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地結束了。

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了；過去了的是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到來的應該是民主進步的和平；我們目前正站在這和平建設的新時代的門口。

由於對日戰爭結束的突然性及其由此而產生的一連串的事件，不少人對於這正在到來的新時代不禁有些茫然，這種茫然的感覺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總不是健康的。

我們有一看這新時代的真面目的必要。

首先，從全世界方面說，這一次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使這世界起了怎樣重大而深遠的變化呢？這些變化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由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法西斯的暴政、奴役、與侵略在全世界的規模上消滅了。這就造成了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和平發展的先決條件。

自然，這不但是說，所有全世界的法西斯政權及其最後形跡都消滅了。不，如所周知，歐洲還有西班牙……；美洲還有阿根廷……；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政權的最後形跡都還沒有消滅；但從整個世界的規模看，法西斯主義的滅亡是已經確定了的，雖然肅清法西斯的殘餘還需要堅持的與嚴酷的鬥爭。

第二、由於德日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毀滅，直接地受着它們威脅的歐亞兩洲的民族自由了，這就形成了新民主主義在許多國家中發展與勝利的起點。

這不是說，現在已不再有人企圖運用各種方式來保存、復活以至代替舊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的地位了。不，作如此企圖者，還大有人在，但那企圖在覺醒了的和組織了的人民力量之前是到底不能成功的，雖然這一鬥爭將是非常曲折和迂迴。

第三、由於德日法西斯的毀滅，歐亞兩洲的這兩洲直接威脅蘇聯安全的中歐力量是消滅了。這就保障了全世界第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安全；並在反法西斯戰爭的過程中，使得全世界的政治形勢發生了一個基本的變化。歐

亞了這大戰爭，蘇聯已經變成了世界性的三大國列強之一，要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世界問題而沒有蘇聯參加的時代已無過去了。

自然，這不是說現在已經沒有人企圖公開與蘇聯的存在而面至陰謀反對蘇聯的人了，不，……的人還很多，但他們的力量在全世界的範圍內究竟

是削弱了。

第四、由於德日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毀滅，反動的獨占資本受到了世界性的打擊；反動的獨占資本在世界的統治力量是嚴重地和決定地削弱了。

但這並不是說，獨占資本在這次戰爭中不會在某些國家中獲得相當大的發展，但在世界規模上，那發展是充滿了深刻的矛盾，而且究竟不能補償它因德日帝國主義的失敗而遭受的嚴重的打擊的。

一般的說，這就是中國人民今天所遇到的世界新形勢。

必須進一步指出這有利條件在遠東出現的具體面貌，這更有些什麼改變呢？

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毀滅。不少人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消滅沒有在戰爭中受到普遍的毀滅的打擊；它在中國大陸所建立起來的吉爾林秩序很大的一部份，還是原封未動，從而擔心着日本這樣的投降並不是會幫助它在中國所經營的吉爾林，造成混亂，把中國拉回到戰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中去。

這種警惕是應該有的。但不必否認，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對於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偉大意義。一百年來中國人民的身上就背負着兩重任務——反帝和反對封建；五十年來所謂反帝的中心任務實際上就是反日，而如日本帝國主義終於投降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小心經營保存着的封建的反動力量可由於戰爭結束的突然性，在混水中保存了若干力量；但失敗總究是失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在長遠的意義上却是嚴重地打擊了中國的倒運力量。沒有日本帝國主義或明或暗的支持，五十年來中國的反動力量是不可想像保持着如此強固的地位的。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增台，遠東的局勢已到了在這一過程中，由於蘇聯的強大及其參加遠東戰爭，一個新的進步力量在遠東的政治舞台來了，這一舞台大轉機的事實是不會估計得過高的。英美有一批評論家把中蘇同盟條約的意義估計得與日本投降相等，這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這就說：從此以後，遠東任何重大問題解決可以沒有蘇聯參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蘇聯對遠東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發言權。所有這一些都包含在中蘇同盟條約中。有些人看見了中蘇條約而不干涉內政一條，就誤以為中蘇同盟條約對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意義是消極的。事實怎樣呢？一百年來，除了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時期與抗戰時期曾得到過外國的援助以外，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一直是依靠自力更生來進行，中蘇條約在這一方面並未減少任何毫末，相反，中國人民所受外國反動派的干涉，由於中蘇條約的簽訂，却多少受到影響，從而使中國民族的完全獨立得到幫助。

對於中國民族獨立平等的另一有利條件，就是在這次戰爭期間，英美對於中國的關係，最低限度在法律上，是變質了，這在一九四三年，英美同盟國家已宣佈了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美在法律上已廢立於不平等地位了。

自然，這不是說：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覆滅，中蘇條約的簽訂，以及中英美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中國在國際上平等的地位已經變成現實了。不，這還有，要得這平等獨立地位使法律條文變成事實，一方面主要地要看我們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要看英美等國對於中國的真誠政策。不是沒有少數個別的反動集團想藉身一體去代替日本帝國主義的地位，但關於上述各種情況的變化，特別是中蘇同盟的簽訂，這全國是不可不順利地加以慶祝的。

概括的說，這就是中國人民在今天所遇到的遠東新形勢。  
戰爭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中國。

戰後的中國是一個什麼面目決定於戰爭究竟是怎样進行過來的。在這種時候，我們首先不能不指出那在戰爭的全過程統戰階級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新中國人民力量成長。那就是：地區遍及十九省，人口及一萬萬以上

的中國解放區，它的民選政權，它的抗日部隊。

在戰爭中它曾經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堅，在和平時它最爭取民主進步在全中國實現的根據。有不少好心的人，因為看不到這力量發展對所有的階級，致使今日名目上投了黨的敵視高懸在中國人民的頭上而忽視了他們，這力量在實際上雖然不是全國的，但在性質上，它是全國性的力量。有些人想以復員之名否定這一新的力量存在的事實；他們忽視了，不管是否復員之名義，人民在戰爭中已經獲得的基本權利是絕不允許喪失的。鬥爭是複雜的，艱苦的，迂迴的，曲折的；但誰能否定這一力量和權力是在中國和平民主團結事業中的積極作用，是到底不能成功的。

八年來中國人民的鬥爭不但於滋結了一文爭取新民主主義進步在全中國實現的強有力的根據，而且解決了幾百年來中國所未能解決的實際問題：不僅解放區的力量是中國進步的根據，而且解放區的經驗和教訓是中國發展的方向，這方針是解決面對着全中國所有一切的重大的問題——這問題包含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重大問題。

戰爭改變了中國，戰爭教育了中國的人民，假使沒有這八年抗戰的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是絕不會這樣着清楚抗戰陣營中如此不同兩個陣營的：一方面流血和創傷，一方面是益滿和酒醉（塔夫托斯）這一句歷史家的名言，八年抗戰中中國人民不是已在全國的規模上看清楚這了嗎？只有經過這一種未死去的事實，我們才能了解為什麼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下，大後方的民主運動有那樣蓬勃而深廣的發展。中國的人民覺醒了。有人看見日本的突然投降，懷疑到這一切那的轉換是不是會模糊了人民的記憶；有些人是會懷疑的，但新定思慮，實際的問題接踵而來的時候，問題的本質是終於會呈現出來的，人民終於是覺醒了。

戰爭結束了，有些人想借復員之名，行復原之實。不可忽視：這一股復原的力量是相當強大的力量，戰勝它需要長期而複雜的鬥爭；但中國究竟是不能復原的，國際的條件變了，國內的關係變了；以上述的根據，指針和覺醒作基礎，在不倦的鬥爭中，中國人民是一定能把戰後的中國帶上和平民主團結的大路的。



# 論中蘇條約產生的背景及其意義

懷湘

八月十四日，中蘇兩國三十年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字，八月二十五日由中蘇兩國政府批准，正式公佈。這是在中國和在遠東國際關係中一件空前的偉大事業。第一、這是中國對外訂立的第一個友好同盟條約；第二、這不是為了取消一個不平等條約而訂立的條約，而是中國第一次真正以平等地位與他國訂立的同盟；第三、這不是一紙空文的友好條約，而是有實際的價值，以及互助助的精神，平等合作的方法，具體而有效的保障兩國安全，鞏固遠東和平，維持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這是在中國和在遠東的外交關係上劃時代的一件歷史大事。

這條約的訂立，毫無疑問，是為來保證徹底消滅遠東侵略禍首的日本法西斯的，是用來加強中蘇兩國戰時與戰後的合作，以防止日本法西斯的死灰復燃和再起侵略的；是用來加強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團結合作，以防止世界第三次大戰的爆發，維持世界和平安全的。

但是由於這條約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它在各方面造成了各式各樣的複雜反應：這條約對於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人民，是一個與東與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證，所以全中國以及全世界人民，是熱誠的歡迎和擁護這條約的；這條約對於中國以及世界有遠見政治家，是一個團結中美蘇英主要聯合國以防止侵略再起的新的因素，所以一切有遠見的政治家，對於這條約，表示着信心和勇氣；但是這條約對於日本法西斯以及一切侵略主義者、吉斯林份子、被法西斯宣傳腐敗的人們，却是雷大的打擊，它使得日

本法西斯及其同盟者破壞和平的陰謀不能得逞，它使得日本法西斯及其同盟者失去離間中蘇英法美結合作的機會，它使得日本法西斯趨於實力，趨於復興的企圖，受到意外的有力的阻礙。所以日本法西斯以及一切侵略主義者、吉斯林份子，對於這個條約極其如養之舌，盡一切伎倆污蔑挑撥破壞之能事。

日本法西斯及其同盟者要曲解中蘇同盟條約，企圖造成混亂的印象，是不足為怪的，重要的是許多不能徹底瞭解這條約意義的人們，在這種條約公佈出來的時候，曾一時感覺迷惑，不得要領的製出許多有害於中蘇兩國以至同盟國團結合作的謠言。

這些錯誤的意見大概是從兩種誤解來的：一是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只看成中蘇兩國之間的一個孤立的「交換」，認為條約的某些內容是蘇聯的「輸與」，條約的另一些內容是中國的一付與。二是忽視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主要內容及其作用，只看到條約的附件與附會，斤斤於所得與所失之爭。

前一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條約的主文已經說得明白，這不是一個共同的重製目標——對日本法西斯徹底打敗日本法西斯，防止日本侵略者再犯和加強兩國戰後合作，堅持合作的志願以維持世界和平——而訂立的條約，這是兩個國家對整個遠東以及世界的和平利益而努力的一種互助與合作，決不是兩個國家對單獨「交換」行為；後一種看法也是不對的。條約的主文是條約的基礎，是條約的目的與原則，附件是實現這目的與原則的手段而已。我們要真正認識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意義，必須從條約的本身及其產生條件的出發。

二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在一個重要的時機和一個新的世界形勢之下產生的。

一個重要的時機：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瀕於崩潰，但不是崩潰的。

我們知道，中蘇條約的談判開始於今年七月，但由於波茨坦舉行美英蘇三強領袖會議，使中蘇談判中斷了若干時日，直到八月七日宋子文王世杰氏飛到莫斯科，繼續進行條約的具體談判。其時，蘇聯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十日，日本侵略者向聯合國提出請求投降的條文，十一日，美國政府代表四大強國答覆日本的投降請求，日本却遲遲不覆，拖延到八月十四日纔決定投降。這時正是一個異常重大的時機：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拖延投降的時機，表明了日本的投降毫無誠意，表明了日本侵略者的內部對投降還有許多不決的態勢，表明了戰爭還有繼續的可能，尤其重要的是表明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利用拖延的時機，組織或轉移侵略的力量，佈置死灰復燃的陰謀。因此這是一個異常重大而且異常嚴重的時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蘇聯戰事到了一個決定的時刻：繼續或者終結，不徹底的解決敵人威懾的解決敵人。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頭，而同盟國方面事先却顯然是沒有充分準備的，首先是軍事上，由於蘇聯的參加戰爭，許多同盟國作戰的工作並沒有具體的規定和計劃；其次是在政治上，雖然有開羅會議宣言——波茨坦中蘇英三國聯合公告作為政治的基礎，蘇聯參戰首先就宣佈了參加中蘇英七月二十六日聯合公告，但是許多具體而必要解決的問題，例如如何徹底肅清日本戰爭罪惡，如何管制和佔領投降以後的日本，如何徹底消滅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日本侵略勢力，如何建立一個民主的日本，如何造成國際間強固的防禦體系，以防止日本的侵略再起，如何加強同盟國在遠東的團結合作——這一類問題，主要同盟國中蘇英，是事先不可能而隨事又來不及取得具體準備的。一如大家所知道的，歐洲戰爭的結束過程，是經過了同盟國會議到克里米亞會議——長年的準備階段的，在這些準備階段中，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了全部歐洲範圍以內的複雜問題，蘇美英三國都已經得到了具體的協議，作為進行作戰的基礎。即使是有了這樣一個細密而確定的協議，在實際進行的當中，還是經過許多曲折的道路。但是在遠東，一直臨到戰爭結束而後才開始，而主要的同盟國，事實上並沒有完成這樣一個政治的

準備。因此這是一個異常重大而且異常嚴重的時機。這是一個決定遠東戰爭與和平的時機，這是一個決定遠東以至世界和平的穩定與和平的久暫的時機。

同樣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產生於一個新的世界形勢和特殊的遠東局勢之下。

新的世界形勢，是主要的三個法西斯侵略國家，兩個（德意）已經完全被打倒了，剩下的一個也快要倒下來了。從一九三一年日本滿洲在遠東開始侵略，整個世界就進入戰爭的威脅之下，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正式揭幕，一九三九年歐洲戰爭爆發，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在東京進攻蘇聯，日本在太平洋進攻英美，全世界從此就沒有了一個區域不捲入戰爭的危險之中；遠東內部的戰爭，到今年八月，從遠東來說，已經進行了整整八年了，從世界範圍來說已經進行了整整六年了。到了今天，到了三個主要的法西斯侵略國家都已經倒下的時候，這種滿目的世界，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願意繼續進行殘酷的戰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不熱切地希望和平，要求和平。

這是一個普遍於全世界的要求，也就是世界的一個新形勢。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種形勢，就是法西斯被打倒了，卻並不等於法西斯的消滅，法西斯的餘孽和侵略思想，還殘留在世界各地陰謀活動，尤其是在遠東，是在剛剛倒下的日本；更不能忽視，世界規模的團結，雖已經在戰爭時期建立了基礎，但是還傳了戰爭並不等於贏得了和平，而和平的道路並不是一條沒有阻礙的康莊大道。如果說戰爭需要同盟國的團結合作，和平就更加需要同盟國的團結合作。這種團結合作，在世界和平上需要加強，在遠東的和平上尤其需要加強。因為遠東是在一個同盟國作戰告完成的時機，因為遠東的法西斯比歐洲的納粹更狡猾，因為中國是遠東同盟國團結合作的一個基礎，而中國更需要加強它本身的關係。作為遠東各國團結的基礎。

在這樣重大的時機和這樣一個世界和遠東的新形勢之下，處在中國和蘇聯——遠東最大的和最主要的兩個國家面前的，有三大緊急的任務：

- 一、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防止它的再起。
  - 二、鞏固同盟國在遠東的團結合作。
  - 三、中國國內必須和平民主團結。
- 如何來實現這三大任務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是實現這三大任務







總之是日法法西斯在這一時期的一場偽裝：他們偽裝和平，投降以後就口口聲聲切實履行波茨坦無條件投降的條款；投降以後從佔領區到日本本土都伏伏貼貼，儘可能不發生任何一件意外事件；投降以後，重光葵就說「日本人民早就在波茨坦宣佈出納，希望早停戰者大有人在」的妖言鬼話，而他是「二十年來，一直是堅信日本與中國及其他國家相安共處」（九月一日重光葵談話）的。日法法西斯不但偽裝和平，也偽裝民主。重光葵九月一日向中國記者談話，除開狂吹日本的愛好和平，就是狂吹日本「曾有民主化之生機」。在這一時期日法法西斯改組了內閣，但仍舊是換來一批戰爭罪犯；他們表面上解散了日本法西斯組織的「在軍人會」，但這些份子仍舊是好好組織着的；他們表面上取消限制言論自由的法令，但言論還是法西斯的禁制之下的；他們解散了法西斯政黨的太日本政治會，這些法西斯黨徒又換上彭福爾孔，準備化整為零，組織四個或更多的新政黨；他們召集了臨時國會，邀請會以「神風」全體鼓掌，而不准任何入發表表負責任的質問。

日本法西斯這一套和平與民主的偽裝是爲了一個目的，圖取盟國的同情，取得寬大的待遇；是爲了完成一個手段：掩蓋他組織失敗、佈置死灰復燃的陰謀。

他佈置了哪？在佈置着，而且佈置得復順利。從八月十日日本請求投降，遲延復遲延，一直延宕到九月二日纔正式簽訂降書；從八月二十七八美軍開始在日本本土登陸，遲延復遲延，一直延宕到九月九日美軍開進東京，而且佈置得進東京，日本的其他各地，至今還是「禁止旅行」的，美軍的行動也是按東得很好，據日本政府說，這是爲了免得發生意外。

一個戰敗的國家爲什麼有這許多延宕？沒有問題，日本法西斯是在利用這延宕的時間，佈置着一切復興工作。日本新首相東久通官登台之後，向全國發表的第一個文告，就是：「由於戰爭的結束，一切軍事和工業行將復原。我政府當局竭力保證國家的安全，並採取必要措施，使日本的重建是斷不容緩的。」東京廣播也有立即指出了森野教授演說，大喊：「戰爭對於日本是一種真正的洗禮，我們現在必須從新的基礎上開始。」他們這個「重建」，這個「從新的基礎上開始」，包含了什麼一些項目呢？合衆社替他們開了一個清單：

- ① 建設一切可能的原型軍備到深處的井裡及岩內。
- ② 儘可能最大範圍解散正規軍、後備役，這樣使盟軍在日本本土只能找到少數正規軍。

③ 把過去集中的日本兵工廠中儘可能大量的五金分給國內人民，對盟軍沒收原料。

④ 迅速地把重工業轉成輕工業。

⑤ 迅速解散一個政府而分成四個新黨。

⑥ 迅速撤除沿岸工業，重慶島上糧食，惟恐盟軍沒收沿岸及島上巨型大砲。

⑦ 入皇與日本政府竭力規勸人民保持遵守波茨坦宣言，以便盟軍佔領期間儘可能最速程度。

⑧ 自主主要城市分散人民到小的區域，惟恐盟軍就命令壯年人從事勞動。

⑨ 急進組織地下組織，準備將來行動。

⑩ 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策劃第三次世界大戰，使日本重新成爲世界強國。

不僅如此，而且迄今爲止，日本法西斯還保全了一個完整的政府機構，來執行這一套埋藏和佈置的工作，日皇口中的一帝國機構，東京港口中的「團體」與「政黨」，正是執行這一套計劃的機構。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八月十一日）後的一星期，東京每日新聞竟不自禁，按捺不住的說出來了：「我們已經保持了一件珍貴的事物；就是我們那建築在皇上的國家機構。」這個機構有什麼好處呢？他說：「過去的歷史指明，頑固的或國家的災難，仍然可以引導這個國家或國家定入勝利之路，並帶來新生，可以復興。」

日本法西斯的這一套安排，可無疑問，對於遠東的未來和平是一個不確估計的威脅。但是它的危險還不僅僅是在日本法西斯陰謀詭計的一方面，而且是在容許他這種陰謀活動的另一方面。

首先是在太平洋中容許了敵人的盟軍，對於日本法西斯，在思想上要敵如友的寬容；寬容到神士國家的士兵「對於盟國日人頗而，不採取嚴厲行動的指令，認爲殊屬不無。」（美國廣播公司廣播六月廣播）；寬容到日本本土的佔領軍，只是在日本政府同意之下逐步佔領；寬容到許多從東京與中國收復區拍回來的官方電報與寄回來的通訊，滿紙憤源，於日本人「感念戰爭」，說日本入「明察長嘆」，說日本人「衣裝整頓」，說日本人「莊重且並非傲慢」，「顯具其決其熱性格」。這些時不時的盟國人的措辭，一而再之，是寬容到同情和愛護日本法西斯。這真不能不使我們想到，公開稱頌日本人爲「我們的忠實朋友」（杜魯門），這不能算是最高的寬容。當重光葵在東京高談「日本必須與中國及其他國家相安共處」的時候，在上海復刊的官報，就已經在大唱「自日本投降以來，中日兩國已成兄弟之邦」了（正言報社論）。

有什麼思想，說有什麼行動。在行動上，允許一個不用任何解釋就可以斷定是日法法西斯組織的政府機構殘存存在，這不算；允許日本的主要內戰

●畢竟，絕大部份爭奪毫無結果，還不算！允許日本本土日軍的完全撤除，要等到三個月以後，還不算！允許「把已經解散的日本軍事秘密警察隊員，補助東京和德意志地區的流軍」，來維持日本的秩序，還不算；收編一切前線軍，任用許多著名的吉爾林份子，來鎮壓人民，維持日本人的秩序，還不算。據八月二十二日同盟社轉播東京朝日新聞的消息說：

「東京朝日新聞今日發表全國人民說：從美軍當局對日本投降使節的態度以及麥克阿瑟總司令所提關於佔領軍登陸日本的規定條件這兩點來看，美國是將以諒解的態度來對待日本的。第一，馬尼刺會議時，美方代表並沒有輕視日本使節，而以公平和對等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第二，關於佔領軍在日本本土登陸的規定，若干軍事當局容許日使派員隨同日本國內實際情形，提出合理的登陸辦法。第三，關於實施波茨坦宣言各條款，美國的舉動似承認日本政府及大本營（按：九月十日麥克阿瑟已下令取消日本大本營）的主權，並且準備利用後者來實行宣言中的條款。第四，日本撤出的各區和平與秩序，由日本警察及憲兵維持。——這幾點都是與盟國對待德國不同的地方。」

這是日本法西斯所最大的希望，不能完全據為事實。但是九月七日路透社倫敦電訊，却部分地證實了上面的報告不是無因的：

「外相重光今日向報界說：盟國將不在日本設立軍政府，……重光說：盟國很明確並信任日本政府於投降後所採取的行動。」

我們自然不能說同盟國對於日本的管制和佔領，將到此為止，不再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從日本投降，直到如今，這一切事實的發展，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局勢。它至少可能產生這樣一個危險的結局：

- 一、日本法西斯依然存在，無法徹底滅絕。
- 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陰謀繼續活動，以至再發展成爲遠東與世界的和平威脅。
- 三、一個真正的民主的日本，在現狀之下無論如何是產生不出來的。

八月二十五日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史溫，替這無辜的日本法西斯的政策，作了一個恰當的預言，他說：「日本投降與德國投降，基本上就有差別：德國失敗後，並沒有保留下政府，我相信戰敗國家是不能有政府機構存在的。……德國現在唯一的政府就是盟國的軍政府，軍政府繼續存在，直到允許德人自己建立政府爲止。但日本沒有運到同樣的命運，這是基本的不同點。日本政府依然存在，而且是一個龐大與複雜的機構，他們將接受盟國的命令。盟國的政府與盟國總司令的政府，其間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天皇左右的人當然很明白，他們現在希望的是，當盟國的條款先後實行時駐在日本的盟軍撤退回去時，天皇左右近臣又可以把他們的現政府恢復過來，然後他們又重振旗鼓再建設一個大日本！」

這是德意志和平的一個巨大的威脅。

#### 四

但是，威脅着遠東和平的，還不僅僅是日本法西斯的復仇熱門陰謀，還不僅僅是日本法西斯對寬大的待遇，而且是在這個對日本法西斯採取優容政策的後面，還掩藏着另一種危險。

日本法西斯死灰復燃的企圖，是寄托在兩大希望上面：他希望同盟國不團結，他希望中國國內不團結。爲實現這兩個希望，在他的投降過程中，採取了毫不掩飾的許多步驟，包括文字和口頭上的挑撥與行動上的實施。

挑撥的對象首先是美國與蘇聯之間。八月十七日，我們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的第一個文件：「日軍司令部致麥克阿瑟將軍之第四號電文中稱：蘇軍不願日軍停火之命令，仍積極進行攻勢，蘇軍已於十七日發抵滿洲以西某地。該電文迫切請求盟方最高統帥採取適當步驟，使蘇方攻勢立即停止。」（合衆電）八月二十二日我們看到了挑撥的第二個消息：「東京廣播說：日本大本營爲日船三艘，二十二日在北海道海岸外遭受攻擊是蘇聯的潛艇擊沉一節，已向麥克阿瑟元帥提出抗議。」（合衆電）但是這些只是在蘇聯的作戰範圍，日本還擁有正式簽訂投降文書以前，蘇軍是自由行動之權的，因此在東三省內的借口，不可不發生作用；日本法西斯聽得，立刻進一步，八月二十四日東京的廣播是：「倫敦新科雷台報告：蘇空軍部隊現在準備佔領日本本土北島與北海海峽。日政府致麥克阿瑟電說：如果這個報告屬實，那麼日本政府認爲非常遺憾。日本現正努力實行閣下的要求，而將蘇軍和平民置於嚴格管制之下的「日本人民」都希望盟國軍隊按照規定進入日本。」

這簡直是利用日本管制與佔領權的離間，日本向什麼人投降和聽從什麼人的命令——這個巨大的利害關係問題，來進行挑撥了。這是何等詭譎的一個奸計啊？日本不是向盟國投降了嗎？日本不應當是接受盟國管制的嗎？

但是，日本法西斯的這種挑撥，並不是毫無的放矢。日本正式宣佈投降之後，杜魯門總統發表談話，表示「佔領日本的主力將由美軍擔任」（美新聞社十六日華盛頓電）。這在日本投降前一天，八月九日杜魯門總統的廣播說：「舉凡我們軍事專家認爲保衛國家所不可少而現在又不在我們手中的根據地，我們都要取得。」軍事的需要是無限度的，要多少根據地就多少根據地，即使是不在手中的也要取得，試想這種挑撥爲怎樣一個結局呢？這並不是已成的事實，但由於杜魯門總統的「坦白而具體」，給了日本法西斯的一個挑撥的根據。

這是日本法西斯挑撥同盟關係的一面，其次，日本法西斯的挑撥，集中於中國國內的團結。因爲只有中國國內的團結分裂內戰，日本法西斯纔可

能施展其死灰復燃的陰謀。

日本法西斯對中國團結的挑撥從言論宣傳一直到行動，無所不用其極。對於中國的同盟國，他說：「我們雖曾經竭力避免衝突，但中國的局勢仍沒有好轉，非正規軍盜匪及軍閥等的騷亂，使日本在停止軍事行動及移交武器方面深感困難，所以請閣下對解除中國境內日軍武裝之時期及方法，惠加適當考慮。」（日方致麥克阿瑟元帥電文八月二十五日合衆社舊金山電）對於中國政府，東京廣播稱：「規模相當龐大的中國空軍部隊，定二十六或二十八以後移駐南京上海北平等區，在華軍開到之前，各區的日軍將維持秩序，並阻止沒有得到將委員長准許的任何軍隊通行。」（合衆社二十五日電）對於中國人民及其武裝部隊，不僅說他們是「盜匪」，而且要毫不猶豫的加以武裝壓迫。新華日報警察署通訊說，揭發這些事實：「天津日寇現集結兵力萬餘，並不時抽調居留民入伍，以加強守備。……漢奸門逆張中強遊樹森正在協助日寇守衛津市，並要求市民鎮靜再鎮靜，保護一切日軍與日僑，不得稍加怠慢。」

但問題不僅是在日本法西斯惡毒挑撥的方面，而且是在被它所挑撥的另一方面的反應。那些反應顯然是損害中國國內的和平民主與團結的。

但問題不僅是在對於日本法西斯的挑撥，所起的一切不良的不合理的損害和平與團結的反應，而且是在這反應的背後的支持力。中國八年來的抗戰局勢，主要是中國人民的血汗所支撐起來的，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中國人民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而和平則必須民主，必須團結。但是由於日本法西斯的挑撥和挑撥所引致的反應，却顯然的造成了和平團結的困難。這困難，在中國人民一方面，是抱有熱切的希望和力量來克服的，但是在相對的另一方面，却由於一種偏袒的外在力量的支持，使得問題的解決，增加着阻力。試舉一例：日本於八月十五日決定投降，八月十六日盟國的某些軍事負責人員就公開表示，將空運中國部隊到各地接受投降，「假如尚有抵抗，不論其射擊我人者爲誰，我們將予以懲辦。」事實上日軍已經宣佈投降，按照歐洲戰場的先例，按照中國戰場的實際情形，日軍應該就地投降，中國戰場，當面的一切抗日武裝都有接受投降的權利。這是一個問題。其次，中國的團結，只有依靠中國人民自己公平而合理的辦法才能解決，任何不合理的干涉，是不會得到解決，只會增加糾紛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前述的人員却聲明：「美國的任何人員和物資，不應用於殺害中國人，除非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生命和財產。但是租借法案所與中國軍隊的裝備，一旦到了他們的手中，就成了中國人的資產。」這也就是說，可以作任何一種使用，包括進行內戰。

要指出，這是一種偏袒的「支持」，和直接干涉或參加中國的內戰是沒有差別的。這種方式存在一天，中國人民的和平團結是一天受阻礙的。

因此如上所述，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時候，在遠東所存在的局勢，有三大問題：首先是日本法西斯的繼續存在和繼續活動，對於遠東的和平是一個威脅；其次，是中蘇蘇英的國際關係合作，必須加強，而第三，中國

國內的和平團結，是中蘇蘇英團結的基礎。——這是三個異常嚴重的問題。

### 五

對於這三個問題，蘇聯有不不斷的明確表示。

關於第一個問題，蘇聯的三大報紙——消息報、真理報、紅星報不斷的強調：「蘇方應採取有效步驟共管日本，以防止日本帝國主義復活，與從事報復性的宣傳。」九月二日蘇聯真理報更明白指出：

「日本侵略者承認它失敗了，但是日本就這樣忍受了麼？相信沒有人敢於冒險回答這個問題。這並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尤其是現在盟國對日勝利的條件必須明白規定，必須注意組織和保持遠東和平的條件。日本失敗後的情況，是和盟國勝利後的德國情況大不相同的：作戰的和停戰的同一個日本當局，軍閥階層依然存在，真正日本人民的聲音還沒有聽到，戰爭罪犯和他們的責任問題還沒有提起，這些問題留待各大強國基於合作的經驗來解決。他們的武裝合作，保證了勝利，戰後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加強盟國的戰後團結，蘇聯真理報曾強調「同盟國必須繼續合作」，並且說：「這是自然的，某些分歧意見曾經產生，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這些分歧意見都在順利地克服中，全世界都有權利懷抱希望注視未來。」蘇聯的「新時代」雜誌，更說得明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維持世界的持久和平，已成為一切民族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實踐這種責任起見，我們必須嚴密注意危險和平的反動力量，一切國家必須真誠團結，並防止德日兩國的再起侵略。」關於第三個問題，蘇聯紅星報寫道：「多少年來，中國不但體驗到軍事上的困難，而且還有政治上的糾紛。在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期間，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嚴重分歧，阻礙了中國的政治發展和國家民主主義事業的實現。……遠東戰爭的勝利完成，要求中國人民一切力量的迅速團結，藉以從事戰後建國和國家民主革新的事業。」八月二十八日蘇聯塔斯通訊社的廣播，坦坦而且具體的指出：

「日本帝國主義的許多陰謀，在戰時曾在中國統治集團中玩弄花樣，損害民族的團結，而有所成就。……要防止這些災禍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進步的民主的發展以及和其他民主強國密切合作的道路。」

蘇聯對於這三個現實問題的態度和方針，是鮮明而具體的。

怎樣來解決這遠東局勢中的三大問題呢？在遠東，沒有德黑蘭——克里米亞會議，迄今爲止，也沒有類似於歐洲的波茨坦會議，但是，現在有了八月十四日蘇兩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定下了三個原則，來解決三大問題：

一、徹底消滅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就是第一條

第三條。

二、加強同盟國的團結合作，防止一切危害和平的反動力量進攻蘇聯或破壞中國和平局勢的陰謀。——這就是第四條。

三、以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造成中國國內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有利條件。——這就是第五條。

有些不能真正認識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人，只看到條文和附件中的規定，蘇聯的「道義上與軍事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同時蘇聯聲明「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這些人看到了這些，因而發生一種無名的樂觀或悲觀，認為這是一個最重大的問題。不錯，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為它是中蘇條約中的三大原則之一。但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認識清楚：第一、承認中國的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這並不是外交上的意外，只有條文中不承認交涉的對方存在，纔是意外的，倘使如此，就根本不可能產生條約。第二、承認，並不等於同意一切不民主不團結和平、民主、團結、進步。八月二十九日的蘇聯塔斯社廣播，和八月三十一日蘇聯紅星報的國際論文，足以充分證明這一點：蘇聯希望「中國人民一切力量的迅速團結。」（紅星報）蘇聯希望「中國不能依然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避免新的災難的唯一方法，是國家的進步和民主的發展。」第三、承認中國的中央政府也並不等於否認中國一切民主和人民的要求與力量。這也是不待解釋的。

其次是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中國的內政，這不但不是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的阻力，正好相反，是中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的有利條件。一百年來中國改革事業的最大障礙，並不是外國勢力的不干涉，正好是外國勢力干涉得太多了。只要這樣反動的干涉的力量抽出它的黑手，中國人民是可以迅速取得和平與民主，團結和進步的。

蘇聯的外交政策一貫的是不干涉他國的內政；這幾個月在希臘和巴爾幹各國的內政問題上，蘇聯的政策是如此，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蘇聯的政策也如此。現在的問題是，蘇聯以外的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也能够共同採取這個立場，遵守這個光明而磊落的方針。

六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再一次證明了一件事，證明了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始終一貫地守著一定的原則和方針的。不是嗎？遠東一九三九年蘇聯領袖斯大林在聯共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就已經開釋得明白：

「一、我們主張和平，並主張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繫，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試圖侵犯我國

的利益。

二、我們主張和那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鄰國維持和平的親近的善鄰關係，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直接間接侵犯蘇聯埃國邊境完整性與神聖性的利益。

三、我們主張援助那些遭受侵略並為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四、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恫嚇，並準備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聯埃國神聖性的戰爭挑釁者的打擊。」

我們現在把這個鮮明而確實的外交政策，來覆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我們能夠發現出它們有任何一點的絲毫差別嗎？是沒有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訂立對於遠東，可能得到什麼影響呢？九月二日蘇聯在紐約的論說，可以作為這問題的回答。他寫道：

「在政治重要性上，中蘇條約也許和日本投降相等。中蘇條約使中國成為巨強，條約表示着蘇聯長期和平政策。

條約的目的，不僅在使中蘇關係恢復正常，很明顯地，中蘇條約是長期和平政策的一種工具，蘇聯的目的是使戰後亞洲安全，並與美國合作。中蘇條約又一次證明了，美蘇合作在蘇聯政策中佔有首要的地位。中蘇條約消除了亞洲大陸的衝突與緊張的危險。中國是美國世界政策最後一片危險地帶，只有中國安定了，世界和平纔能組織起來。

必須亞洲大陸安定，對日勝利纔有阻礙。中蘇糾紛與美蘇爭霸，只是使得日本獲得政治逃避與軍事復仇的希望。

莫斯科、重慶、延安之間的談判，是世界和平的真實基礎。」（新開路二日紐約電）

這不是一經說得明白了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為了防止日本的侵略再起，是為了加強同盟國——尤其是蘇聯兩國的合作，是為了造成有利於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條件。這三大問題，不是今天遠東與世界和平最重大的問題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對於這三大問題的解決，已經建立了一個重大的基礎，現在只等待着其他同盟國的共同努力，來建造遠東的和平與安穩！

自然，必須指出：一個條約的簽訂和一個條約的嚴格執行，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少意義重大的約章就是因為訂約者的一方表示了不能嚴格執行，而宣告破產的。如以上之所分析，對於像中蘇條約這樣意義重大的約章，不少人是會用他們的「光明的語言和卑劣的行動」從四面八方來加以破壞的，為了嚴格的執行中蘇條約，進步的人民必須對這些中外破壞份子展開全面的鬥爭。

我們熱烈地擁護這鞏固中蘇人民友誼和奠定遠東進步和平之基礎的中蘇同盟，並願為其徹底執行而鬥爭。

九月二十日

# 如何處置敵偽漢奸資本

韋中梁

中國的抗戰，是民主經濟民族資本對於敵寇資本漢奸資本之戰。中國經濟在戰爭以來，分化為三大分野。一是敵寇資本和漢奸資本，獨佔了沿海沿江的經濟中心。一是解放區經濟，民主經濟的新型，在沿江沿海和廣大的華北的地區發展的壯健，以農村與都市對立，建立了自給的農村經濟與中小工業，來對敵和削弱敵寇經濟。一是大後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在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壓迫之下，民族資本在艱辛困苦奮鬥，以保護軍用民需。由於勝利的前來臨，經濟的鬥爭，也到了決定的階段，目前正是解放區的民主經濟和大後方民族資本，起來清算敵偽資本的時候了。

## 敵寇資本遍布沿海

我們首先要檢討敵寇資本在中國的成長。日寇對華投資，始於一八九七年，但大量增加，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截至一九三六年，竟達十五億元。其比例如下：

銀行金融業	九四、〇〇〇(千元)	六、〇(百分比)
紡織業	三一五、〇〇〇	二〇、一
一般工業	七五、〇〇〇	四、八
船舶運輸業	三〇、〇〇〇	一、九
貿易及商業	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
礦業	九〇、〇〇〇	五、六
電力業	一六、〇〇〇	一、〇
鐵道業	二〇、〇〇〇	一、三
不動產業	三〇、〇〇〇	一、九
其他雜業	八〇、〇〇〇	五、一
一般政治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
文化事業	二〇、〇〇〇	一、三
共計	一、五七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七抗戰以來，敵人無佔沿海，其資本的發展，尤其迅速，並繼續北歸

發公司，華中振興公司，作有計劃的開發，即此二公司，資本即達七萬萬元。在東北，則有滿洲重工業開發會社的組織。這顯而易見，應用軍事力量為後盾，威迫華資參加，掠奪中國工廠，來完成其經濟的開發。

截至一九四〇年，據日人千葉誠夫的調查，日資在華設廠者達一百零二家，其中工廠在日本滿洲者十七家，總廠在上海者八十五家。由於敵寇後方放軍力量之壯大，敵人一般工廠，多集中於青島天津上海三地，以防備後方。東北由於敵寇經營多年，我游擊軍力量稍弱，其生產比較分散於各地。

敵人在上海的工廠，總廠及分廠合計，約達一百九十七家，資本約為三億五千萬元。分類統計如下：

業別	廠數	資本
機械工業	三一	三一、二九二、〇〇〇
電器工業	一一	四、九七五、〇〇〇
木材工業	三	一三二、〇〇〇
土石品工業	二一	一、〇三五、〇〇〇
化學工業	三五	二四、八四〇、〇〇〇
紡織工業	五五	二七七、七五五、〇〇〇
服飾工業	五	一四〇、〇〇〇
飲食工業	一九	一九、八七五、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一〇	三、〇一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七	一、四一五、〇〇〇
合計	一九七	三五八、四六九、〇〇〇

敵人在天津所設工廠，有五十三家，資金約為二億元。分類統計如下：

業別	廠數	資本
金屬品工業	一	三〇〇、〇〇〇
機械工業	一四	三一、〇六〇、〇〇〇
電器工業	二	五、〇〇〇、〇〇〇
木材工業	四	六、一四〇、〇〇〇
化學工業	二	四二、二〇〇、〇〇〇



紡織工業 九三、三二〇、〇〇〇  
 飲食工業 七、七七〇、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七、五〇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一、三〇〇、〇〇〇  
 共計 五三 一八四、五九〇、〇〇〇

青島廠道經營，以紗廠、火柴、機械業為主。戰前紗廠即達十八家，有紗錠四十八萬錠，線錠一萬六千錠，布機七千台。但戰後統計，尙未發具體材料。

整個華北地區，敵偽經濟的力量，一九三九年時，滿鐵會社曾有一個統計。其中輕工業工廠，日偽合計，共有紡織業三十五家，毛織七家，麵粉五十家，烟草十五家，糖廠十六家，火柴四十一家，染材十二家，造紙七家，鹽酸六家，製材十七家。這均就大廠而言。

東北是敵寇經營重工業的基地。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敵寇工業有迅速的進展，至一九四〇年擴充為一九三一年的六十四倍。目前工廠資本在十萬元以上者，達一百九十二家，資本十六億五千四百萬日圓。分類統計如下：

類別	廠數	資本
鐵及冶煉業	三四	九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機械工業	一三	二八五、一〇〇、〇〇〇
電器工業	五	一〇、一〇〇、〇〇〇
木材工業	一七	一一、四五〇、〇〇〇
土石品工業	二一	三三、三〇〇、〇〇〇
化學工業	三四	一八一、八七五、〇〇〇
紡織工業	一八	三八、三五〇、〇〇〇
麵粉工業	二	七〇〇、〇〇〇
飲食工業	三三	八八、七五〇、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一	二七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九	一八、〇七〇、〇〇〇
共計	一九二	一、六五四、〇六一、〇〇〇

由上項統計看出，敵人對於東北，華北，華中的經營，是有計劃的擴張，七年來其力量，益趨於強盛。

### 敵偽漢奸資本的混血兒

在敵寇自行經營的工廠之外，尚有敵偽漢奸資本的混血兒。此類工業的數量亦頗為巨大。據目前粗略的統計，有三百二十五家，其中半数廠家資本

即達五億四千萬元日圓，二億圓幣，其中一百六十五家尙未計入。

其分類統計如下：  
 (其中有日資的以千圓日圓為單位，華資以千元圓幣為單位，華資計千元，日資不加註。)

類別	廠數	資本(千元)	華資	日資
鐵及冶煉業	16	132,100	2	480,000
機械工業	38	136,900	5	55,000
電器工業	10	9,780	7	1,145,000
木材工業	1	300		
土石品工業	4	14,900,000	4	10,460,000
化學工業	88	144,000	88	1,600
紡織工業	21	4,560	39	74,850,000
麵粉工業	49	50,985,000	81	13,890,000
飲食工業	180	470,715,000	127	102,000,000
文化工業		86,825,000	18	70,407,000

此類工廠，多為敵寇我國廠，或敵偽經營。其方式有下列六種：(一)軍管理，(二)委任經營，(三)原主委任，(四)中日合辦，(五)租借，(六)收買。軍管理，是日軍直接經營。委任經營則為日本會社經營。原主委任，則為原主委託經營合作，其辦法為：(一)日方提供技術與人材，(二)華方提供資本及修繕費用，(三)股額四六分，日方四，華方六，多用於製鋼、製糖、製油、製紙及製鹽等。租借則為日方提供資本，收買則亦近乎收買。以上三種，公認其原主經營，在敵偽工業經營中佔極重要地位，而且成為敵偽經濟的一部份。

### 民族工業救亡的委身

勝利以來，大後方民族工業家提出了維新的呼聲：沒收敵偽漢奸資本，發給民間工業經營權。這要求，與解放區民族工業家要求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嚴厲懲治戰爭罪犯的呼聲，是完全一致的。

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天，吳德初湯仰山余名庭胡厥文諸氏就在瀘川工廠緊急會議中說：「凡是敵偽漢奸資本，就應該完全沒收！」這請案，得到大後方全體工業界的支持與擁護。吳德初湯氏在華五業委員會上也大聲疾呼的說

政府當年為了動員工廠搬移後方，曾經告訴我們，淪陷區工廠將來必然要沒收，我們搬遷到後方的民間工業家，可以分到敵僑的廠。林德慶先生以這真正詞義的說辭，使我們一籌再舉，對大後方來與全國軍民同甘共苦。這幾年來後方工業的艱辛有目共睹，忍受各種管制的束縛，繳了多少稅捐公債，只剩下一些破爛機器以維持殘局。勝利的好音傳來，後方工業便陷於停產危機之中，如果政府不宣佈沒收敵僑廠礦分配民間經營，則後方民族經濟崩潰可以立見。

為什麼必須沒收敵僑漢奸資本？

第一，因為敵僑漢奸資本與我民族資本勢不兩立。淪陷區敵僑漢奸資本，在七年的掠奪中壯大得可觀，後方資本相形見絀。如果說兩者並存，則結果必致漢奸資本吞沒民族資本。

我們的工業資本，自抗戰以來，由於政府管制政策的歧途，早就在日益削弱之中。沿海內遷，損失過半，沿江內遷又損失其半，湘桂之遷，反把四南實業毀於金城江。其實力的削弱是可驚的。大後方工廠，總計三千七百五十家，但資本不過三十八億，工人約二十六萬人，馬力十萬匹，工具機八千七百二十七部。我們工廠的家數雖多，但多為中小工業，例如居首位的化學工業（約一千一百四十四家），大多數製的是錫燭牙粉，製酸廠者不及十家。資本額雖多，但三十萬高的法幣，其實際價值，何異於戰前的三百萬。敵僑工廠與我民族資本力量對比之懸殊，在紡織業方面，尤其清楚。淪陷區域紡織業統計：

地區	紗	錠	布	機
華中區	一、七七八、六八八	一〇九、九九二	六、六六〇	
東北區	四八〇、七八八	四七、八五〇	五、五八七	
滬青津城區	二、三三七、五一四	四一一、二〇四	三六、五六九	
合計	四、四九六、八九〇	五六九、〇四六	五九、〇二五	

但大後方的紡織業祇擁有二十一萬紗錠，相差二十二倍之鉅！

潘仰山氏慨然說：「如果敵僑漢奸工廠留下來，那裏還用得着我們辦廠？」這是道破了勢不兩立的情勢。

第二，為了施行對於敵僑漢奸的懲罰，必須沒收其工廠。留在淪陷區的廠，為了自己的利益，與敵人相結納，往往成為敵寇經濟的一部份。例如從事紡織的工廠，其織出的布疋，往往是敵人的軍需，修理汽車的工廠，其修理的汽車，往往便利敵人的輸送。縱然製造的不是子彈刺刀，其對後方人民的犯罪，與侵略者同等。抗戰初期，有堅壁清野的號召，凡是可搬的就搬，凡是不能搬的就破壞，這都是因為現代戰爭是總體戰，不容有任何直接間接的資敵行為。但是有一部份廠家，竟昧於民族大義甘於為敵人服役，復原期

工，以貪圖利潤。其生產力量對於敵人是大有貢獻，對我民族經濟卻毫無裨補，對解放區軍民既未有經濟上的支援，對後方更是犯罪行為。在軍事上政治上我們決不能寬容偽軍偽政的漢奸頭子，在經濟上我們也決不放鬆這種「合作主義者」。我們應該效法法國人民，沒收與敵合作的銀行工廠，不論其規模的大小。

目前應有的緊急步驟

民間工業家要求沒收敵僑漢奸工廠，輿論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政府截至今日，尚無明確的表示。八月廿一日行政院通過的收復區工廠事業處理辦法，許多地方欠明確。

我們認為在目前應該採取下列幾種緊急步驟：

第一，政府應即明白宣佈，凡是敵僑自辦工廠，或與敵僑合作之漢奸工廠，應即沒收。除部份應由政府經營者外，全數分配或租借民間工業家經營，以彌補漢奸資本，發展民族資本，並藉以補償有功抗戰之工廠的辛勞。發還原主，應極其慎重，有若干工廠一方面內遷，小規模生產，一方面留下技術人員，補助敵僑經營廠，大賺其錢。這種兩面派的做法，今日應即加嚴罰，即以其與敵合作之罪，取消其原主資格。沒收的各廠，決不能公廠歸國營，私廠還原主了事。應該把公廠私廠一起沒收，分配給所有有功抗戰的工廠經營，同時有功抗戰的工廠，不論其是否在淪陷區原有財產，一律鼓勵其前往經營。

第二，敵僑漢奸工廠的調查清理，必須由後方有功抗戰工業人士參加，淪陷區各廠勞工參加，解放區軍民代表參加。最近兩年來，重慶街市，常常出現一種似漢奸似漢人的，來往於大後方淪陷區的人物。按其辦事時與敵人密切合作，他是漢奸，按其來到後方四處領營，又似是一身在香邦心思漢。但按其實際行為看來，其行動卻完全幫了敵人的忙。這類似官似商的活動方式，難保我們的官僚機構不受欺騙。為了根絕一切說項求免，欺騙活動，應由民營工業家，政府當局，勞工，解放區代表共同組織敵僑漢奸廠礦清理委員會。美國人民的揭發與檢舉，並歡迎該廠勞工的提供材料。應該授以一切財產沒收之權，工廠恢復經營之權。單單任命一個經濟部特派員，是絕對無法把這一工作做得圓滿的。

總之，我們堅持經濟上必須毀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資本，漢奸的買辦資本，以培植民族資本，促成經濟民主。預防官僚資本的侵吞阻撓，和獨吞經濟果實企圖。因此，我們支持民族工業家要求參加敵僑廠礦接受經營，並要求分配民營廠礦經營。同時即解放區軍民和勞工，亦應有參加的必要與權利，以共同努力於民主經濟的建設。



# 美國共產黨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訓

解放日報

美國共產黨人的清算白勞德修正主義，恢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恢復黨的組織，這對於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而且對於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一種有益的教育。

作爲白勞德修正主義的代表作，是他的「德黑蘭」一書。因爲交通的關係，我們得到這本書很晚。當白勞德去年把美國共產黨改組爲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前夜，我們看過白勞德的個別論文，所有他關於保存托萊斯制度，關於調和美國反動的獨占資本與美國工人階級的矛盾，關於擴充在獨占資本統治下的美國資本主義國內外市場，以避免新的經濟危機的各種空想設計，即開始引起了我們的驚訝，認爲這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機會主義思想之復活，並認爲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尙不明瞭白勞德的全部綱領。在今年四月間看到白勞德「德黑蘭」一書之後，整個的綱領就完全清楚了。白勞德的所有錯誤，都環繞在他那種以「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思想」爲中心的錯誤經濟綱領上。隨後，我們即從外國報紙片斷地知道了以羅斯特爲首的美國共產黨同志們對於白勞德錯誤的鬥爭，知道了法國共產黨領袖杜克洛對於白勞德的批判。毛澤東同志和我們黨熱烈地歡迎這種和白勞德修正主義鬥爭的消息。現在美國共產黨在羅斯特領導之下已重新組織起來，毛澤東同志給羅斯特的賀電代表我們中國共產黨慶祝美國共產黨人反對修正主義的勝利。

自從很久以前各國共產黨發起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以來，這種統一戰線即成爲各國廣大人民的運動。歷史已給人證明：這種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是保證了並繼續保證着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這種統一戰線的發起和堅持，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運動中，無產階級內部的不穩定部分形成了或大或小的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潮流，這種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看不見：在統一戰線中，各種社會階級的成份是站在自己階級利益的立場上參加的，因此，除了反法西斯這個共同的綱領之外，它們還各有其他不同的綱領，因此，在如何戰勝法西斯的方法上，也各有不同的路線。在戰勝法西斯之後，有的主張繼續勝利的果實應當歸於少數人之手，

由少數人去壟斷；有的則主張它應當歸於絕大多數人民之手，由絕大多數人民所共有。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們看不到統一戰線中這些根本的東西，就不願意，也不能夠在統一戰線中對於各種違反人民利益和實際上幫助法西斯的東西實行鬥爭，就會把無產階級變成大資產階級或自由資產階級的尾巴，而極有害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極有害於反法西斯鬥爭的現在和將來。白勞德的修正主義便是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一種最顯著的典型。在白勞德的「德黑蘭」一書中，竟完全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前途上迷惑住了，他竟只看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前途，認爲美國資本主義還「青春」，而只要「由今天美國經濟的現存因素」構成美國無產階級的經濟綱領和政治綱領，把無產階級和獨占的大資產階級看成「一個共同利益」，更保證托萊斯制度，夢想獨占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美國可以領導世界，夢想經過「階級調和」可以避免美國資本主義內在規律所必不可避免的危機，而這種危機，甚至在美國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者的營壘中也是認爲無法避免的。白勞德根據自己這種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不到美國人民可能擺脫獨占資本的壓迫統治而有自己的明天，看不到美國人民有它的明天的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因而解散了美國共產黨，混亂了美國人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覺醒。但在反法西斯英門爭中付出自己的血和汗的美國工人階級和美國人民，恰是應該有自己的明天，應該得到自己的報酬。顯然地，如果白勞德的修正主義不被糾正，就會妨礙反法西斯鬥爭的發展，就會使美國的工人階級和美國人民遭受極重大的惡果，就會幫助美國反動派的猖獗，而這種美國反動派的猖獗，事實上不但有害於美國人民自身，並且有害於其他國家。當然，和美國有很大關係的中國是在其內。

我們是處在反法西斯的大變革時代。各國無產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因受資產階級壓力的影響，缺乏清醒頭腦，掌握不住方向，這是不足驚奇的事，問題是在帶着善於和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潮流作鬥爭。因爲各國的條件不同，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潮流在各國的表現形式不一，其爲害的程度也不一致。大體上說來，對於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潮

我們鬥爭更有力，更有力量，則它爲害的程度就較少，並被克服得較快；反之，鬥爭得不好，鬥爭得沒有力量，則它爲害的程度就較大，並被克服得較慢。我們中國共產黨，在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中，也發現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潮流，我們這種的機會主義與白勞德修正主義大抵異曲而同工。……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在抗戰期間，受到我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所堅決反對，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和繼續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絕無地作了不調和的鬥爭，使得我們黨保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因此，我們黨才能在八年抗戰的驚濤駭浪中堅持到敵人的不調和，不調和是人民鬥爭的變態及其所給的威脅，而領導了人民向抗戰勝利與國家民主的方向前進。

爲中國革命的經驗所證明，也爲世界各國的經驗——更爲這次美國共產黨向白勞德修正主義鬥爭的經驗所證明：毛澤東同志所確定的關於在統一戰線中既須聯合又須鬥爭的方針，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這不但使中國無產階級最正確的政策，並且對於各國無產階級的政策作了重大的有益的貢獻。只有又聯合又鬥爭，才能無產階級避免自己的孤立，又才能證明無產階級的政治原則，提高人民的政治覺醒，克服反動派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企圖，也因此，才能鞏固統一戰線，才代擴大統一戰線。如果對於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有所動搖，使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到資產階級甚至買辦階級法西斯集團的領導，使無產階級變成它們的尾巴，那就使無產階級投降資產階級，那就沒有什麼統一戰線，那就會把人民的事業引到失敗的道路。

白勞德的思想方法是完全錯誤的。他自己說：「學會了如何在地震與震盪之中維持平衡」。事實上，「維持平衡」——就是他的思想方法論。從這種「平衡論」出發，他就這樣那樣地「階級調和」去維持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各階級的「平衡」，而不是要引導人民的鬥爭去克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所存在而又必不可免的矛盾，他比夢想經過「階級調和」去維持在關佔資本統治下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時與發展程度的「平衡」，而不是要引導人民的鬥爭去克服美國經濟在關佔資本統治下所必不可免的「地獄與波濤」。這種不調和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唯物論是完全相反的，毫無相似之點的東西，而且從來是各種機會主義者一種主要的思想方法論。在我們中國，不論在大革命時代的陳獨秀投降主義，不論抗戰時期所出現的新陳獨秀

主義，它們對於統一戰線所採取的投降政策，只要聯合不要鬥爭的政策，它們的主要思想方法論也即是這種平衡論。和這種平衡論的思想方法相反，毛澤東同志關於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恰是應用唯物辯證法一個最出色的模範。是平衡論呢？還是唯物辯證法呢？實際是真理的標準。實際檢驗了唯物辯證法，打倒了平衡論。

美國共產黨人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勝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世界各國的又一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敵的真理，又一次被證明了。我們中國共產黨因爲在毛澤東同志指導下，特別很早就和我們黨內那種與白勞德修正主義相類似的機會主義——投降主義作了不調和的鬥爭，因而得以避免它可能給人民事業更大的損害，但是美國共產黨人這次和白勞德修正主義的鬥爭，對於我們黨，對於我們全體黨員，同樣地是很有益的啟示。

美國共產黨人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鬥爭，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給了些什麼樣的教訓呢？這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要更堅決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必須更善於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學習他如何應用唯物辯證法以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問題，他是應用得那樣精明，至於百發百中，毛澤東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而毛澤東同志這樣的人物就是列寧斯大林式的人物；他在鬥爭中是大無畏的和對人民公敵是毫不留情的，他在事情開始複雜化並當着在地平線上呈現某種危險的時候，不會發生任何猶豫失措或類似強迫失措的心理，他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開闢決定方向，周密估計正反面各方面的時候是明智而鎮定的。不說別的，八九年來，我們是處在這樣政治複雜而變化極迅速緊張的時代，我們經過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沒有迷失了方向，我們和中國人民在一起，戰鬥地向前勝利前進，這個最現實的生活就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是對的，而一切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是錯了。毛澤東同志是我們有黨以來各個革命時期和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鬥爭的模範，是我們有黨以來各個革命時期和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鬥爭的模範。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和一切機會主義者鬥爭的模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如果不善於掌握毛澤東思想，那就一定會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一定會被機會主義所變質，而敗壞中國人民解放的事業。

提高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課題，造成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新思潮——這就是美國共產黨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鬥爭所給我們的教訓。

(八月一日社論)

# 「民主」人

洪深

## 一、自我批判

本年三月杪，我收到新華日報一封徵求「學期專稿」的信。信是鈐印的，想必也寄給文化界其他不少的人。不過，在寄給我的那張信紙的後面，附有一位我的老友親筆寫的幾句話；我現在全錄在這裏：「在世界日報讀你寄的短文，甚佩。我覺得在今天談談『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態度上的民主，比什麼還重要；你能替我們寫一點關於這一類的文章否？」

因為我自己的為人，雖然就懇切自為友人所贊，而有時不免太爽直，太嚴格，太堅持己見，可能客觀上成為頑梗與固執。我理解那位老友在信尾加的幾句話，是對我一種友誼的委婉的勸告，促起我的深切反省與自我批判的。我這樣大年紀，不應該明白我自己，反比旁人明白我還要少。在我的人格中，的確有許多地方是不民主的。每當我辨別出一件事情的是非黑白，我性急地要求旁人無條件地同意我的見解；有時甚至用熱情用厲色，強迫旁人接受我的觀念；不暇去公平地充分地考慮一下別人的觀點，更不顧從事耐煩、遲緩、理智的說服，去求取那和我觀念不同的人底諒解與同情。由於態度的武斷與僵硬，往往引起意外的困難，誤會與不諒，雖然我的存心是天下之至善的，我所做的一切，全是為了幫助別人的。這是我生平悲劇之一——凡自以為存心善良與見解正確而一意抹殺那見解容或正確但存心未必不是同樣善良的反對者的，也似乎不免這種自招失敗，自陷痛苦的悲劇的！

去年冬間，我曾為中術導演宋之的所作劇「寒寒」，曾開周羅來先生看了演出之後，發過一個議論——我雖沒有親自聽到——要點好像是這樣的：在今天，不必在舞台上發揚像周大夫那樣的人物；他雖然主持正義，嫉惡如仇，而固執己見，剛愎自用，似乎忘記每個人都有他的自尊心；結果，連到那一向親信的幾個人，都不能徹底團結在身邊！周大夫如果從事實際政治，免不了要成為極端主義者；他的人格是不民主的。這一個對於劇本的批評，曾使我長久的深思。主持正義，是必要的做人的道理；那樣一個人才能成爲

正人君子。至於民主的人格，我個人以為，應當包括主持正義，並且超過主持正義——主持正義的目的，完全達到，而仍能不於沿途撞倒與打擊了其他有正義感的人底自尊心。

我不是一個深淵的思想者——我想我的友人都能原諒我的這弱點的——我此期祇在根據一些淺薄平凡的常識，借助一些東翻西問的學問，進行我的「語言化的思考」THINKING ALOUD。我的說話，仍照世界日報短文的方

式；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絕對不受格式的拘束，倒許可以盡所欲言。不過，庸俗與囉嗦，在所難免，還望大家不即介意。

我有這樣幾個見解——不對的地方，請糾正——第一，一個人的人格的形成，由於他的生活經驗與生活習慣。他生活於一種制度之下，這個制度，必然要求，也必然磨練某一種的人格。人格是制度的產物。同時，制度又是人爲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因素新的事物（譬如說，科學上的新發現，技術上的新運用），人們必然會要求與實行一種制度底重建或改革。我相信，人格可以意識地科學地改造，正如制度可以意識地科學地改造一樣。第二，以一國論，僅有民主的制度，是不夠的，必須還有民主的人格，才能成爲真正民主的國家。第三，以一人論，僅有民主的思想，是不夠的，必須還有民主的情緒，才能成爲完全民主的人格。

善哉美國麥高密克在紐約時報上談論幾位功成歸國的將士之言，「堪注意的，是這些將士，並不以『戰勝的英雄』的姿態回來的。他們是戰爭的犧牲者；他們固然是成功的戰士，但他們厭惡他們在以往所不能不做的事……他們爲了人類的受難而感動而震怒。他們自己是人，他們看別人也是人。他們的民主，不僅僅是屬於頭腦的，更是屬於心腸的。」事實如果確是這樣，那真是再好沒有了；但至少可以見出美國人對於「民主人」的要求。

## 二、他山之石

美國民主的道路，也許不是最理想的。即就制度本身而言，也還有應當

「請求減少對教育的地方。但是，「政府是屬於人民的，應由人民主持的，爲了人民而存在的」這一個觀念，最早是在美國具體地語言化（林肯所作蓋德新歐戰紀念演說），而美國人從事民主政治與民主生活的實驗，也有三百年左右的歷史了。在這裏，研究一下美國的民主思想與民主制度，看看一下他們所崇拜所要求的民主人物與民主人格，再看一看在他們中間，是不是一有「不民主」的人，或許不是毫無裨益的。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用戲劇對話方式，寫成一部「共和國」說明他的政治理想。不久以前，美國一位歷史學者，也用戲劇對話方式，也寫成一部「美利堅」，說明他對美國的政治理想。皮亞特 CHALETREAUWARD 所寫的「民主」，具有四點：

「第一，人民，不是合法化的君主或封建，是一切政治權力的源泉。這並非是說全體的人民，但也不是佔有少數大約比例的人民。至於這個比例，究竟大至如何程度，此則無定，或永遠將成爲一個爭執。投票人選擇政府中主要的行政職權人，再由這些人間接選擇其他一切關於生命財產賦有政治權力的人員。

第二，經過投票人選擇的行政職權人，建立一切法律。  
 第三，在固定的週期，所有政府中主要的行政職權人必須或者退休，或者如果企圖求留位的話，必須將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動，通過投票人的手續，交由大眾評判。

第四，在這個手續上，一切投票人都是平等的，那就是說，每一個人，不論知識的或道德的或經濟的資格，祇有一票，不得超過；選舉時，候選人獲得最大多數的選票的，不算是過半多數或比較多數，一般的作爲當選。簡言之，民主從理論上講，投票的權利是平等的，尋求與持留職位的權利是平等的，選舉是由過半多數與比較多數決定的。」

皮亞特又以爲民主制度的保障是成文的憲法。憲法規定那「多數決定」的範圍與性質的，如果沒有憲法爲限制，多數何常不可作出那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權力的決定！皮亞特說明美國憲法的精神，也分四點：

- (一) 治理我們自己的重大的規章，應由正式提議，公開討論，大眾投票決定的手續來建立的。
- (二) 一切官吏的權限，應爲人民基本權利所限制。
- (三) 所有行使權力的官吏應爲投票人直接或間接所選舉。
- (四) 凡是直接選出的人員，在一定期限內賦有規定的權力的，當然須

於那選期來的選舉中選受評判。至於人民的基本權利，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早有概括的說明——「生命，自由，與尋求幸福」；又，「一切人民生來都是平等的」——而在憲法底第一至十條修正文中，更有成文的詳細的規定。

托利史史 O. P. TOLSTOVS，美國紐約時報派駐日本東京的通訊員，在日本倫敦珍珠港之日，爲日機所炸。三個月後，美日交換條約，托利史回至美國，寫了一篇稿文，「民主對於我有什麼意義！」他說：

「民主的意義是什麼，從來沒有像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日，當一位日本檢察官逼問我，要我告知他，美國政府爲了什麼目的而存在的，那一次的那樣有目的地印在我心頭的。我已經過了寒冷而饑餓的三個月，兩週監禁在日本的牢獄中。我會被日本警察以死刑威脅，我會飽受虐待，過我承認自己是間諜。現在那位檢察官，因爲我會將日本的情形忠實地報告給美國的刊物，却更欲試用合法的日本形式，編織於我的頸項，致我於死了。他繼續地假定，美國的新聞記者都是間諜，因爲日本報紙的地位是這樣的……在日本，一切都在一個匪徒政府暴力控制之下，所以民主政府的作爲，是完完全全在他們理解之外的。而那個「不瞭解」，會以個人的受難如此痛苦地迫我覺悟，使我向所未有的那樣深切認識，什麼在美國人平時視爲平常而無足重輕的——那民主的可珍貴的傳統……我比一向更清楚的覺悟，這一次大戰所學的是什麼——

生命——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看起來是多麼平常的一回事。可是千千萬萬人民，在極權的統治下，依據如下的見解被培養着——即是，除了作爲一個民族的或民族的集團底構成分子之外，他們沒有個人的生存，而任何對於狄克推多的反抗，必然致使生命喪失……

自由——「生活着一個自由人的生活」的權利，享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以及那組織自己的生活而不受政府的或超政府的機構與他們底突擊隊任意干涉的權利；不問一個人是屬於多數的，或屬於少數的，或是完全孤立的……

幸福與尋求——規定自己的生活目標並使用本人的全部能力去達這些目標的權利。這是最高的權利，從上而兩種權利出來的；唯一應受的限制，是旁人應有的權利應如同本人的權利受到平等的尊重。

在我的心念上，這三種權利，實可包括民主政治的全部意義與目的。這三種權利，在一個個人與別人交往的時候，凡是不把別人當作人的，或

這不能平等地尊重別人的權利，以致損害別人的生命自由或幸福的；或是自視太高，自覺比別人偉大，比衆人神聖，對於別人的存心或能力或知識，不問是同樣或那裏或大眾人民，不能放心，不信任的；或者自信過度，甚願爲人民謀幸福而不顧與人民合作共謀幸福，勇於爲人民計謀決定而不耐那一正式提出公開討論大眾投票決定的一拘手續的；或任意地或濫地濫權濫權英雄主義，對於任何限制都感煩惱，對於任何異議都生反感，甚至有時不惜作英雄救世之舉的——這樣的行爲，這樣的人，至少在美國，絕不充被認爲是不民主的。

### 三、視人如己

金碧只有二百三十頁，一冊林青的信件公文與演講稿的雜集，是在美國出版，專供高中學生閱讀，並爲訓教一般公民用。作者泰晤而 T. D. M. [譯音]，以爲林青是美國民主政治所進出的在智力與道德兩方面最完美的人格。他在「給林青的」，提出一由自我學習的問題，要學生從林青的偉大與林青的作品中，學習答案。我先把問題全文在後錄出：

(一) 關於一個人在民主政治中本身應當是怎樣的，什麼是林青的觀念？

(一) 有自尊心？

(二) 自我稱頌？

(三) 自力發展？

(四) 公衆的權利，放在私人利益之上？

(二) 關於一個人在民主政治中和其他人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什麼是林青的意見？

(三) 關於一個做公僕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和大眾人民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什麼是林青的主張？

(一) 他是否相信人民確有能力去想透一些公衆的問題而自行有所決定的，什麼是林青的意見？

(二) 林青如何所指，在他用「欺騙」人民這一詞時？

(三) 什麼是林青所稱謂的正誠與忠誠的領導人民的道路？

問題並不神祕，但一個人自己應當是怎樣的，如何與友人或敵人相處，如果屬於公僕的地位什麼應是對人民的態度，這三者，一個人在民主政治中

政治下的人，怎麼可以不檢查自己弄清楚呢！

林青的做與作品告訴我們他是怎樣一個人！他出身貧賤，從小幫着在田裡作工。「他的父親是不識字的，養自己的名字都感覺吃力。」林青總共上了不滿一年的小學。「他差不多到將近二十歲的時候，才感覺有學習文法的需要。」往往在全日辛勞工作之後，解讀一冊文法，就作中車後的煙火，孜孜學習。他是真正懂得自尊自強與自力發展的人。他有一位異父弟（他的後母之子），似乎不滿意出身，時常向他借錢。他有一次回信說：「我現在和你約定，從今天（一八五一年一月二日）至本年五月，大凡有一元錢是你用勞力賺來的，不管這錢是怎麼來的，我亦不給你一元錢；如果你願意這樣做，你不久便可積錢幾百，而且更妙的是，你會養成一種習慣，使得你以後不再欠債了。」

在他和杜格格新法其競選伊利諾省的參議員而公開辯論廢除禁酒期間的時候，杜的指詞巧妙而辛辣，在該國北部可公認爲一種主義，但在南部可認爲別一種主義。林青質問他這點，使杜不能不顯露表示態度。杜所表示的態度，恰是那時對該省的人民認爲滿意的；這使杜當選而林青落選。林青憤憤自己的前途，必求是非真確的明白。泰晤而說：「這類的政治道德畢竟是最佳的政策；兩年之後，林青被選爲與他競爭爲國會議員，就是有力的證據。」

林青是一個辯論的對象，不是禱死。他後來結婚的那位夫人，原先在林青方面不是完全主動的；在第一次約定舉行婚禮的那一天，林青跑掉了！經過若干時間，兩人才又恢復舊情。他擔任總統之後，他原任命的國務卿西華德，以爲他是一位「地下律師」，未能應付當時南北決裂的危局，曾提出辭職，暗示林青應委指調員一人，代其負責。林青明白他的用處所在，自不願見憲法規定的總統權力，轉移旁人。但他並不拒絕，並不讓西華德心平氣和地提出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而對西華德始終保持友誼，合作到底。他在南北戰爭中擔任海軍大元帥，他關心軍事，還任主席，但他在人羣裏，決不與細于涉，事必躬親。他在一八六四年四月三十日發給西華德的一封信中說：「你應該對中詳細無遺，我既未知曉，亦不求知曉。你應該與到，而又善自稱頌，我對此頗感厭煩，自不願再對你的來信，檢閱的東西阻礙。固需我竭盡大的收使或大數長官的信件不致發生，但此兩項困難情形，避免的注意，較之逃避的注意，更加沒有可能。如要瞭解什麼是在我的權力之內可以供給的，務必不可不謹慎知道。」



他是美國最早主張「女子有政權」的一個——一八三六年他創辦報紙發表他的政見時說：「我贊成一切納稅當兵的人都有政權，女子亦不例外」。他也是最早承認「勞工的重要」的一個——一八六一年他給國會的年報中說：「勞工先於資本，亦不依賴資本，資本祇是勞工的果實，而如勞工不先存在，資本便亦不會存在。勞工實較資本為高，因之值得給予更大的重視。當然，資本也有他的權利，和其他權利一樣，也值得保護的。」他對於廢除黑奴，有兩層要求：一方面因他會目視黑奴販賣的慘酷，從人道主義出發；另一方面他堅持正義與公平的觀點——一八五四年十月，他在某次演講中答覆那些主張廢除黑奴與否者有可自作決定，外來干涉即是侵犯「自我治理」的原則」的諸辯者云：「如果黑奴是一個個人，那麼主張他也有權利治理自己，豈不根本破壞了自治SELF-GOVERNMENT」又在與杜格拉斯公辯辯論中云：「我同意杜格拉斯法官的說法，在許多方面黑人不是我的平等——當然在顏色上他不是的。也許道德與智力的實質上此刻還不是的。但在享受他自己的手賺來的麵包而無須向任何人道歉這一點權利上，他是我的平等，也是杜格拉斯法官的平等，也是每一個活著的人的平等。」

林肯於那有利於美國南部經濟的黑奴制，與那有利於美國北部的工業經濟以及中西部的自耕農的雇工制，衝突決裂，甚至不可收拾的時候，就任美國總統。他的唯一願望，乃是保全聯邦，恢復團結。團結高於一切；爲了面對現實，他不得不暫時放棄理想；他對於黑奴的全都解放，不復堅持，僅求黑奴制度不再蔓延於原無黑奴之地；甚至連這點都不妨讓步——先求聯邦的完整與存在，祇要不起內戰，無事不可商量。他實有犧牲道義之嫌，但他的態度却是光明磊落的。他不作掩耳盜鈴之舉；他不從事於曲解粉飾，希冀窮寇定皇地自圖其說，齊解於人民；他未出一句欺人之言；而是忠實地坦白地簡單地將他的主張與立場，告知大眾，他作國客復約論壇報主儘立即解放黑奴的社論，便大膽的說：「我在這大門等中最高尚的目的是保全聯邦，而不是保全或毀滅黑奴制。如果我保全聯邦而竟不能解放一個黑奴，我要做的；如果我保全聯邦而又能解放全部黑奴，我要做的；如果我保全聯邦而祇能解放一部份黑奴，其餘不得不聽其自然，我也要做的。」他在另一篇講演中說：「一個人家，分裂而對立的，是不能存在的。我相信這個政府決不能永久地持著一半奴隸，而一半自由人。我不預期聯邦會得解體——我不預期這個人家會得傾散——我知預期它會停止分裂。它會或者完全走這一條道路，或者完全走另一條道路。」

林肯曾說過，「你可以永久地欺騙一部分人民，你可以暫時地欺騙全部的人民，但你不能永久地欺騙全部的人民。」林肯一生對人，不論充家人，是親戚，是朋友，是仇敵，是同僚，是路人，或是一般大眾，從來不信他們有區別是非與識得真偽的能力而不同欺騙的。因之林肯有一個綽號，叫做「忠實的呆伯」HONEST ALB；「呆伯」是他的原名「呆伯拉罕」的縮寫，「忠實」是稱道他與人相處的態。忠實——在它的理解中，就是不愚騙人；不玩弄人；不欺視人；不欺毀人；不巧妙地佔人的便宜；不圖藉個私人在身邊弄些弄弄不弄的人；不來京派戲子的一套，實面恭而無微不至而背後惡毒刻薄地形容人！忠實，在我看來，應是民主人格最基本的條件。

至於林肯的出身貧賤，幼年失學，離婚走避，喜說笑話等等，其實是不值顧人一的；而何以美國人這津津樂道？我想或者因爲在這些事情上面，正可見林肯的「與衆無殊」——和普通人民同樣的平常，同樣的樸實，同樣的大情，同樣的人性，同樣的偉大，同樣的醜陋，同樣的可愛，也同樣的可笑！總之，在民主的美國，大家不喜談超人的。超人假如可能的話，至多限於他的一技一藝；至於日常生活與個人人格，他仍希望他愈不超羣衆人愈好——如果衆人輕易承認有超人，那麼對於國事重大問題，何能更有「公開討論多數決定」的自信！超人的危險是在慢慢地必然地與大眾區甘苦好惡隔閡；本去年去世的羅斯福總統，領導政治數十年，如此爲多數民衆愛戴，而他在會見新聞記者時，在一般的待人接物時，處處留神於給人以「非超人」的印象。而美國民衆的要求他們「偉人非超人」這一事，似乎值得一切的「候補超人」深長思的。

#### 四、英雄主義

特立老老先生在湖南官中學校長的時候，曾對學生說過一番話——「我當然不可能離開，我是從他底一位學生那裏間接聽來的，我親我的記憶大致不錯——世界上有四樣人可做，一聖賢，二英雄，三英雄，四君子。君子不必論，聖賢不易得，但在英雄與英雄之間，吾人應知所擇。英雄多不免自私自利自負自負，而英雄卻能隨時時，顧大局！這是若干年前的話了。在今日，我誠感覺，自名的英雄，不論是那一個的，亦不論正在從事那一種事業，總不免失敗的多，成功的少；譽世的多，濟世的多。英雄的努力雖可取，英雄主義

才高者。英雄與凡人相類，這絕不可得之小成。英雄主義和民主人格，是格格不入的。

在英國的民主政治中，還是可能有英雄主義的自視超人的不民主的人格。最顯著的例，是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總統威爾遜。在威爾遜執政的初年，國會通過不少為人民謀福利的法案：(一)一九一三年的減低保護稅案，使得美國工業品的價格降低，廠家利益雖減，而人民生活較好；(二)舉辦所得稅，使得收入多者，納稅的義務比例地增多；(三)成立聯邦儲備銀行十二項，一舉而掃除私人銀行濫發鈔票的危險；(四)通過「莫門反托辣斯法」(莫門係提案人名)，防止那獨佔性的商業聯合，制止大商業對中小商業不正當不公平的競爭手段；(五)通過海員法，使海員對雇主處於較有利的地位，並規定船方必須改善海員生活的環境；(六)規定鐵礦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制；等等。關於這些法案，國會裏的功績，固然應當是多於總統的；但到底不能不算是威爾遜的貢獻——爲什麼不早一點在別人任內實施呢！不過，在威爾遜自己處理的一件大事，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便可充分地看出，他底人格是如何的不民主了。

最近看到一張敘述威爾遜生平的照片，裡面描寫他的家庭生活，日常與子女愛歡聚歌唱，以及妻死後寂寞的一些情形，也是極人情化的。又描寫他懷着永久和平的理想，主張美國應對世界前途多負責任，反對美國傳統的獨善其身的孤立傾向，更是值得敬佩的。但片中描寫參議員洛其LOUISE的爲人，不願大同，肯於正義，惟洩私憤，舉凡威爾遜所作爲所成或所企圖，必盡毀而後甘心；並將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的失敗，威爾遜爲美國人民背棄，以致氣憤身死，一切責任，都歸之於洛其底存心搗亂——影片給人的印象，是威爾遜一生的悲劇，爲達到洛其這個私人對頭，如果洛其早死兩年，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威爾遜的計劃必可在國內得到通過，在國外順利進行，國際聯盟必然成功，天下太平，決無第二次世界大戰——未免過於歪曲事實，顛倒黑白了！其遺失敗的責任，應由威爾遜負其大半，由於他的不民主的人格，幾至使條件不能不失敗的。

洛其是一位士君子式的學者，在國內聲望甚高，在國會中的實權亦甚重，與威爾遜。我們中國人亦應該感念他。在他對國際聯盟中規定以對日本給日本的時候，他戲劇的在國會裡說：「我老了，但我還許許多多活著，我不願意有三天孫輩重演這慘劇，美國把中國的青島給日本，做了一件不名譽極不公正的事，祖父或曾祖父，從前都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你是怎樣主持正義的，你做了些什麼？我不願意到那時慚愧得無詞以對！」(大意如此，詳詞須查當年美國報紙)。由於洛其的反對(他主持的外委會提出修正三十九點)，巴黎和約未能在國會通過，美國政府亦未簽字，這樣後來纔有華盛頓會議，以青島威海衛歸還中國，與簽訂九國公約之事。不管國會與公約的成果如何，評定洛其爲不解正義與毫無理想的人，實在是不應該的。

洛其誠然是一個「美國主義」者。他深信美國對於任何國際糾紛，都應置身事外，除非它的安全與榮譽受到威脅。在裏受到威脅的時候，美國應準備與決心作自衛的戰爭；但在戰爭結束之日，美國應再謀與國際糾紛中解決，獨行其是，不管開事。這個傳統的美國外交政策，在現代或許可說是落伍或錯誤的，但不難言之爲不誠懇或結怨取鬧，洛其處在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地位，以爲執行這個傳統政策是他底職務，而威爾遜以總統的身份，欲以一個人代表美國全部人民的公論，欲以一個人包辦美國的外交政策，對國際問題獨斷獨行地隨時讓步與提供諸言，乃是犯了美國憲法給予參議院諮詢與通過一切條約之權。洛其的主張，是爲當時美國不少數的人民所同情的。而威爾遜赴巴黎參加和會，不僅抹殺了洛其的主張，並且抹殺了洛其的地位，始終不理會參院的外交委員會。無非由於他的自負太深，個性太強，他才會這樣相信，正義完全在他底一面，而成就這絕對有把握的——這不能不說是威爾遜英雄主義的表現。

關於威爾遜在巴黎參和會的情形，我現在從亞倫所作的「克魯日」ONLY WEDNESDAY一書中引譯一節；這是一部記載一九二零年在美國社會生活的史實，在美國在英以極流行的。——「現在德國是打敗了，一片位猶忌威的歐洲政客正在各自打躬，在這次巴黎會議中，怎樣爲自己國家謀求私利，爲自己個人獲取光榮。他們願望這這次戰爭的戰利品。他們這說家會對威爾遜嘆息(註：威爾遜初止，威爾遜親親遊法戰等國，曾受民衆極大的歡迎，當人亦巷々夾道歡呼)，但是他們也曉得，民衆並不堅定的，那就可以對拓展領土與罰款賠款喝采的。這些政客決心要在巴黎開這一個可以便得他們擴張而歸的劫約；世界的潮流，如果威爾遜可能說得的話，正在這反着他們。人性，在整個世界上，開始出現一個新面，歷史上第一次戰爭結束之後都會如此顯現的。對於團結的迫力，已經消失，分裂代之而起。對於理想的迫力，亦已消失，現實却在得勝；而且命運的發展，不僅通過這世界底外交家與新進軍政要國者，亦並通過威爾遜在心靈與性格上的特殊限制。





# 目前局勢和今後任務

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全國局的決議，通過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

▲這個決議是向來作爲一個草案，以供全國委員會以及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全體會員討論和採取行動的。

▲全國通過決議投票情形如下：

贊成者：莫爾、吉爾茲、小本傑明、威維斯、歐琴、台尼士、伊麗沙伯、弗林、傑姆士·羅斯、威康、羅斯脫、吉爾勃脫、格林、羅勃、曼納、羅勃

反對者：愛爾、白勞德。

棄權者：羅曼、勃特。

缺席者：威廉、許乃德。

## 第一部份

一

軍事上打敗納粹德國，是世界民主和全人類的一個偉大的歷史勝利。這劃時代的勝利的達成，是由於英美蘇聯的聯合行動——由於紅軍決定性的打擊，由於美國和英國的攻勢，也由於抗戰運動的英勇鬥爭。這個勝利，給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激進毀滅開闢了道路，並且開到了各地反動和法西斯的力景。它已經在歐洲各民族間形成了一個反法西斯的新的團結，這是由若干國家代表人民意志的民主政府所成立表現出來的。它同時也爲導致日本帝國主義的迅速敗北奠定了先決條件。這樣，實現持久和平的巨大動向可能性已被打開了。

二

然而，一個尖銳和堅決的鬥爭必須繼續進行，以保證在歐洲和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徹底毀滅，並且保證建立持久和平的現在可能性將來一定實現。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歐洲法西斯的經濟和社會基礎，還沒有完全被消滅。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英美的以托辣斯和加透爾爲中心的非常強大的反動力量，正在竭力設法把解放的歐洲重組在一個反動的基礎上。再則，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美國的帝國主義中越發侵略性的集團，正在竭力設法使他們自己取得世界政治和經濟的霸權。

隨着反納粹戰爭的結束，美國資產階級中某些重要的，過去曾經反對過帝國主義的集團，現在正和托爾資本中反動和親法西斯的各集團——和全國製造業協會領導機構中親法西斯的杜邦集團——握起手來了。爲了消滅他們的帝國主義動機，這些大企業集團到現在爲止，雖然並不願決，支助了反希特勒的戰爭，到今天，他們被勝利的民主成果嚇壞了。

正像他們的英國的同類，他們驚駭於世界工人地位的增強，歐洲民主進步以及殖民地附庸國家種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因此，他們設法阻撓住民主的進程，抑制勞工和人民的力量。他們企圖保留德國和歐洲其他部份的法

西斯殘餘。他們正在設法組織一個新的「衛生帶」來反對蘇聯，而蘇聯則在這次反納粹戰爭中擔負了戰爭的主要負擔，它是民族自由、民主與世界和平的最堅強的戰士。德國失敗後與資產階級的這種重新組合，已經由最近國聯的許多行動反映出來。舊金山會議上，美國代表團中多數人都對某些問題上向極端反動派讓步這一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種讓步，他們說離了德蘇無間，德國連所曾做到的，羅斯福的團結三強的外交政策。

資產階級這個重新組合，說明了為什麼羅斯福丁羅斯和康納利會受影響而在最基本的問題上，和胡佛的代理人范登堡以及美國財政資本中最富掠奪性的各派攜手。這說明了法西斯阿根廷的出席和英美的不願在波蘭和德國問題上實行雅爾達協定。這就是為什麼舊金山美國代表團拒絕聯合蘇聯一起去保證委任統治地和殖民地的民族獨立權利，並且拒絕正式承認為六千萬有組織的工人發言的世界工大會的代表。

大資產階級若干集團的這一轉變，說明了對於的里雅斯特的反動的干涉以及用武裝力量對付我們盟邦南斯拉夫的威脅。這個發展，也說明了華盛頓和倫敦為什麼實施阻止中國強盛，團結和民主的危險政策……這個轉變也是新的反蘇強硬和煽動運動的原因，這運動企圖破壞美蘇友誼和合作，而美蘇之間的友誼和合作，則是打敗希特勒德國，取得勝利的基石，也是達成戰後和平的不可缺少的關鍵。

在國內戰線上，反動陣營正在阻擋一個令人滿意的政綱之發展，那政綱在隨着復員而來的經濟失調和嚴重的失業恐慌之際，是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的。又動力量，特別是全國製造家協會及其在國會中的代表們，正在計劃一個公開的行動，以削弱或摧毀職工會。他們正在設法阻止政府採取一些步驟，這些步驟，假如我國必須避免將來經濟危機的最嚴重的後果的話，是必須立刻採取的。同樣地，他們正在拚命準備在極端重要的一九四六年選舉中獲取勝利。

如果這些反動的政策和力量不受抑制，不被擊敗，美國和世界將面對新的侵略和戰爭，而對反動和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的蓬勃生長。

二

雖然，能够擊敗這個反動的威脅，能够使我國在世界事情中，符合美國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而起進步作用的條件和力量，是存在着的。首先，納

粹德國的軍事失敗，已經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有利於民主。它增強了會主義國家的作用和影響。它加強了美國和其他地方努力維持和鞏固美蘇友誼和合作的力量。美蘇的團結現在必須擴大和加強。美國絕大多數人民，首先是工人，反對着反動和法西斯主義，擁護着體現在德黑斯和克里米亞決議以及第二人權宣言中的羅斯福總統的對外對內政策，這一事實，證實了這一點。

這大多數人民現在必須說出並肯定集體的力量和意志。工人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團結的勢力必須以決斷的態度有所表現，以使國家堅決地向進步的方向走去。

美國人民必須緊決擁護社會門政府繼續實行羅斯福的為了勝利、和平、民主和六千萬人的職業的政綱的一切努力。同樣地，人民必須對這此政策一切躊躇，作尖銳的批評，並且竭力反對對反動派作任何讓步。必須不斷地動派妥協——必須使它孤立，殲滅它。

為達到此目的，必須空前地加強全國民主團結。必須聯合並鞏固一切反法西斯和民主力量最廣泛的全國聯盟，其中包括擁護羅斯福反動心政策的一切人們。為了最有效地形成這個民主聯盟，為了使它對國事發生決定的影響，就必須加強工人階級，特別是進步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者的獨立作用和活動，並且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顯示這巨大的主動性。必須發展並擴大職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以及鐵路工人聯盟會之間的最大限度的團結，並且做到使它們完全參加新的世界職工聯盟。

工人在和各界愛國的和平民主的力量合作的時候，首先必須增加自己和隊伍軍人，勞動農民，黑人，青年，婦女，無產者以及小商人及其民主團體之間的聯系。

三

為了達成最廣大的民主聯盟以及全國最有力的反法西斯團結，至關重要的，是工人須提出一個行動的綱領，這綱領須促進法西斯主義的完全滅亡，加速擊敗日本帝國主義，抑制托拉斯和壟斷家的勢力，提出人民的經濟福利的建議，保護並擴大美國的民主。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認為這樣的政綱應該以下列行動口號為基礎：

(一) 加速廢除法西斯主義的日本

▲揭發和懲罰主權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妥協和平的人們。  
▲以一切殖民地附屬民族的獨立之權保證亞洲的自由和民主。抑制設法使帝國主義控制運道的人們。

▲促成中國在共產黨人和其他一切民主和抗日力量團結的基礎之上形成團結和自由的中國，以加速勝利。給與英勇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領導的中國游擊隊以充分的協助。

▲繼續不斷的戰時生產，堅守工人在戰時不罷工的諾言。停止僱主的煽惑。

(二) 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建立持久的和平

▲鞏固美蘇友誼和團結，以保證實施德黑蘭和雅爾達的協議，保證持久和平和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消滅。

▲完全實現三強在克里米亞所作的決定。

▲懲辦戰爭罪行，再不延遲。處死一切法西斯戰爭罪犯。使德國以勞力賠償物作充分的賠償，以供歐洲的重建。

▲加強世界職工大會，把它作為各國人民和各自由民族團結的骨幹。

▲維護建立一個以明巴教條計劃和雅爾達協定為基礎的有效的國際安全機構。

▲保證各民族都有自由決定其自己的命運，以及建立其自己的政府的民主形式之權。停止英美干涉各民族如希臘、比利時和意大利等。

▲立即給波多黎各各民族獨立。

▲和佛朗哥西班牙和法西斯阿根廷斷絕外交關係。

▲撤換國務院中一切親法西斯和反動的官員。

▲援助飢餓中的和久經戰亂的歐洲的食物和復興。拒絕胡佛的以反動的財政抵押和統治干涉為基礎的計劃。

▲通過布列頓森林貨幣建議案以及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及擴大世界貿易的其他民主辦法。放出大量的長期低利貸款和信用借款，以爲復興和工業化之用。

(三) 滿足人們在後戰中的需要——推動爲六千萬人獲得應得的鬥爭

▲使工作的權利和羅斯福的第二次人權宣言成爲美國的法律。

▲增加購買力以促成最大限度的就業。當加工取消的時候，不減少每星期的淨得工資。

▲爭取立即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以適合生活費用的增加。在全國範圍內規定足夠的每小時最低工資。

▲建立保證每年工資的原則。

▲爭取更短的工作週而不減少工資，足以阻礙戰時生產者則屬例外。

▲維護社會門的制定緊急聯邦法案，以擴大並補充現有失業保險福利的建設。開始在失業職業之時立即付給職業保險金之積項支付下去直至失業者獲得新職業爲止。對解僱工人發給足夠的遣散費。保證年輕工人的重新訓練，教育和重新就業。

▲開始大規模的聯邦、國家和市政公共工程計劃，如縮消陋巷，建造租金很低的房屋，農村電氣化，建造新的學校，醫院，公路等等，以避免復員和戰後時期的日益增漲的失業現象。

▲不減縮政府所有的工廠。如果私人工業不能爲了和平時期的用途而使這些工廠儘量開工，則政府必須經營。

▲繼續並嚴格加強房租和物價管制以及定量分配制度。加強物價管制局的法律賦與的權力。推銷黑市。

▲利用「工人——僱主憲章」以促進尚未組織的人組織起來，加強集體契約，保衛職工會，使不受工賊的攻擊，提高生活水準，並促進爲爭取六千萬人的職業的鬥爭。

▲密制戰時囤積居奇者。不減少公司股份利稅和富者的所得稅。

▲通過嚴格納稅——摩率——丁格爾社會安全法。

▲維持公平的農產品價格，並保證一切有困難的農民得到國家和聯邦的補助。

(四) 報答以戰鬥取得勝利的軍人們

▲保證一切退伍軍人，不分種族、信仰、和膚色，都有職業及安全。

▲擴充「士兵人權法案」的範圍和利益，消滅退伍軍人機關的一官一職文章。保證每個退伍軍人都有充分的醫療看護。

▲力促進速建立法案，以大量的款項作爲復員費，復員費的支付以軍役

的時間和性行爲標準，復員費的來源，是徵收收入較多的個人和公司的稅。

▲保證一切退伍軍人法律的權益，充分適用於黑種退伍軍人。

(五) 保衛並擴大民主

▲對任何損害公眾的平等權利，不論其種族、膚色、信仰、政治黨派或民族統制。

▲停止奴隸黑人，禁止反猶太主義，取消一切反共的法律。廢除人頭稅和白種第一主義。停止武裝部隊中的各種歧視制度。

▲保護工人的權利，特別是組織和集體談判之權。

▲禁止一切法西斯團體和活動。

▲禁止危及國家幸福及世界安全的斷斷索和托派黨的權力和政策。檢舉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動，以及設法恢復或繼續英德美法加澳制度及營業的一切行動。保護小規模工商業，擴大聯邦對小規模工商業的援助。

這四個原則代表美國國民和國家的最迫切的利益。這並不是一個爭取社會主義的計劃，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完全消滅不安全感，剝削，壓迫和戰爭。這是一個當前的行動計劃，美國進步人士今天是在這四個原則周圍的。它們行動將助成法西斯主義的消滅，促成更穩固的和平以及更大的經濟安全與民主。

這個計劃能獲得大多數的人民以取得一九四五年內市政選舉的勝利，以及決定命運的一九四六年國會議員選舉的勝利，這些選舉必須現在就加以組織和準備。這個計劃，經由工人的政治行動，經由巨大的職工會代表會議以及團結的各業團體，經由其他的方式和組織爲媒介，一定能在各工廠各工業中受到擁護的。

## 第二部份

### 五

上述政綱不是輕易就能取得勝利的。反動派將拼命設法分裂人民的行列

，嚇使一個退伍軍人團體反對另一個退伍軍人團體，使人反對工人，非猶太人反對猶太人，白人反對黑人，耶穌教反對天主教，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對產業聯盟大會。他們將竭力設法破壞共產黨的影響，消滅共產黨的影響，消滅共產黨的影響。爲了這些目的，他們將利用各種動員共產黨第一秘密武器，包括利用大衛·杜賓斯基和諾門·托麥斯之類的神會民主黨人，托洛斯基派人物以及約翰·羅斯和瑪修·伍爾斯之流的人物。

爲了對付這個局勢，人民需要大大加強每一個進步團體，特別是工人的團體——職工會。他們需要忠實，勇敢和誠實的領袖，具有遠大的眼光和堅定的原則性以及戰術上的靈活性揉合在一起的男女領導者，最重要的，他們需要一個更大、更強、影響更廣、更有能力的共產主義者的監察組織。

共產主義者現在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對工人和民族，負有更大的責任。而這些更大的責任，能夠由我們光榮地負起來，因爲我們對於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專業，會長期献身和服務，也因為我們堅守著馬列主義的科學原則。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面對着將來。這幾年來，我們以反對反動和法西斯主義的堅決而英勇的鬥爭爲榮。我們從德蘇收斂轉變回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努力，是我們奮力去之所在，也是我們特別引以爲榮的一點。在廢除上和國內職權上，我們共產主義者向來站在戰鬥的最前線，以保衛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在爭取建立反希特勒聯盟的鬥爭中，在爭取第二級鬥爭，爭取全權團結，爭取重選羅斯福，爭取黑人的權利，爭取補強強大和進步的工人運動，爭取不斷發展生產，以及爭取國際職工會團結的鬥爭中，共產主義者的貢獻，一向是說也比不上的。

### 六

我們認識，工人和進步運動的將來，以及因此美國在世界大局中的將來的作用，在不小範圍內都將依靠我們共產主義者的政策的正確性，依靠我們的獨立的作用和影響，依靠我們的羣衆活動和組織力量。

這就是今天我們共產主義者必須不僅從我們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成績之中學習，而且也從我們的錯誤和錯誤之中學習的緣故。在最近期間，特別是從一九四四年一月起，這些錯誤是在於從德蘇協定的歷史意義中，引出一些錯誤的結論。在這些錯誤的結論中，有一個概念說，在德國失敗之後，大資產階級中將具有決定性的各派會加入完全消滅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且

會和工人合作，以期將過剩的產量歸納。不論從財政資本的階級實質說來，不論從以人民為犧牲，尋求帝國主義的擴張和領土利潤的托赫斯和加法爾的戰後目標說來，這個幻想是沒有實生活的根據的。近來的事務，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馬列主義的理論上關於資本的作用，特別是軍事勝利之後的作用的這種修改，引向其他錯誤的結論，例如托托式的經濟展望，以及殖民地附屬國家能在列強的安排之下獲得民族解放等等。這種修改也造成各種使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實質模糊起來的傾向，造成社會演化的錯誤概念，使工人階級的獨立和領導作用減至極小。

不僅如此，我們在我們的共產主義組織形式所作的變化，是在上述修正主義的錯誤同時發生的，這並不能不加強這些危險的傾向，傾向于瓦解共產主義運動的獨立和先鋒作用。要實現我們極端維新派的正確的政治政策，也不必要採取解散的行動。

共產黨改組為共產主義協會的結果，雖然並未減少會員的人數（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一九四五年的會員登記，說明共產黨一九四四年會員登記比較起來，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但同樣確實地，共產主義運動在產業工人中的生長無疑地受到了阻礙。

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形式或名義的改變，並不是一個原則問題，然而，我們的共產主義組織，不論其組織地如何，其性質必須是工人階級的獨立，馬克思主義的，則是有階級性的。而現在，我們必須在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組織、政策和外聯中保存這個原則。

當我們討論在戰時主要目標：即一個階級于戰爭的勝利，摧毀納粹德國和軍閥日本的時候，這些錯誤由于一種過份簡化而只有一面的看法而變本加厲了。這些錯誤的造成，是由于我們在空前活躍地參加並促進全國團結的廣大陣營之際，下意識地讓我們的一些政策受到非工人的、資產階級的影響。由于我們不願以馬克思主義自我批評的精神來經常分析並檢討我們的政策和黨的工作，特別是由于我們沒有使全體會員討論和決定我們的基本政策，這些機會主義的錯誤是加深的了。

我們過去犯下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並沒有主宰我們的戰時各項政策。雖然如此，它們不利地影響了我們的戰時工作，限制了我們反法西斯活動的有收效，而且使共產主義和進步的工人運動在戰後期間有迷失方向之勢。當我

們共產主義者開始檢討戰後政策，並且對國際上若干新的發展有正確的反應的時候，我們對於世界的新發展，還是適應得太慢，因為我們沒有了解過去爬入我們政策之中他基本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因此，在這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羅斯福同志在反對會主義鬥爭中的重要貢獻。同樣地，我們應當學會杜克洛、法國共產黨最先進的領袖之一，在最近的文獻中所表示的誠懇的兄弟般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見的極本上的正確性。

### 七

顯而易見，要在戰後時期作為工人階級的民族的利益的比較意見而能幹的保衛者，來有效地完成我們共產主義的任務，其唯一的、最緊要的先決條件，就是迅速地決定地克服我們的錯誤和失策，特別是在我們的政策和黨的工作中肅清一切機會主義的殘餘。為達到此目的，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一切會員和組織必須立即對我們的政策和領導，作一次徹底自我批評的檢討。我們必須在黨組織之中建立真正的內部民主和自我批評。我們必須對一切和加強協會中一切負責領導的委員會中的人員。要這樣做，我們必須對一切宗派主義，一切歪曲，一切削弱我們共產主義組織的基本團結的傾向作戰。

同時，我們共產主義者必須避免一切教條主義的傾向，並且以極有力地擴大我們自己的反法西斯黨活動，積極地參加廣大工人和民主運動。我們必須堅決地加強我們獨立的共產主義的工作和黨活動。我們必須區別在產業工人中建設我們的共產主義協會。我們必須在理論上建立一個堅決的思想意識的鬥爭，提高我們每個組織和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

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保證一切力量，以摧毀法西斯主義，以促進美國和世界的民主事業，民族自由和社會進步的事業。我們決心和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以達到這些偉大的目標。



# 世界職工大會的籌備工作

蘇聯職工會  
中央委員會書記 M. 塔拉索夫

今年，我有機會和其他民主國家的職工會領袖們一起，參與幾次國際會議。在二月間於倫敦舉行的世界職工大會之後，該會組織了行政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先在巴黎，後來在華盛頓和舊金山開了會。今年，英國、保加利亞、法國和羅馬尼亞等國的職工會代表團，訪問了蘇聯，而意大利和美國的代團，不久以後也將訪問蘇聯。蘇聯職工會領袖們曾訪問巴爾幹各國及交際；有一組蘇聯代表團現在美國，另外一個正在伊朗。加強民主國家的有組織工人之間的聯繫，特別是蘇聯職工運動者和外國兄弟之間的聯繫的工作，已經做得很多了。英美法蘇及其他國家的職工會領袖們，正努力從事創造一個世界職工聯盟的重要工作，以擁抱一切國家的職工會，保障工人的利益。

這項工作目前的情況如何呢？行政委員會在三月間於巴黎舉行的會議上，已經草擬了世界職工聯盟章程的初步草案。行政委員會又在四月十四日起在華盛頓開會，繼續在舊金山附近的一個小旅館開會，直至五月初，在這些會議上，編寫了最後的草案。

行政委員會通過的章程草案，是在作為一個團體的基礎，這團體將是一個有效的武器，足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就廣泛意義上了解的工人的利益。

章程的序言說，職工聯盟的成立，是爲了實現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倫敦舉行的世界職工大會所規定的宗旨和目標。因此章程宣佈世界職工聯盟的首要目標應該是：

「把全世界職工會都組織並團結在聯盟中，不問其種、民族、宗教或政治意見如何；」

「在必要時，援助任何社會或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的工人建立職工會；」

「繼續鬥爭，以決定地擊敗法西斯國家，消滅一切法西斯形式的政府以及法西斯主義的一切形跡，不管它採取何種形式活動，假借任何名義；」

「爲消除戰爭及戰爭原因而鬥爭，以充實維護建立一個有力而有效的國際組織，來爲穩固而持久的和平而工作；」

「使世界工人的各種利益，由各團體國際性的機關來代表，這些機關的責任是在解決世界機務的問題；」

「組織所有國家的職工會的共同鬥爭：反對對於工人經濟和社會的權利以及對於民主自由的一切侵害；爭取滿足工人對就業安全的需要；爭取改善工時以及工人的生活條件的進步改善；爭取充分和足夠的社會安全，以保護工人及其家庭，使不致受失業、疾病、意外和老年的威脅；爭取採取一切其他辦法，以促進工人的社會和經濟福利；」

「爲達到此目的，世界職工聯盟把它的以下列原則爲基礎：

「一、各國職工會內部的充分民主以及各國職工會之間的密切合作；

「二、和各個參加聯盟的職工會組織經常

接觸，並對它們的工作作兄弟般的支持和幫助……」

根據這章程，一切國家的職工會中心，如果承認世界職工聯盟章程中規定的原則和宗旨的話，可以參加世界職工聯盟。由加盟各國代表所組成的世界職工大會，是聯盟的最高機關。大會擬定年舉行一次。世界大會選舉一個聯盟的總務委員會以及一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包括委員二十一人，其中有蘇聯代表一人，是世界聯盟的主要執行人員，指導它的各機關和事務。執委會由自己之中選出一個主席和四個副主席，這五個人和總書記在一起，構成世界聯盟的管理局，該局將是執行委員會不間斷的執行機關。執委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章程草案中規定世界職工聯盟的機關是在巴黎。

行政會議在巴黎舉行的會議上所未及成立最後協議的各點之中，有兩點是很複雜的：一點是世界聯盟所通過的決議，對加盟各國體是否有束縛性的問題，另一點是所謂國際職工會秘書處是否應有代表參加聯盟的各機關的問題。行政委員會化費了不少時間，討論這些有爭論的問題。但結果成立了令人滿意的協議，這一事實，意義十分重大。

我不願掩下下列事實：有些人確實在這些問題的意見分歧時投機取巧。他們希望那些分歧成爲無法克服的困難，或甚至使起草章程之舉成爲毫無結果的事情。這些希望是歸於破滅了。

在決議是否有束縛性的問題上，行政委員會所



與事而可議，是以下列兩項為根據的，即章程上必須保證世界職工聯盟不是一個無能的評議機關，不是一個聊天的場所，不是一個其決議無非是一堆廢紙的機關。我們認為加盟各國職工中心應該由有權威的人物代表出席世界聯盟，這樣，世界聯盟才能成為各國職工會的利益的代理人和保衛者。因此，聯盟組織機構的決議，對各國職工會中心必須具有約束性。這不然，組織一個世界聯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最後地分析起來，聯盟的決議是否應有的束性的問題，就是這些決議是否應該有效，因此也就是整個聯盟是否值得存在的問題。

章程草案第五條第四節，就是以這個原則為指導的，那一節說：

「在大會、總務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閉會之後，世界職工聯盟的各加盟團體須在三個月之內，把自己為了實施大會、總務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決議，把這些決議在自己國內實行而採取的步驟，通知總書記。」

至於國際職工會秘書處問題，是所謂阿姆斯特丹國際秘書處文納爾斯和國際運輸工人聯盟的奧爾登勃勒克所發動的喧嘩不休的爭論的綜合和本質的問題，其目的在派這些組織的數目衆多的代表，來沖淡世界聯盟的合設的作用。這預打算，固然憑藉着一些動議，那些動議和國際職工會運動的加強以及世界聯盟組織的宗旨，毫無關係。那些動議是這樣的動議，以致使行政委員會最後在在章程草案中，最好簡直不提到那些所謂秘書處，因為行政委員會注意到，要確實證明那些所謂秘書處是否真正存在過，它們做過些什麼，或它們代表着什麼人，簡直都是不可能的事。

章程中同時規定總務委員會需要時，可以成立各樣的「同盟部」。這些同盟部對總務委員會

和執行委員會負責。

由於章程草案成功，創立世界職工聯盟的工作，完成了又一重要階段。

行政委員會決定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召開世界職工大會第二次大會，以通過世界職工聯盟的章程。通過了章程之後，大會將繼續開下去，成為世界職工聯盟的第一屆大會。

開會的通告已經寄給曾經出席倫敦舉行的世界職工大會的各職工會團體，寄給曾被邀參加該會，但不及派代表出席的各職工會團體，寄給起初雖然沒有派代表參加倫敦大會，但後來在世界職工大會的委員會上通過入會的各職工會團體。

代表的原則如下：擁有會員十二萬五千人以下的全國性的職工會團體可派代表一人，十二萬五千人以上，五百萬人以下的團體，可以在每二十五萬會員中派代表一人，五百萬至一千萬人的團體，每五十萬會員可派代表一人，等等。在選票原則上，蘇聯各職工會有資格派代表至少四十人出席大會，英國各職工會代表的人數約等於蘇聯的一半，美國產職工大會代表的人數則和英國彷彿。

各國職工會中心正在致力於審查並研究行政委員會所通過的章程草案。它們將稍修正草案的意見提交巴黎的委員會。

這樣，面對着行政委員會的爭論問題，已經令人滿意地解決了。雖然如此，正如工人運動長期的經驗所指示的，創立國際性的職工會聯盟，不是一個輕易的任務。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以前從來沒有完成過的任務。以為工人階級運動的隊伍中不會有團結的敵人，就未免輕率了。有的——公開活動的和暗藏的都有。有一些人正在盡力阻止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接近。他們準備繼續其毒辣的分裂職工運動，這部分分裂職工會十分阻礙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

戰鬥，其惡毒的結果，曾經在各國引起了很多的事實。

在行政委員會的工作過程中，我們遠遠過這類以這一類或那一類形式出現的傾向。不必諱言，這些傾向為最經常的代理人，是所謂阿姆斯特丹職工國際的秘書處文納爾斯。客觀地回憶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承認，行政委員會的若干委員方面對於這些傾向，並未經常加以迅速而有力的駁斥。

使聯盟的會章失效，使總會章程上古老的不積極和無能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幹部的企圖，特別是承認該國際以代替世界聯盟的提議，反映不整齊份子的詭計，這些份子甚至現在還在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隊伍中進行分裂政策。主要的分裂者是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威廉·格林，他拒絕參加創立世界職工聯盟，他竭力在美國工人眼中使蘇聯職工會和美國產業職工大會，公然聲稱他們不和它有任何交通。格林被逐了使被逐了的阿姆斯特丹國際復活的目的。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團結的敵人，固然將繼續利用這個場子的「國際」的旗號，努力破壞工人的團結。格林公開說要運用他的控制之下的美國工人團體的勢力和基金，來恢復阿姆斯特丹國際。該國際的秘書處文納爾斯是世界職工大會行政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並且曾參與起草世界職工聯盟的章程，那是真的。但不幸地，他認為，設法使阿姆斯特丹國際死而復生，就可能使阿姆斯特丹國際混入世界聯盟。法國訪職工大會的領袖們曾給我寫過一封信，他無對於結束他的組織。他明白寫道：「因為希望創立另一個國際而停止這一個國際活動，實在是不智之舉」。不僅如此，歐文的爾斯乾脆預料「這一切會使世界聯盟的創立遲延。他寫道：

(下接第 頁)

# 論科學的預見

華西里也夫作  
凱 豐 譯

「神奇的預言是神話，科學的預言是事實。」——列寧

「為着領導，必須預見。」——斯大林

——

關於研究自然和增長其法則，常常作用於它們，並利用來為人類服務。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預見將來。

力圖預見將來發展過程，意圖預見將來發展的結果。這是很早以前就是人類所固有的。

自然，我們不是指那些為鳥獸獸而定育內的一切種類的預言家，星象家，卜筮者以及類此的江湖好漢，這些的人在古代有很多，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現在也還不少。我們所說的是關於人類社會的預見，這種預見是科學地處理關於預見的問題，是根據科學的認識和法則方法，並且依照這種認識，來學習作用於自然——努力於底發展和進取。

人類力圖去科學的預見將來，是以科學的進步。古代希臘的唯物論者，以日食（法列士）和荒年（德謨克利特）的預言，來使他們自己的鄰居驚奇起來。

關於自然界的科學後來的發展，在自然科學的事實方面的預見是向前進展了。近代的天文學，氣象學，醫學，關於當前的日蝕和月蝕，關於天候，關於地震或疾病進程的預見問題，常常給以數字計算的準確的預言。

但是，科學的提出關於歷史的預見問題，當人類社會發展的真實的，物質的法則停留在科學範圍以外時，是不能得到也沒有得到自己的解決。

只有那種徹底實行以科學的唯物論的解釋一切現象——不僅是自然界而且人類社會——底宇宙觀，才能在堅固的科學的基礎上提出預見的問題，這種宇宙觀確切地反映在自然和歷史發展的規則，給這些規則以正確的了解，並在這種基礎上才有可能預見變遷，這種宇宙觀把先前人類的科學和哲學

所創造的一切優良的、一切先進的、有價值的東西體現出來。

人類長期地在社會生活現象的領域內——對科學是較複雜的領域，對預見的問題下了工夫。於是人類在這幾天才家如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歐文、傅立葉也非例外的包括在內一個個地作。他們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制度，給出了許多天才的預見，許多預言，但是這些預言所提出的預言沒有科學根據的猜測，這是烏托邦。這種的預言，就在於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沒有看見和沒有了解社會發展底真實的、物質的法則，對社會的了解上他們仍是唯心論者。

民粹派在他們的「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的計劃中，是烏托邦主義者，但是只是小的反動烏托邦主義者。他們的一切計劃，只是好的願望，無根據的幻想，無根據的藥方，這些不上任何科學的意義，因為不是科學的預見。大家都知道，民粹派在理論上是落後的無產階級的人，對社會現象的了解上唯心論者。他們苦心孤詣的去「預言」俄國發展的進程，常常是而且一定是遭受了破產。

使我們可能來正確的去了解所發生的變遷，它們內部的聯系，它們發展的法則底那種力量，預見它們在將來發展的趨勢底那種力量，這種力量就包含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內。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以為科學的預見所必需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武裝着，這種辯證法教導我們去了解變遷的內部聯系，在運動中、變化中、不斷的革新和發展中去理解自然界，教導我們去理解發展中革命的階級規律性，這種辯證法說到關於向上昇進的永久的前進的運動底不可征服性，教導我們去揭露和解決一切發展所固有的生動的辯證的矛盾。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論道和卓越的武裝武裝着，武裝起哲學的理論，各種理論教導我們了解自然界是在它的實際上

去了，教導我們運用唯一的科學的唯物論的尺度去對待自然界的現象，這種類法說對於自然界的完全可認識性，說到關於人類能夠通曉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廣目的法則，並使這些法則為自己服務。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給予這像一種卓越的武器，如像歷史唯物論；這種理論揭發人類社會、一切政治組織、思想和意識形態真正的物質的基礎。

運用辯證唯物論到社會發展的法則。這就武裝了人類首先為工人階級的政黨以巨大的力量和能力來科學的預見歷史發展底將來的道路，給了工人階級政黨「這像一種武器，藉這種武器的幫助，它認識現在，預見將來。」

(註一)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在人類前途揭發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死亡底法則，這就在共產主義的改造人類社會底理論下，安放著科學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武裝起對改造人類社會底道路之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天才的學說說到社會主義革命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以人類從人到個人中解放出來必然的道路，是科學的預見底卓越的武器，這種預見在黨綱的條目中如此光輝的證實了。

列寧和斯大林所製定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戰略和策略，綜合世界無產階級運動巨大的經驗，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預見科學學上最有價值的貢獻。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力量，在於它「能以一種可能，去在周圍環境中判別方位，去獲得周圍環境的內部聯繫，預見形勢的進程，並且不僅認識形勢現在是如何發展，並向那裡發展。」

「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政黨，才能够有信心的前進，並引導工人階級前進。」(註二)

政策就是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事件。預見各階級的運動，這就是說有着一個階級敵人底決定的工具在手裡。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理論的作用是不可估價的，理論幫助去了解各階級在現在和將來的運動，與革命階級的實踐，與革命鬥爭不可分割的聯繫着的理論，表現出最偉大的力量：

「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够給予以自信力。給予動以判定方位的力量，和對於周圍環境內部聯繫的了解，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够幫助階級去了解目前各階級如何行動，並向那裡行動；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它們如何行動，並向那裡行動。」(註三)

為階級指導預見，必需要獲得自然發展的法則和社會發展的法則。沒有社會發展的知識，誰也無能去預測事實。沒有社會發展法則

的知識，要預見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力量和意義，正如在「聯共(布)黨史綱明教程」所光輝的表示了，就在於它科學地揭發社會發展的法則，並教導着去運用這些法則來領導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

註一 「聯共(布)黨史綱明教程」俄文本，三六頁

註二 「聯共(布)黨史綱明教程」俄文本，三三九頁

註三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問題基礎」

二

布爾喬亞主義根本仇視馬巴主義、自發論。黨在一切方面都應當是階級底先進部份，布爾喬亞主義這種教導我們，列寧和斯大林這種教導我們。黨要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份，就應當引導工人階級前進，比它更向前進一步，看到將來。黨要執行這一任務，工人階級底革命政黨應當預見形勢的進程。……要真正的預見先進階級，黨應當應用革命的理論、對於運動規律的知識、對於革命規律的知識，來自自己武裝起來。」

「黨應當是站在工人階級的前面，它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它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是跟着無產階級前進。」(註四)

我們的黨個個個，從它的現時起到今天為止，就是同類的證據，證明列寧和斯大林所給予我們的一切指示，是引導向前進的各種各種的科學的經驗。

沒有明確的前途，沒有明確的鬥爭目的，沒有對一般的鬥爭的道路和鬥爭的方法的知識，沒有對一般的階級利益底知識，不看到將來，即是沒有預見，要有為共產主義而鬥爭底正確的目的和科學的領導是不可能的。

今天美國地工作(因為今天的工人階級鬥爭)……(註五)……(註六)……(註七)……(註八)……(註九)……(註十)……(註十一)……(註十二)……(註十三)……(註十四)……(註十五)……(註十六)……(註十七)……(註十八)……(註十九)……(註二十)……(註二十一)……(註二十二)……(註二十三)……(註二十四)……(註二十五)……(註二十六)……(註二十七)……(註二十八)……(註二十九)……(註三十)……(註三十一)……(註三十二)……(註三十三)……(註三十四)……(註三十五)……(註三十六)……(註三十七)……(註三十八)……(註三十九)……(註四十)……(註四十一)……(註四十二)……(註四十三)……(註四十四)……(註四十五)……(註四十六)……(註四十七)……(註四十八)……(註四十九)……(註五十)……(註五十一)……(註五十二)……(註五十三)……(註五十四)……(註五十五)……(註五十六)……(註五十七)……(註五十八)……(註五十九)……(註六十)……(註六十一)……(註六十二)……(註六十三)……(註六十四)……(註六十五)……(註六十六)……(註六十七)……(註六十八)……(註六十九)……(註七十)……(註七十一)……(註七十二)……(註七十三)……(註七十四)……(註七十五)……(註七十六)……(註七十七)……(註七十八)……(註七十九)……(註八十)……(註八十一)……(註八十二)……(註八十三)……(註八十四)……(註八十五)……(註八十六)……(註八十七)……(註八十八)……(註八十九)……(註九十)……(註九十一)……(註九十二)……(註九十三)……(註九十四)……(註九十五)……(註九十六)……(註九十七)……(註九十八)……(註九十九)……(註一百)……(註一百零一)……(註一百零二)……(註一百零三)……(註一百零四)……(註一百零五)……(註一百零六)……(註一百零七)……(註一百零八)……(註一百零九)……(註一百一十)……(註一百一十一)……(註一百一十二)……(註一百一十三)……(註一百一十四)……(註一百一十五)……(註一百一十六)……(註一百一十七)……(註一百一十八)……(註一百一十九)……(註一百二十)……(註一百二十一)……(註一百二十二)……(註一百二十三)……(註一百二十四)……(註一百二十五)……(註一百二十六)……(註一百二十七)……(註一百二十八)……(註一百二十九)……(註一百三十)……(註一百三十一)……(註一百三十二)……(註一百三十三)……(註一百三十四)……(註一百三十五)……(註一百三十六)……(註一百三十七)……(註一百三十八)……(註一百三十九)……(註一百四十)……(註一百四十一)……(註一百四十二)……(註一百四十三)……(註一百四十四)……(註一百四十五)……(註一百四十六)……(註一百四十七)……(註一百四十八)……(註一百四十九)……(註一百五十)……(註一百五十一)……(註一百五十二)……(註一百五十三)……(註一百五十四)……(註一百五十五)……(註一百五十六)……(註一百五十七)……(註一百五十八)……(註一百五十九)……(註一百六十)……(註一百六十一)……(註一百六十二)……(註一百六十三)……(註一百六十四)……(註一百六十五)……(註一百六十六)……(註一百六十七)……(註一百六十八)……(註一百六十九)……(註一百七十)……(註一百七十一)……(註一百七十二)……(註一百七十三)……(註一百七十四)……(註一百七十五)……(註一百七十六)……(註一百七十七)……(註一百七十八)……(註一百七十九)……(註一百八十)……(註一百八十一)……(註一百八十二)……(註一百八十三)……(註一百八十四)……(註一百八十五)……(註一百八十六)……(註一百八十七)……(註一百八十八)……(註一百八十九)……(註一百九十)……(註一百九十一)……(註一百九十二)……(註一百九十三)……(註一百九十四)……(註一百九十五)……(註一百九十六)……(註一百九十七)……(註一百九十八)……(註一百九十九)……(註二百)……(註二百零一)……(註二百零二)……(註二百零三)……(註二百零四)……(註二百零五)……(註二百零六)……(註二百零七)……(註二百零八)……(註二百零九)……(註二百一十)……(註二百一十一)……(註二百一十二)……(註二百一十三)……(註二百一十四)……(註二百一十五)……(註二百一十六)……(註二百一十七)……(註二百一十八)……(註二百一十九)……(註二百二十)……(註二百二十一)……(註二百二十二)……(註二百二十三)……(註二百二十四)……(註二百二十五)……(註二百二十六)……(註二百二十七)……(註二百二十八)……(註二百二十九)……(註二百三十)……(註二百三十一)……(註二百三十二)……(註二百三十三)……(註二百三十四)……(註二百三十五)……(註二百三十六)……(註二百三十七)……(註二百三十八)……(註二百三十九)……(註二百四十)……(註二百四十一)……(註二百四十二)……(註二百四十三)……(註二百四十四)……(註二百四十五)……(註二百四十六)……(註二百四十七)……(註二百四十八)……(註二百四十九)……(註二百五十)……(註二百五十一)……(註二百五十二)……(註二百五十三)……(註二百五十四)……(註二百五十五)……(註二百五十六)……(註二百五十七)……(註二百五十八)……(註二百五十九)……(註二百六十)……(註二百六十一)……(註二百六十二)……(註二百六十三)……(註二百六十四)……(註二百六十五)……(註二百六十六)……(註二百六十七)……(註二百六十八)……(註二百六十九)……(註二百七十)……(註二百七十一)……(註二百七十二)……(註二百七十三)……(註二百七十四)……(註二百七十五)……(註二百七十六)……(註二百七十七)……(註二百七十八)……(註二百七十九)……(註二百八十)……(註二百八十一)……(註二百八十二)……(註二百八十三)……(註二百八十四)……(註二百八十五)……(註二百八十六)……(註二百八十七)……(註二百八十八)……(註二百八十九)……(註二百九十)……(註二百九十一)……(註二百九十二)……(註二百九十三)……(註二百九十四)……(註二百九十五)……(註二百九十六)……(註二百九十七)……(註二百九十八)……(註二百九十九)……(註三百)

斯大林同志在十五次大會上關於聯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以分黨的工作的總結問題時，他指出自發論的危險，力圖「隨波逐流，安於目前地位，不顧前途，不看將來地隨波逐流」。『隨波逐流，可是潮流會把我們沖到什麼地方去，不去管它。』(註五)

在引證斯大林的例子時，既到他們誠地、手不停息地勞動，但是他們沒有看到潮流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斯大林同志作出下列的結論說：

「沒有前途的工作，沒有能放有帆的工作——只是隨波逐流的願望，就要走到窮途末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很明顯的：起初，他們漸漸地起訴來，後來，他們就要變成灰色的，後來，就使他們墮入庸人的泥坑中，而後來，他們就變成普通的一個庸人。」（註六）

這樣一種不著於預見的、失去前途的、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工人，如像最近幾年來實際上所証明的一樣，人民的敵人、外國的偵探常常把他們組織起來。

要成為共產主義的堅定的和不動搖的戰士，要為着科學的製工人階級的鬥爭，必得有明確的鬥爭目的、前途、值得運動的方向。我們的高，我們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常常是這樣來領導。

在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同志在分析關於沒有外國的援助我們能否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問題時，他肯定的回答說：

「不懂得要建設一些什麼，就不能真正的去建設。不懂得運動的方向，就不能前進一步。我們黨，習慣於在自己前面要有明確的和確定的目標的黨，關於前途的問題是我們黨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註七）

對於鬥爭前途的問題，我們的將來的前途，斯大林同志與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他們一般的否認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特別是否認在蘇聯的可能。斯大林同志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與反對列寧主義底一切其他敵人的鬥爭中，堅持和發展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的學說，他在聯共（布）十五次代表會議上說：

「有人可以這樣問：為什麼要爭論我們革命的性質和前途這些問題，為什麼要爭論在將來會怎樣，或在將來可能是怎樣，——難道把這些爭論丟開，去做實際工作不更好些嗎？」

「同志們，我認爲問題的這種提法，根本上是不正確的，因爲這與列寧主義沒有相稱之處。」（註八）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話指出了我們黨的力量，以及它與世界上所有一切其他政黨原則的區別。新型的黨，領導着實現有科學根據的目的而自覺的鬥爭的黨，科學的指揮千百萬勞動羣衆運動的黨，善於科學的預見自己最近的目標和最終的目的以及鬥爭的任務的黨，這種區別是布爾塞維克黨的顯著的標誌。關於總的目的及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底明確的意見，給予布爾塞維克

黨以可能來組織羣衆底無條件的鬥爭，爲創造新的社會並爲迅速的消滅舊的制度的社會鬥爭。

國際修正主義的始祖伯恩施坦，以及在他以後的，俄國的「經濟派」和孟塞維克派把革命階級的一項任務只是歸於經濟的鬥爭，爲五個銅板的鬥爭，否認工人階級的最後目的——即爲共產主義的鬥爭。伯恩施坦說：「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沒有什麼。」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改良主義的公式，無前途的臭公式，根本上仇視馬克思主義的公式。斯大林同志說：

「我們如果不知道這趨向那趨去，不知道運動的目的，我們就不能向前前進。沒有前途，沒有這樣的信心——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可以完成這個建設，我們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沒有明確的前途，沒有明確的目的，黨就不能領導建設工作。我們不能用伯恩施坦的勢力來生活，他說：『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沒有什麼。』恰恰相反，我們是革命者，應當使自己的運動向前進和實際工作服從於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階級目的。如果不這樣，就必然的要墮入機會主義的泥坑而不能自救。」（註九）

斯大林同志所給予的關於在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中的後來的過程所完全證實了的。列寧和斯大林着重指出，對於布爾塞維克明確的了解前途和關於鬥爭目的底明白的意見，是有着巨大的意義，他們創造出了新型的有組織的覺悟到自己的目的、方法和行動的革命家，這種革命家在歷史的進程中擔負着最大限度的創造性的作用，或底組織者的作用。這些黨創造新的歷史、創造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無情地和勝利地摧毀社會主義底一切敵人。

共產黨員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常加研究，並幫助勞動羣衆認識這個偉大的先進的科學底基礎，創造懂得自己目的和社會發展規律底羣衆新的組織力量，羣衆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武裝自己，武裝我們的知識界和全蘇聯的人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創造新型的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人，他們有明確的目的，認識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障礙。在創造新型的黨——爲共產主義鬥爭的自覺的戰士底這種事業中，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前途的預見的學說實有偉大的意義。

「列寧主義的偉大意義，就是在於它不承認我們的建設是隨意的、盲目的，它也不幻想沒有前途的建設，它給予關於我們工作前途的這個問題以明確而肯定的回答；它申言，對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我們有一切條件，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註十）

現在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同志對斯威特洛夫大學的這種回答，經過十一年的時間，當蘇聯的勞動者在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並開始過渡到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的條件，就完全證實了斯大林同志的話。

整個我們黨的工作應當是確實在科學的預見上。在現在，無論是在執行我們的一切計劃，或是在揭發和無情的消滅很好地隱藏着的人民敵人的殘餘：偵探、暗探份子、陰謀份子、危險份子，這都是特別重要的。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社會內，結束了社會發展的自目的法則，一切國民經濟部門都是服從計劃進行，專以完全清楚的，沒有預見就不可能領導。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

「坐在指揮台上眺望着，當着情況還沒有某種不容忽視的事情擺到我們前面來時，什麼也不看，這是不容忽視的領導。布爾塞維主義不是僅僅了解領導。爲着要領導，必須預見。同志們，預見不是常常容易的事。當着少數的某些領導同志，到和注意到我們工作的缺點，而工人羣衆不願意或者不能夠看到或注意到缺點時，這是一回事。在這種就有一切機會來確定他們所到的，是大家所不注意的。當着千百萬工人與少數的某些領導同志一齊看和注意到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揭露我們的錯誤，在總的建設事業中武裝起來，並指出改進事業的道路，這是另一回事。」（註一一）

這就是應當怎樣來了解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來了解領導鬥爭的最高階段，列寧和斯大林給予我們的這種領導模範。

- 註四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問題基礎」
- 註五、註六 均見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 註七 斯大林給斯威特洛夫大學的「問題要回答」
- 註八 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傾向」
- 註九 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傾向」
- 註一〇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
- 註一一 斯大林：「關於四月中央全會工作」，一九二八年

三

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給予我們對預見的光輝的例子，這些例子是顯示人類智慧之前的透入到社會生活最複雜的事變底本質內去。

他們時常在十數年以前預見事變，後來，這些事變都是令人佩服的預見地實現了。雖然，如列寧和斯大林說過，預見事變的日期和時間是不可能的，可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導師和創造者，絲毫不差的甚至連時間也預言中了。

現在來說一說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其如何預見底模範。到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一種新學說，這種新學說在「共產黨宣言」著作中得到了它的第一次完全成熟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自己的理論，並運用這種理論來分析資本主義的法則，來解釋資本主義將來發展的條件，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以及經過革命由資本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條件。列寧說：「對馬克思便自然要提出這個理論運用於資本主義的將來發展的條件和未來共產主義底未來的發展上的。」（註一二）

但是，這怎麼是可能的呢？有什麼根據提出現在還沒有實現只有在將來才能實現的問題呢？列寧對這個問題給以回答：

「試問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問題呢？可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從資本主義之內產生出來，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力量之對立底結果。馬克思絕對沒有要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構想一件不可推測的東西的那種企圖。」（註一三）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力量就在這裡。這一點也不是測字算命，這只是嚴格的科學的科學，只是最嚴格的分析和其發展的趨勢。

列寧說：

「馬克思研究共產主義問題，正像自然科學家研究一種新的生物形態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知道一物的來源，又知道此物變化的一定方向。」（註一四）

馬克思提出關於共產主義問題正是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在同樣的情形下提出一切問題。因此，他們分析無疑的是如此確切的，因此，他們的指示是如此確切的，他們對變化和現狀的天才的預見底力量是如此偉大的和驚人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一八四八年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了下面的論點：

「資本存在的條件是僱傭勞動，僱傭勞動完全建立在工人中間的競爭之上。實際階級不得已地，不能抵抗地所造成底產量進步，使得因聯合而給彼



的工人們的革命團結代替了因戰爭而引起的他們的分裂。這樣，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所藉以進行生產與佔有生產物的基礎本身就在資產階級的腳下被抽掉了。資產階級首先就產生了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死亡與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註一五）

根據這種分析，根據建立在現象底階段的聯繫上的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自己的、不能駁倒的無產階級革命應有的預見。我們知道，這個預見——預見經過七十多年在蘇俄證實了。在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實現了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死亡與無產階級勝利底不可避免的預言。

把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以及其餘階級的預見——預見放在一邊，我們來說一說一個很少為大家知道的預言，即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創立戰國公社的必然的預言，這個預見是在一八八一年向斯拉夫的家大會致慶詞時說的，這預言是如此的鮮明，有如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前所說的一樣。

「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名的預見——預見：

「當……經過階級的屠殺後，國防派設立了「秩序」，巴黎公社是被摧殘了，可是勝利者很少想到不到十年在遠方的彼得堡發生了事變（大約這事所指的是一八七六年在卡桑大舉聯合的學生和工人的示威——作者註），這個事變在鬥爭之後，可能……長期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底是不可避免的要引到創立戰國公社。」（註一六）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看得很遠。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俄文並非無目的的。他們看到了新的力量即戰國無產階級的增加，並對列的相信它的最終勝利。

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開始後的第四天（七月二十三日）馬克思在國際總會第一個宣言內寫道：

「英國工人階級，兄弟般的將他們的手伸給法國的工人，正如他們伸給德國的工人一樣。他們相信，不論現在的可怕的戰爭如何終結，全世界工人的聯合，最後是要換絕一切戰爭的。在官場的法國西與官場的德意志進行自相殘殺的搏鬥時，工人們却相互發送和平與友愛的祝詞。只是這一件事在歷史大綱與比較的事實指示出，更趨於貧窮，政治荒廢的舊社會相反的新社會，是在誕生着了，這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即勞動。」（註一七）

馬克思的預言中了。現在有這樣一個國家，那裡的統治就是勞動，那裡的國際原則就是和平，——這就是蘇聯。

馬克思的預言——恩格斯，根據應用辯證法來分析事變，來分析階級力

量的相互關係，給我們不少的光輝的預見事變的驚人的模範。

列寧在「論預言」的文章內說到關於蘇聯不遠的預言中了的許多科學的預言之一。在一八八七年，恩格斯為波爾克海姆的一本小冊子寫了一篇序言，在那裡他描寫到將來世界戰爭的極景。這是在第一次大戰前二十七年和十月革命三十年寫的。這篇序言的每一句都是充滿了無限豐富的思想，並按其科學的真確性來說，對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世界大戰以及由大戰所產生的對列的後果，給了一個特別的模範預見。

「……普魯士德意志如要戰事，除了世界大戰之外，就不可能了。這個世界大戰，其範圍及其猛烈，都是向來所夢想不到的。幾百萬至一千萬的士兵，將互相屠殺，在他們互相屠殺時，把整個歐洲吞下了，把什麼東西都毀去，比一大家蝗虫還要利害。三十年戰爭的物質破壞，縮減為三四年，而且遍及整個大陸：飢荒、瘟疫、軍隊與民衆因生活困難而普遍墮落；我們的貿易工業和信用，這些人造的機關，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結局，整個破產；舊的國家及其傳統的國家智慧，崩潰到同樣的地步，一打一打的皇冠在路上滾着，沒有人去拾；絕對不可預知勝利之條件。」

「軍備競賽的制，推測極端，當它最後底產生其不可避免的結果時，其結果就是如此，這個地方，我們的王侯和政治家們，就是你們的智識已把舊歐洲帶到的地方。當你們不得不開始最後的大戰時——那時我們正合適。戰爭也許把我們暫時推倒後面去，我們所已奪得的地位也許有許多會被失去。但是，當你們把你們所不能維持的力量用出來時，事勢就將自然發展，到了悲劇之末了，你們就將滅亡，而無產階級的勝利，或已完成，或總是不可避免了。」（註一八）

這是何等的事變驚人的預言！列寧在自己的文章內對恩格斯的說：「何等天才的預言！」列寧說，雖然恩格斯的預告有某些事實不同，但是從一八八七年起經過三十年不能不有所變更。「但是最驚人驚奇的，是恩格斯的預言有這許多都「照他所寫的」實現。」

到一九一八年，恩格斯所預言的，戰爭的直接結果是實現了，在一個國家，在俄國，工人階級的勝利是取得了，在另外一些國家造成了勝利「雖是不可避免的」條件。戰爭的結果，取下了俄皇、德皇、奧皇、土耳其王、波斯王以及其他較小的國家的皇帝底皇冠。這種驚人的預見事變的基礎，就是無條件的確切的估計和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條件，而首先是無條件的確切的估計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

恩格斯以天才的預測，應當使現在進行新的人民的大規模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現在的世界不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了。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的覺悟，大踏步的前進了。向資本主義階級的思想在工人階級的覺悟中成熟着。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經有在基本上建成了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兩個國家對任何一個新發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表示強大的幫助。

在一八九四年，恩格斯死以前的數個月，他給了另一個也是很有名的預見的預言，恩格斯在給社會主義工人雜誌（*Die Arbeiter*）編輯的信中，他說：「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都是處在新的優良的社會（即沒有人剝削人的）的曙光前面，被壓迫階級都在團結自己的隊伍，他們到處都在不顧國界不顧言語的差別而共同行動起來。組成世界無產階級的軍隊，而正在到來的新世紀要使得它（無產階級的軍隊——譯者註）走向勝利。」（註一九）

恩格斯看到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曙光，雖然他沒看到這個社會出現的時機，這個社會在恩格斯這封信後，在仙死後的二十三年在蘇聯產生了。恩格斯主義的創始人，這樣遠的看到前面，看到數十年的前面，驚人的確切的預言事實的進行和結果！

這種預見的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這是了解因果的相互關係正確的指南針，使得有可能來看到發展的一般的方向，一般的趨勢，使得能夠看到將來，看到將來是為着現在來領導共產主義的鬥爭。

- 註二二 「列寧全集」卷二二，四二八頁
- 註二三 同上
- 註二四 同上
- 註二五 「共產黨宣言」
- 註二六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五，五五二頁
- 註二七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 註二八 引自「列寧全集」卷二三，一〇五——一〇六頁
- 註二九 「馬恩全集」卷一六，下冊，四三三——四三三頁

四

我們蘇聯的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列寧是近代偉大的人物，是科學底泰斗。

創造性的掌握馬克思的科學，並發展它，列寧具有洞悉事物的巨大的力量。列寧的這種能力在革命轉折的關頭，達到特別的偉大和明白。

「……列寧的天才的明慧，都沒有在革命轉折時期那樣表現得顯露和明白。在革命轉折的時候，它們簡直像花蕾一樣地閉起花來，眼光明白得像鏡子一樣，預先猜透各階級底運動和革命的必然曲線進程，他看見這些東西得這樣明白，簡直像着手掌上的一樣。無怪在我們黨中隨時常有人說：『列寧會在革命波瀾上游泳，好像魚兒會在水裡游泳一樣。』」

由此，列寧所提出的策略口號，明顯得使人「眼花」，列寧所想出的革命的計謀，勇敢得使人「膽昏」。（註二〇）

列寧早期的著作之一——「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怎樣反對社會民主黨」，就是這種天才的洞察力的模範。這部著作是列寧在一八九四年寫的，當時列寧還才二十四歲，在這部著作中列寧最初提出主義革命的思想，並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

在這本書內，列寧徹底地揭破民粹派，並指出他們欺騙人民的面目，是富農利益的代言人，列寧說：

「社會民主派把自己的一切注意和一切行動都集中到工人階級身上去。當它的先進代表通曉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關於俄國工人的歷史作用時，當這些思想得到廣大的傳播並在工人中創出強固的組織，當工人現時分散的經濟被改造為自覺的階級鬥爭時，那時候，俄國的工人階級就成為一切民主份子的領袖，推倒專制政體，率領俄國的無產階級（與全世界無產階級一道）用公開政治鬥爭的直接道路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註二一）

這是在四十四年以前寫的。列寧的預見以驚人的真實地說中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指出這一點，對列寧的這部著作作這樣的估計：

「……四十多年以前，列寧正確地指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的道路，確定工人階級的作用是社會上先進的革命的力最，確定農民的作用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

在一九〇二年，列寧在自己的一本著名的書「做什麼？」內，他給了馬克思主義黨的理論基礎的分析，他預測放在俄國工人階級身上的歷史任務和作用如下：

「現在歷史給了我們一個迫切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其他任何國家的無產



階級是迫切的任務中革命的一側。實現這個任務，不惟需要國際無產階級的反動支柱破項，而且也（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把亞洲最強的民族支柱破項，這可以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註二二）

在這本書內，列寧也給了第二個有名的預見，這個預見就是下列的一句話：

「給我們以革命家的組織，——我們就會把俄國轉過來！」（註二三）

我們看到，關於列寧的預見，是完全的實現了。蘇聯的工人階級是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列寧和斯大林所創造的布爾塞維克黨是真正的把俄國「翻轉」過來。在俄國創造了新的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斯大林同志在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中说：

「從「做什麼？」一書出版以來，經過了三十年，誰也不能否認在這個時期內的蘇聯光輝地證明了列寧的話。」

像「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說的，在「兩個策略」一書內，列寧給了「布爾塞維克黨底天才的根據」並給了「孟塞維克黨底經典式的批判。」

在這部著作內，列寧製定了關於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底領袖和領導者的作用這個問題，同時，由此在指出鬥爭的前途時，列寧製定了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依據馬克思的思想，列寧製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底新的理論。

在這本書有名的著作中在一個地方，列寧以科學的政治的洞察力和透視力，給了一個綜合的說明：

「舉國全體人民，尤其是農民——爭取完滿的自由！舉國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爭取社會主義！這應該實際上成爲無產階級的政策，這應該成爲階級的口號，這口號應該貫通於並用以決定工人政黨在革命時候的每一個策略問題的決議，每一個實際的步驟。」（註二四）

在同一個時期內，孟塞維克反對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他們的根據是「在工人和農民不可能有「意志的統一」（在反對專制政府中的聯盟），列寧對孟塞維克說：

「無產階級和農民底革命民主專政，也如世界上一切東西一樣，有它的過去和將來。它的過去——專制政體、農奴制、君主、特權。——在與這些過去作鬥爭中，在與革命作鬥爭中，無產階級和農民可能有「意志的統一」，應該利益一致。」

「，應該利益一致。」

它的將來——反對私有財產的鬥爭，僱傭工人與僱主的鬥爭，爲社會主義的鬥爭，這新「意志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註二五）

大家知道，生活光輝地證實了列寧關於工農底革命民主專政的思想，二月野蠻的農民革命在蘇維埃的形式中實現了工農的革命民主專政。在一九一七年環境的轉點就在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叛賣政策的結果，在俄國除了蘇維埃之外，還存在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的臨時政府（是兩重政府）。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說：

「布爾塞維克的口號和思想，一般的說，已成爲歷史所証實；但具體的說，事情却和任何人所期望的不同些、新奇些、複雜些。」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因爲這個公式所預見的，只是階級的對比，而不是實現這種對比、這種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工農代表蘇維埃，——這就已由實際生活所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註二六）

列寧在承認一九〇五年所預見的一般的公式已經實現了時，他說到生活時常是比預見複雜些，因爲在一切理論，在最好的條件下，也只是指出基本的、一般的東西，只是接近於包圍萬象的生活。

列寧警告說：雖然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就要「估計活生生的生活」，「現實的階級鬥爭。」而不是緊守一般的哲學理論的論點。這爲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證實了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天才的預見，一九一八年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內列寧說過：

「實際的情形，正像我們所會說過的一樣。革命的進程證實了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起初我們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政體，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因此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我們同貧農，同半無產階級、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連鄉村中的富翁，富農，投機者也在反對之列，因此革命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

列寧精通唯物辯證法的方法，精通革命的創造性的行動底這種強有力的和銳利的武器，他給我們從各方面估計階級鬥爭的條件及其發展的傾向和階級力量對比的模範。這就是爲什麼列寧能以絲毫不少的預見經過二十年後所完成的本質。

（未完待續）

問題討論

嚴懲漢奸與和平建國

公啟

漢奸不容「寬容」

今天，在中國人民南輪的和平建國問題，是極其複雜和嚴重的，我們必須充分的戒懼警惕地前進。六十年來中國人民最大最殘酷的一個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終於被打敗了，這是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勝利」，我們應該慶祝。但是日本法西斯主義並沒有甘心它完全的失敗，他們正應用一切狡計，企圖保存實力，準備再度的戰爭，準備再來發動中國大陸上的「九一八」，「一二八」，在太平洋上的「珍珠港」。雖然世界人民的力量是如此地強大，雖然我們很難認為日寇的陰謀能夠實現，但因此，我們絕對必須在今天這有利的時機下組織一切力量給日寇以致命的一擊。日寇在中國大陸的陰謀就是「扶持」和「離間」一切反民主的力量，掩護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種子，就是力求中國依然是一個對國際民主主義不團結不統一的中國，就是幫助一切漢奸種子，使它一變而合法化，正統化，就是準備隨時發動「中日親善」「日支提携」，「日華一體」的宣傳時在中國內政的執行人。

我們必須充分的戒懼警惕，因為中國的民主政治還沒有最後的勝利，中國人民還沒有完全掌握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日寇法西斯的侵略的幻想曲將永不離在中國重新發動它的知音。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為了鞏固中國的和平，中國人民還應該做更多的事情。

截至現在為止，政府所忙碌的是派出一批一批的官員——不是用武器，而是用委任狀——去「接收」敵佔的武裝和土地。非常明白，這樣的「接收」就不得不仰賴於日偽軍隊和政權去「維持秩序」，很顯然，這樣的統治，難怪人們不得不發出深重的感慨：一件件的「備忘錄」，一件一件的照會，這就是我們對日本人的「統治」，軍事的和實際的統治，却總是被對中國人民依然如舊的真正的統治。難道這是偶然的嗎？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人的武裝順利地轉成漢奸的武裝，而漢奸的政權，僅僅改變了一個商標，它就成爲了合法的中國恢復區的政權。這就是周道佛的「行動總隊」，「確保治安」，「效忠黨國」，「棄暗投明」的本質，也是陳逆公的「國須統一，黨不可分」的本質。

政府對於漢奸漢奸，幾乎可說沒有任何表示，而實際漢奸的言論却公開的演說紛紛出現。被任命爲「北平市長」的熊斌先生說：「凡校軍已給予名譽者，可令其執行職務，並即電令屬下，務使英等德烈於東所部，並通知其他各派軍隊，負責維持駐地秩序。俄軍多係德軍所迫，致入歧途，祇應能乘時自勦，亦情有可原。」（見八月十三日西安各報及九月一日本報）被任命爲「上海副市長」的吳紹澐說：「國有常典，斷不容自由行動，罪惡之輕重不同，或亦功過相當。」（九月九日大公報）什麼叫「國有常典」呢？難道說在長長的八年歲月當中幫助敵人去蹂躪淪陷區人民的暴虐統治的罪惡，在一夕之間，「官銜前改一塊木牌，兵士換上符號臂章」，就沖洗得無影無蹤而「功過相當」了嗎？另一方面，從南京和上海傳來的消息，則不能不令人證實，這種「功過相當」的寬容政策，正在實際的被執行着。例如：

「中國首都南京到現在還遍地是日偽軍人員和他們從前偽政府官員，與匪幫合作的偽政府官員們，正力圖洗脫他們與日偽軍的勾結關係，而在中央政府之前爲他編造的行動作辯護。」

「日本投降後南京政府的自由開放，使淪陷區找不出一個中國方面的鬥爭中心，因之重慶的國民政府不得不在許多地方利用偽政府的行政來維持當地秩序，以待中央政府來接收。然而目前現在爲止，還沒有一部像樣的「捕」。」（節自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斯希爾頓東京通訊，譯文刊八月十二日時事新報）

必須指明，在南京和上海的四圍，是有着相當強有力的中國人民的軍隊！新四軍的，然而他們被限制作化外，被剝奪了真正去解除敵偽武裝的資格，因而就不得不讓漢奸們「維持秩序」以「討功折罪」了！這難道真是「不得不」的麼？

而中國人民却決不能容許這種荒謬行爲的，決不能容許日寇法西斯再在中國地盤下親日賣國的漢奸種子，決不能容許這些漢奸賣國賊在「中日親

「合作防共」的老調下重新把中國帶回「九一八」「一二八」「何梅協定」時的民族的奇恥大辱時代中去的！

### 漢奸的本質是屠殺人民

漢奸在中國殖民地的中國社會中有其政治的和經濟的根柢。中國社會經濟中缺少獨立的民族工業，農民是被剝削的窮苦地東轉轉的，鴉片戰爭以來，外國資本不斷地侵入中國，利用中國廉價生活受廉價勞力，在中國市場上傾銷高價的商品。在這種活動中集結了買辦階級的一羣。它們利用外國的資本操縱了城市的金融和商業，它們利用壟斷的土地佔領了高利貸活動操縱了廣大的農村市場。在這種活動中，它們順利地進行外國資本和商品的獨佔的交換——買辦，因此而獲得巨大的利潤。它們的利益因此不是和中國人民的利益一致，而是和外國的侵略者一致。如果中國人民的經濟真正地發展起來，它們就再不能操縱和壟斷從城市到農村，從工商業到農業的中國經濟命脈了，因此就不能再獲得巨大的買辦利潤了。

這種買辦階級用經濟利益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外賣國貨，內壓人民，為了發賣國財必須壓迫人民，為了壓迫人民又必須借外力以肆行屠殺，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汪逆精衛，王逆克敏，陳逆公博，周逆作霖，陳逆嘉謨的漢奸賣國行爲，並非從抗戰後才開始作漢奸才開始。以汪逆精衛說，九一八時，他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下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愛國運動，而於三三三三，再而斷送熱河，三三而斷送冀察。我們應該回憶給十年內戰。我們也應該回憶「七七」以前我國運動不自由的時代。十年內戰主要是爲了反對共產

黨的土地政策和民主政治，爲了使中國人民解放的軍隊共產黨歸於消滅，爲了使對連的土地關係繼續保持，爲了使買辦漢奸政府繼續操縱全國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九一八」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主張停止內戰，全國團結，民主改革，抵抗日寇。這些話，漢奸買辦階級自覺聽不進去。內戰更急，國步更艱，外患日甚，買辦政客也更得意洋洋，於是救國而有罪，窮國而「失足落水」，所有這些，今天三十歲上下的青年是能够沉痛地憶起的。

汪逆於廿八年公開投敵後在香港漢奸報南華日報發表的「舉一個例子」，列舉投降的理由，一則說：「我以爲共產黨是以獨裁爲天性的，主戰也獨裁，主和也獨裁」，漢奸賣國賊視共產黨爲「獨裁」，這是很正確的，共產黨正是「獨裁」他們獨裁黨民的行爲的最大的力量。再則說：「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爲救外而安內，絕不應以爲安內而謀外」，先安內，後謀外，這是發揚反共內戰的腔腔調調，汪逆精衛這話正表明了漢奸賣國賊是怎樣死心塌地地壓迫人民，壓迫共產黨爲其意志。不反對共產黨就不能壓迫中國人民，不壓迫中國人民，就不能進行其賣國賊的陰謀，這是漢奸賣國賊的真正的願望。

中國人民從來沒有享受過真正的和平生活。日本帝國主義一貫的利用中國反對漢奸反對中國人民，並挑撥漢奸之間火併，使中國永遠不能成爲一個民主的強國，然後通過軍閥漢奸的統治來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這一點，今天的南京「北京」漢奸們扮演的角色，較之以前的軍閥，只是更卑劣，更無聊，更兇險，更殘酷了，本質上却是一樣的。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浙皖戰爭，屠殺人民，浪費民財，這無一不與日本帝國主義有關，也無一不與漢奸賣國賊有關，今天漢奸中的不少人物如王克

敏，齊燮元及差不多所有「北京」漢奸們，都還是皖系軍閥的餘孽。

但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一九二五年大革命運動在孫中山先生的指導下發動，國共合作，北伐戰爭，迅速地掃蕩了南北軍閥，中國有可能成爲一個民主富強的中國了。然而因此中國共產黨就成爲了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們的眼中釘，革命的團體不幸地破滅了，繼續着軍閥混戰的就是十年內戰，這內戰把中國人民推對新的苦痛的深淵中去，而一直繼續到抗戰的前夜。

這就是買辦漢奸賣國賊在民國以來的三十四年中壓迫人民，屠殺人民，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的真實面貌。

### 爲了富強民主和平的新中國

因此，我們不能不作出這個最起碼的結論：如果不對今日南北的大批漢奸，作一次嚴厲的肅清的處置，如果仍然讓他們繼續統治中國人民，操縱國民經濟，一個富強民主和平的新中國是不能够實現的。

如果我們容許買辦階級繼續存在並掌握經濟命脈，一切經濟上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因爲買辦階級的利益和經濟改革是絕對對立的。而沒有這種經濟上的改革，沒有土地改革，沒有正確的工業政策不消說統治階級上海南京巨大金融力量對經濟漢奸，一個富強的中國決不能建設起來。因此，說到漢奸，政治軍事文化漢奸，固然予以嚴懲，經濟漢奸也必須一體肅清。漢奸的一切財產一定要沒收充公，華北華中的工業設備一定要移來補助在大後方的民族工業家，漢奸的土地一定要沒收分配給農民。

如果我們容許漢奸做政治舞台，依舊繼續其壓迫人民，反對民主的罪行，中國的民主政治的實現就必遇到更大的困難。如果我們容許漢奸把持軍權，屠殺人民，國內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反共戰爭，反人民戰爭的陰謀定將繼續存在的，嚴懲漢奸偽軍，是消滅內戰危機，和平建國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

我們應該注意到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日本帝國主義並沒有自認於投降。它正在使用種種手段，挑撥國際的團結，尤其是蘇英的團結，以保存它的侵略本體，它也將發動中國國內的團結，企圖以此保存其在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實力。因此之故，我們對於漢奸問題，尤其必須予以萬分嚴正的注視。如果日寇法西斯的陰謀多少實現了，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今日被非法「寬恕」的漢奸，將重新活躍，重新執行其屠殺中國人民的創子手的權力。

### 怎樣懲辦漢奸？

怎樣懲辦漢奸，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一項原則，就是人民的組織，民主的原則。

漢奸「『訴說』他們『情非得已』，漢奸們『放他們』『負有特殊使命』，官僚政客為他們『功罪相抵』來解脫，這些都不過是維護奸偽，反對人民的一類藉口。今天是民主的世紀，我們只能以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原則去解決這一問題，一切反民主，反人民的陰謀和行為必須停止！

評判漢奸的罪惡程度及其是否真是漢奸，就必須看老百姓的意見，如查它曾經幫助敵人屠殺和剝削中國人民，如果它藉漢奸行為獲得非分的利益，它們將被處死或沒收財產。

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民主的人民法庭。屬於地方的漢奸由地方法庭審判，屬於全國範圍的漢奸由

中央法庭審判。地方法庭要包括各階層人民的，工農家，商人，工人，農民，士兵，學生，婦女，文化界代表，中央法庭除各階層代表外並應包括各黨派的代表。要保障人民審判和處決漢奸的權利，要實行真正的地方自治，要實現收復區的民主政治。

無異地，要求懲辦漢奸和執行懲罰，應是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一樣，是一個長期的鬥爭，我們要求國內的團結和平和民主，我們要求在這種具體的問題上表明中國是不是真正的團結和平和民主了。

### （上接第 頁）

「完全可以料想，在九月的巴黎大會上，意料之外的環境可能產生新的延遲」。

這，顯然地，是歐文斯爾斯最近的希望。但是延遲創立一個組織，這組織必將被認為保衛工人階級生死攸關的利益如經濟及社會福利，民主自由以及就業安全等，這樣的延遲，工人階級對之有什麼興趣呢？工人階級聚眾會盼望發展成一個目的在於團結職工會，以從事決定地擊破並消滅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爭取各國間持久的和平的組織麼？不，我深信工人們並不願意有任何延遲，他們知道打鐵須趁熱，知道世界職工聯盟——一個實現工人階級團結的組織——之成立，是不容延遲的事。

只有歐文斯爾斯自己才有延遲的興趣。雖然他給在法國工人的信上聲稱他「對委員會在巴黎訪談，倫敦和舊金山的工作的成功，貢獻很大」，事實却是：他的參加，並不是為了儘速創立世界職工聯盟的。正相反，在行政委員會的會議上，他竭力提出不合時宜的問題來討論，而且阻撓解決這些問題。現在，他竭力不惜一切代價要使阿爾斯丹丹國際復活。這個機關的復活，對有組織工人的團結事業是否有利呢？沒有的，該機關的無效的堅持，無非

機關的障礙而已，對工人階級是有害的。

法國總工會秘書及行政委員會書記波蘭，曾在行政委員會開會時說關於阿爾斯丹丹國際的殘酷的真理。他解釋法國總工會為什麼對阿爾斯丹丹國際從來無意，現在也無意再所贊助。他說，這個機關不僅在職前沒有發生過什麼有益的作用，而且在戰時也沒有做過什麼有益的事。在反抗德國侵略者的艱苦的戰爭地下工作期間，法國總工會從沒有從它那裡得到任何物質上或道義上的援助。在那整個時期，法國總工會領袖並未提到阿爾斯丹丹國際的一個字。法國總工會領袖只在他可能利用自己來鼓勵工人階級團結的時候，這才令人知道它的存在。

在行政委員會在美國的工作，我，作為國際職工會的代表，曾有機會遇到大批美國工人領袖，有機會參加工人會議，訪問工廠。在國內，以及過去六個月內在國外，我遇到了許多民主國家的職工運動者。可以毫不遲疑地肯定說，在普通工人和職工會領袖之間，有一種空前的確信，認為所應有的，是一個能成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的有效的工具的世界職工聯盟。一個人如果明白工人階級的心情，就可以以信心面對將來。

（以沛譯自「新時代」第十五期）

# 排外民族的渣滓

## 一因 幸一

「你是一個在八年民族抗戰中吃盡苦頭的中國人民，對於今天我們目前得到的一些懲治漢奸的措施，不能不痛心疾首地訴說我們的抗議。」

通過報紙、雜誌和其他可以表示意見的地方，中國人民表示了要懲治漢奸的願望，無論是在前線與苦抗戰的將士，或者是在大後方、解放區、淪陷區忠貞不移的和敵偽戰鬥的中國人民，決不令這滔天奸人所造作的罪惡。在前方為敵人引路開道的是

那些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同胞兄弟的偽軍，幫助敵人擊倒他們在淪陷區的奴才統治的這些偽政權的漢奸，在淪陷區佔領、書寫，使無敵抗日的志士犧牲的有他們，在敵人的毒煙下放槍，指目標有他們，敵人的罪行一定受到懲罰，漢奸的罪惡也一定給以清算。然而眼前的事實却不但不使我們憤慨，使我們憤慨。

我首先引述一幾大公報的記載：

「本報的種不少次要漢奸正忙著向孫院長黃日官的官邸，或者帶送一封『名正正』的不明來歷的函件，投遞請軍前進指揮所的一位官員，閉頭道一句，『某某某兄久違。』在中國吃政治飯的反正是那麼一個人，經過、軍官、實證、舉報、大家都可以拉上一點關係。最近的新聞記者首先反正，『中央日報』、『中報』已在『蔣委員長訓示』，『我軍如何如何』，和『重慶的種種謠言』一致了。雖然編輯部的人還是那批原先吹『大東亞』、『和平救國』的附逆文化人。看到這報與胡漢民話，說到憲法好，胡：『國有常典，不容不容自由行動，罪惡之重不問，亦或功過相當。』『大小的漢奸都該隨時地槍斃，拚命立功，庶

可以與這相當！』（大公報九月九日，遼京雜誌）

漢奸不僅沒有受到拘捕，受到懲處，而仍然是終夜游哉，而且還親親戚戚的插身一變又成新貴；他們在敵人那裏下進行了奴才統治，今天，他們又在『維持秩序』，『功過相當』下而高懸在人民的頭上了。

在這種姑息，縱容下面，這種現象自然就必不可免了。

「日本一場合，別人儘管是罪惡滔天，周某（按指胡佛海）却不那樣做，扯起『行憲部隊』的大旗，說是確保治安，效忠祖國，依然神氣活現的做官。官衙門放一塊木牌，兵士們換一塊符號軍章，不就完了。」

那些八年來忠貞不移的人民，目擊着『以前放逐他們的人對在這些那裏束手可憐』，怎樣不怒而起呢？讓我們再聽聽他們滿懷憤慨的心聲是：『假如這樣，下次再抗戰，孫子忘八蛋不作漢奸。』（見九月十二日大公報晚報），這裏是中國收復區人民血淚交迸的控訴。

從這些眼前的事實來看，中國人民對民族的忠誠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中國人民要求嚴厲懲治漢奸的意志是被蔑視了。

我們如果想一想，在過去的八年抗戰中，中國人民憑着最嚴厲的武器，和強大的敵人戰鬥，誰都知道面對着的是一個強大的敵人，誰也知道戰爭是一場沉重的負擔，但中國人民更愛自己民族的生存，更愛自己能够自由生活的意志，這是人民自由意志，也是最可寶貴的民族氣節。假若中國歷史，對於民族氣節一直是非常重視的，任何一個人，如果是昧於敵我之分而向敵人屈膝，企圖苟安求活，或為是幫助敵人壓迫自己的同胞都會遭到人民的唾棄，千秋萬世也洗不掉這種污點。對於一個國家，人民的自由生活的意志，對民族的忠誠，更應當用盡力量來寶愛，發揚。王船山說：『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夷狄……可尊、可禮、可革、而不可使與類聞之。』（黃書原禮記）。如果一個

國家不能珍愛這種民族氣節，保衛民族生存的戰鬥意志，就會使人民愛自由的意志變得消沉起來，宋朝就因為人民民族氣節的消沉，至到後來，遭遇外敵敵人侵犯的時候，就一點不能抵抗，對於當時這朝氣消沉，許多有識之士，都感到是一種危險，李綱在奏摺裡就曾說過，『國家要變，就從節死義之士，其受僞官而屈辱於共者，不可不重。黃福宗平賊，污僞命者以六等罪罪，宜假之以屬士氣。』但當時宋朝的統治下，叛逃國賊的惡處，忠貞義烈之士沒有得到激發，人民愛自由的意志自然也就消沉，不會有一仗死節之士了。

今天，令我們憤慨的是：漢奸的罪惡是滔天，不僅未經懲處，而且仍舊高懸在人民頭上，不僅一個也沒有被懲以重典，而且還有一個被拘捕，沒有一個受到明令的通緝，甚至還有些偽政權的漢奸，搖身一變又成政府官員，立刻原封不動的得到了各種重要軍政要職，這怎麼不令八年來忠貞不移的中國人民感到驚愕和憤慨呢？

漢奸賣國賊之隨處可見，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公憤，在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國家，也是由各國人民進行審判，法國的貝當已被判罪，德意志的希特勒被判處死刑，其他的背叛人民的領袖也受到了應有的懲處；法國的人民甚至把那些在淪陷區所台作的婦女剃光了頭髮。而今天這批對日寇、對侵略者，不僅違背了歷史傳統，而且更破壞了國家的綱紀，斷傷了民族的正氣。

中國人民不能寬容這些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有人喊出：『讓人民來懲治漢奸』，我覺得如果有人不願意『讓』人民來懲治漢奸，那我們就用人人民的共同力量來懲處。我們要求一切願意傾聽人民意志的報紙，來發動收復區的人民，檢舉各個大小漢奸，在敵門前線出來的解放區，他們在敵門中身受到漢奸的罪惡，警察黨的人民曾經用紅旗來記錄他們平日的行爲，隨時用敵門的行動來清算那些罪惡昭著的漢奸。在其他的收復區，人民還沒有這種有組織性的對漢奸罪行的搜集，但他們身受日軍的敵偽行的人決不會忘記的，我們應該



# 原子彈二題

## 一 極權主義的白日夢

有這樣一位「教授」。

在希特勒生前他曾經預言、預讀過這位大日耳曼的「英雄」、「力人」，在希特勒死後他更是傷心。他預言希特勒的「革命者」的命運而掉下。他悲憤的預言未來的和平機構是「五條大漢」管理「四十七條小漢」的場所；他也會觀察希特勒的向婦女們說教，要她們對於「生物的平等」，在「那一個時期」來平等的負擔種族延續的責任。……不知道這教授是德意志的「神聖」還是因為希特勒在作白日夢，這回不姓為「力人」的「英雄」而是「為原子彈而向西洋人進言」，複述這失實，傑作精神一段：

「原子彈如何能使之不殺人，使之維持和平呢？這很簡單，使之始終在『一』的手裡。萬一落在『多』的手裡，則原子彈不但不足以維持和平，反足以促進人類毀滅，因為『多』之中，一定有些壞蛋，或想利用之報仇，或想利用之征服，總之，是毀亂之源。」

「教授」才使原子彈始終在「一」的手裡呢？「教授」是：「不公關」，「惡之深淵」，決不能用於和平「工業」，因為「若用之於『和平』工業上，則必須公開，一公開則難保無人不用之製造殺人武器」。本來應該為人類生活的幸福而服務的科學成果，竟而用在戰爭，使人類受到慘烈的破壞和殺戮，這已經是一件可悲的事，雖然懷着哀矜的心情，但全世界人民不信，這是用戰爭來消除戰爭，來消除戰爭的法西斯主義，是為了一種消除暴政與奴役，壓迫和貧窮，不得已而使人類受到這樣巨大的破壞與殺傷。原子彈用在戰爭上，決不是任何正直的科學工作者，善良意志的人類的目的和願望，因此，「我們必須尋求這種製造原子彈的發明，這

成將來的國際和平，使其無比的破壞力量轉變為世界繁榮的永恆的基石」（阿特曼首相的聲明）。雖然人民的意志如此，然而，那些轉志昏迷的諛辭却是與此道相背的科學成果，不願意把這利偉大的原子「能」用於建設性的動力，而希望「深淵」之「不拿出來」，這樣來維持世界和平。

教授，如果原子彈不僅能對有形的毀滅和殺傷人類的強體，也能對無形的毀滅人類的智力的話，教授對的願望也許可實現，因為原子彈毀滅了一切科學工作者，甚至一切人類的智力，這樣就絕無一切人對於原子彈的探究和發明；原子彈的發明者也就可以永遠「獨家經理」的「深淵」，既使這樣，是否就維持國際和平自然這疑問。

如果人類社會不可能維持幾千年，一切科學工作者和人類智力不難毀滅，英美的科學家可以發明原子彈，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又何嘗不能發明原子彈呢？你要「深淵」不拿出，別人又何嘗不可以拿出來呢？現成的例子，英美科學家研究原子彈的時候，德國科學家不也在研究嗎？如果不英美德科學家的加速進行，不是盟國對德的轟炸阻撓了德國科學家的研究計劃，延遲了德國科學家的研究計劃，誰能担保法西斯德國不把原子彈用來殺傷同盟國人民呢？發見利用原子能的科學家不也有德國的施德拉斯曼(Schroedinger)和漢恩(Hahn)嗎？

「教授」擔心原子彈落在「多」的手裡，因為「多」之中，「一定有些壞蛋」，……是「我亂之深淵」，如果「多」裡面原有壞蛋，但好人總比較壞蛋多，人民也不難用共同的力來監督、來控制，至少可以用共同的力來防止，如果保留在「一」的手裡，誰又能保證「一」不用於侵略而武之用

過報紙、雜誌和其他可以由人民親親意見的地方來揭發和檢舉漢奸的罪行，讓該用大家的力量來壓那些企圖潛形遁跡的漢奸。而一切形形色色為漢奸的罪行辯護的論調，在「情有可原」和「欲得當以報漢」的藉口下，使漢奸們得到了出脫的理由，使漢奸得以除後。譬如前些年時益世報就曾經為法蘭西的國賊貝當的罪行辯護，「是法蘭西的救主還是罪人，只有特來的歷史家能給予以正確的判斷。」這因為賣國賊的罪惡粉飾的行為，我們應當給予正確的予以口誅筆伐，對於其他一切企圖為漢奸辯護的論調，都應該毫不留情的予以抨擊。

為了人民要求懲治漢奸的意志請諸正執行，為了使那些行兇作惡的漢奸到不會漏網，希望今天的各民主黨派的領袖及社會的公正人士，自必的組織調查，檢舉漢奸的組織，幫助人民發覺漢奸，從漢奸的奸細大小罪行，調查一切企圖為漢奸辯護人民的出處。

在各個收復地區，應該根據各該地區的具體情形，組織能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庭，進行公審，對於那些企圖潛形遁跡的漢奸，如何寬恕，應該根據當地人民的公意，其未確切證據也應該根據當地人民的證明。我以為對於官員以上的漢奸，委任以上的官員應該進行嚴厲的懲處，委任及委任以下的官員應該懲處一切充當公敵的漢奸。至於那些在敵方那裏下的漢奸頭子，手上沾染了人民鮮血的漢奸頭子，應該嚴厲的懲處。

漢奸的財產，大半是應榨人民的血汗，這些民族的財產就應歸人民所有。漢奸的財產，就應歸人民所有。今天應該沒收他們的一切財產，這些被剝削的人民，特別是在敵方統治下受有極重負擔的人民，一切被剝削的抗敵志士的家屬，用來幫助恢復他們的正常生活。

至於那些企圖潛形遁跡的漢奸，應該不寬恕，忠奸混雜的任何企圖，中國人民都應該堅決的起來反抗，對於一切違反人民意志的「亂命」，應該要求立即收回或根本廢止。

如果我們不能徹底的懲處法西斯的漢奸，如果我們不能徹底的和平，如果不掃除這些民族的渣滓，就會斷絕中國民族新生的機運。



### 復古論者的新裝

「教授」既不可能，「獨佔」所引起之結果會是一前所末有的不祥的軍備競賽（每日先鋒報）。因爲「秘密與機密對一切國際關係，引起一種有害的影響。」（同上引）。至於那些被感觸原子彈爲奇貨可居，作爲橫攔阻之用者，不過是極端主義者的白日夢而已。

原子彈落在「多」的手裡，引起「教授」狠心的另一點兒：原子彈如果利用在工業生產上，就可以節省很多人力，這些多餘出來的人不就造失業嗎？「無事可做，吃甚麼呢？」「教授」的態도는悲天憫人的。

然而，科學的本身無罪，原子「能」的本身也是無罪的，如果原子「能」應用科學的革命的應用將會引起市場的爭奪與競爭，工人國家的失業，那末這無禮的發明不也就使無數手工業者遭到淘汰與失業，原子能如果不用在和平工業上，固然可以不致引起被淘汰者的失業，如果人類在這種被遺棄之民衆、窮天氏之民衆的時候，一切的科學既然沒有發生，自然也就有人失業了。然而，科學不會在一些人的阻礙下絕滅，一切希望新人類社會前途遠邁的企圖，仍然不過是一些人的夢想而已。

機器的本身不能製造失業，也不能毀壞貧窮；科學的崇高目的爲全人類謀福利，只有當科學的少數人所壟斷的時候，它就會帶給人類以災禍和戰爭，當機器爲少數人操縱作爲謀利的工具時，它才帶給人類以貧窮和失業。從生產的到消費的，從建設的到破壞的，從活人的到殺人的，這已經足科學精神的逆轉與變質了。然而，科學的本身是無罪的，當科學一旦從少數人的操縱和壟斷中解放出來，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更緊密的結合，爲人民大眾所保有、所使用、所控制，科學就不轉而爲少數人謀利的工具，不會製造戰爭與貧困，

而是改進人類的的生活，保障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了。原子能既能提高生產效率，爲甚麼不能夠用來提高人類的的生活水準，使人類「免於恐懼」，「至於國之」呢？戰爭教育了人民，全世界進步人類正在探求一個能使科學合於發展的社會制度；這些，是那些執着舊的教授們所無視，或視而不見的。

這位教授之反對把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用在和平工業，決不是洞燭了科學爲少數人所操縱、所壟斷的弊害，從而生長的對科學的戒懼與懼。如果我們通過那悲天憫人的悲憤虔敬的表情的後面，我們不難嗅到復古論者的腐屍的臭味的。口說無憑，我們無妨耐心的來至函致：

「我們中國人發明火藥，但連開山築路，都不用和，只把牠來做點爆竹，到阿爺阿婆阿婆的生日，才拿出來拍放一下。外國人常常這個笑我們，由今觀之，從人類生存觀點看來我們多麼聰明，他多麼笨蛋！假如我們也像他們那樣傻瓜，立心用之於「和平的工業」上，則過不了多久，第二步便是用之於「和平的殺人」上，正如今日的西洋。

「……我對一向講究「吃」不講究「打」，火藥有助於「打」而無助於「吃」，我們這一個現實的民族就這法實空棄於爆竹之中。但這是「委棄」嗎？從西洋人看來，的確是「委棄」，的確是「可惜」，但從整個人類看來，「委棄」云云，原是「費用」。

這真是一樁可惡的事情，這些「教授」的貴弱與空虛真是出人意外，雖然有着一些字句上於不同，但意思和內容竟和別人完全是一致的（讀者如果有興趣不妨看看郭任遠君「世界文化的危機」的講稿，曾發表在大公報）。這些人已經重讀過一千次的東西，竟然有人披拾唾餘來作一千〇一次的反動，「教授」的貧弱真不能不使我們感到驚異。據說這是中國卓越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的人生觀」。這是中國人對科學的「善用」。火藥做成的爆竹，既然只是在「阿爺阿婆阿婆

阿媽的生日，拿出來拍放一下」，當然是既無娛樂，又不傷人的事情。較之於把火藥製成子彈來殺傷骨肉而後自自然然地，中國人不僅不把火藥用在戰爭上，而且不用之於和平的工業上，自然應該杜絕一切的戰爭的災禍了，然而不幸得很，火藥雖然沒有用來製成槍彈（甚至沒有用來開山築路），而戰爭殺伐却絲毫沒有因此而減少，「不和平的殺人」也從沒有停止，說起來似乎並不那樣值得誇耀，火藥之沒有用來製造子彈，但並不是不願不而而能不斷的開向，這在明末不就有入在向耶穌會人學習製造鐵砲嗎？至於那些用人民的血汗向西洋人購買「不和平的殺人」武器，來殘殺中國人民更是有治者應來的得意傑作，這從「中國的名將」的會圖落起，不僅有西洋人買來了殺人的武器，甚至連請來了西洋人幫我到使用。假如這不算中國的「聰明」人吧，在可以向西洋購買子彈以救，我們不仍然運用了刀、槍、箭、戟……來自相殺傷了幾千年嗎？就在「有子彈可以買之後，我們也有以粹的，大刀」的。

科學不能自己製造戰爭，如果世界仍舊充滿了「暴政」與「奴役」，如果千百萬人民的命運繼續在少數人的手裡，還在忍辱和受難，即使一切的科學都已經絕滅，「不和平」的「殺傷」仍然會繼續存在的。如果我「用「不和平」的武器，來消滅了一切戰爭的根源，消滅了一切「暴政」和「奴役」，讓一切作仁人類最高智慧的科學成果，爲人民所掌握，所使用，（而不是一批之深淵的壟斷在「一」的手裡），一切的科學成果就不會成爲「不和平」的殺人利器，而是造福人類的工具了。

空談談論不了現實鬥爭，科學不會在任何人阻礙之下絕滅，要想新社會文化的發展的進路，不過是技術的發明與昇大的企圖而已。

無論披著甚麼新裝，仍然掩蓋不了復古論者的腐屍氣息的。

八月十八日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人民新生活的姿態

一 走過平山縣那莊莊了，就有一種新鮮的印象。

我仔細想想，這新鮮的印象怎麼形成的呢？

我對一個村，我的馬便被街口的一個兒童圍住了，他雖然頂多也不過十一歲，可是老練的很，抓緊繩子，問我：

「同志！路像呢？」

我把繩子遞給他看，他並不言，隨即交給袖旁路的一小孩子，那小孩子也一溜煙地跑開了。一會回來，把繩子交給我，說：

「對不？同志，就跟你走路了。」

這孩子小手放在額角，向我全體敬了一個禮。

走進村里，人們都忙忙碌碌的樣子，但行動得很快，路上更熱鬧，街道也出奇地清潔，絕對使人們不覺是在敵後戰爭環境下的一個村莊。當然，雖然去冬大雪的抗戰時期，有幾家房子已給敵人燒燬了，這一唯一可看到的戰爭痕跡。一個中年農民，從遠處走來，見了我們，說：

「同志們，辛苦了，歇歇吧。」他過來牽了我們三匹牲口去睡，一邊說：「你們在村里歇會吧。」

· 1 ·

他拉着馬在街上給我們讓了路。這時，從側面又走過來一個青年農民，他問我們渴不渴，這是我所迫而為之的，他領我們到村公所去，那時提出兩盞開水給我們喝。

當村長知道我們今天不走了，要住下，他派了一個人出去，兩袋麵的工夫，那個人回來，說是房子找好了。他領我們去，在附近幾家，給我們找了六間很清潔的房子，連喂牲口的地方也有了，就在院子裏有個牲口圈。

一會，米、菜、油，鹽……按照我們人數的數目都送來了。我們簡直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的舒適，村里的人如同就是我們兄弟姊妹一樣的對待我們，彷彿早就知道我們要來，一切都事先準備好的。其實不然，因為村長經常帶領隊員往村公所去交際委員，料理一切，這就減少軍事上的麻煩。

領隊的說明天在這村休息一天，我也還沒做好，我們行軍以來，在對銷線上很少說衣服，何況又是許多人擠在一條炕上，每個人毫無例外地都生了蚊子，這時洗了澡，換下衣服自己在洗，洗完了，用開水一燙，有的就在火上蒸，把蚊子驅清了，身上也感到無限的輕鬆和快意。

吃過飯，天已黑盡，大家紛紛到炕上，脫掉衣服，準備舒舒服服睡一覺了。——我們有好幾天沒有舒服睡覺了。

我剛躺到炕上，就聽見炕上有規律地起落着許多人的腳步，一會止步，一會又在起步，然後就聽見雄壯的喊聲：

「一二——二——三——四——」

這喊聲使我很奇怪，天已黑盡，雖在村裡睡覺，越聽越不適，從炕上爬起來，披上衣服，好奇地走出去。

原來是村裡自衛隊員，白天種生產，晚上睡覺以前，就操練一個多小時。幾十個人打鼓，有規律地齊聲地操練着。

解放區有三項大事：第一是戰爭，第二是生產，第三是教育。所有的人都投入這三項事業去了。我剛來的時候，看見一個自衛隊員，手裏拿着一把亮的大刀到村口站崗去了。——白天是兒童團，晚上是自衛隊放哨。

躺到炕上，一覺醒來，村子裏充滿了一片蟬聲。

「一會，村裏兒穿絨織的「習促身起」來了，他催我快點起來。下地做活。剛才打瞌，就是叫村裏人們醒來的，如果這不醒來，兒童就來督促了。我也連忙穿起衣服，走到門外去看：家家戶戶的門前走出青年，壯年，老年的人來，肩扛着鋤頭，一會個個像潮水，漸漸成了一個，向村外走去。

這是村裏那才識所領導的變工互助的集體的大開荒，一共四十二個人，他們已開了生荒三百多畝，共用了七百三十一個工，並且全部播了種。全村四百八十多畝熟地，全部耕完，二百五十多畝穀子山裏也播了種。

不僅在田里勞動上他們組織了起來，即連牲畜也組織起來。全村八百多隻羊和五十多頭牛和二十幾個驢子都組織起來，大家輪流放，供不認飯的人家，由村裏生產委員會和村合作社解決，秋天償付。原來一家有一頭羊一隻牛要派人去放，現在所有的牛中起來，只要四個人就夠了，可以節省出很多的勞動力。

村裏青壯年的男子都下地去了，我回到家裏，看見房裏的婦女，她們忙過早飯，現在已坐在紡車旁邊，在紡紗了。現在全村已織了三十多付紡車，還不夠，不過合作社和市場上的紡車供應不備，只好慢慢補上。有許多婦女不紡紗的，就跟着學。此外婦女還把空餘的時間弄出來，養蠶養蠶，每個婦女也和男子們一樣，都做了一個人的生產計劃——除了養蠶養蠶以外，還要做鞋子賣，給機關機關（機關機關送麥子來磨麵，不單鞋子給磨的人，另外還要分紅，利息很大），割樹，參加農業勞動（平均每人每月大概參加六天的樣子）。全村計劃種桃樹杏樹各三千株，胡桃樹一千株，辦三百隻小雞，養五十口豬，現在已買了二十九口了。

我發現這村子裏沒有一個不生蠶的人。

如果因為生活困難，不能生產，怎麼辦呢？

村合作社發放貸款，全村人們又動員了五石六斗貸糧，在附近的XX友隊政治部也買了四石糧食送來貸給貧苦人家。這樣，生活問題解決了，就能參加勞動，生產了以後，生活問題自然解決，而且改善了。全村最窮的董榮和家，借了貸款，參加開荒，把自己七畝地種上了，生活也有了保障。

生活改善之後，人們自然就會注意到衛生工作。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服，褲衣服也常洗了，吃飯碗筷都洗得乾乾淨淨，小孩子也每天洗臉了，廁所糞圈都收拾得很乾淨，牆上都刷白灰粉了。村裏人自動地每天打掃一次，並且村裏有個衛生檢查委員，三天檢查一次清潔，所以村裏的街道那樣乾淨。

中午，開荒隊從地裏回來，各人回去吃飯，約莫不到一小時，村裏又響起鑼聲，人們三三兩兩地向村裏的小廟前走去。一個大核桃樹下，聚集了三十多個人。我也走了過去，人羣當中一個人站了起來，他是村裏的小學教員，手裏拿着一張報紙，說：「平山那家莊的人民組織起來了。」教員就把這一段消息讀給他聽，頓時人羣便浮出來歡快的笑聲。

「咱們的事也上了報了。」  
「可要好好的幹，全區都知道咱們了。」  
「咱們要組織得更好，和牛各莊比賽。」

### 孫榮臻將軍

到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第二天早晨，我去和家莊訪晉察冀軍區司令官孫榮臻將軍。

政治部在稻園村，離司令部五里地，騎上馬，一會便到了。

孫榮臻將軍是一個智識份子出身的軍人，是一位儒將。一八九九年他出生於四川江津的小地主家。

從來和農民不發生關係的報紙，現在他們的筆

法却成了報紙上的這首新聞，這是破天荒的一個大變遷啊。人民和報紙有了血肉關係，他們從報紙上得到許多農業上的知識，全區生產經驗的交流，人民的成長……讀報已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之一了。有的人，很早的時候，也不忘記去聽讀報，不聽聽報上的事，彷彿生活中缺少一點什麼的，不聽好安心去休息。

讀完報，他們回家去歇晌，然後又下地開，從事勞動了。當太陽西下，他們騎着馬，從遠遠的田地里，唱着歌，愉快地歡呼着，揚着鞭子，慢慢地回來。羊兒，牛兒……也從山上跑下來，把村裏一條正街擠得滿滿的了。每一頭羊每一隻牛，都很熱心自己主人的任務，也於自家門口，便自動地進去了。

晚上，按照各人的編制，青壯年，自衛隊，婦女隊……都到自己的隊集合處，又開始訓練了。

多麼活潑快樂的戰時生活啊！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人民新生活的姿態！不僅是我一個人吧，我同行的許多同志也覺。實着看這在人羣中間竟發揚了，他忘記回去睡覺，我們明天還得趕路哩。  
三天之後的夜裏，我們到了晉察冀軍區政治部。

里，過二十歲那年，在四川一個舊制中學畢業了，遂清「五四」運動，像一陣狂風似的，席捲了中國的大陸，新思潮從黃河流域而長江，一直流到天府之國的四川。年青的孫榮臻，挺身而出，迎接了新思潮，參加了這一劃時代的運動，並且組織了中國生，研究新思想，獻身於愛國運動。受了新思潮洗

他的選擇，抱負着當時自由主義的實業救國的思想，一九一九年，他參加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冬天到了法國，半工半讀，開始是進入一個樹膠工廠，後來進法國最大的史乃德軍火工廠，這比利時勞動大學學習化學。回到巴黎，又進雷樂汽車工廠，和托曼松電氣工廠做工。當一九二〇年，他在比利時勞動大學讀書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志願！他決心學習化學，求得實用的科學知識來救國。他到中國。

固然他在中學時代，受了「新青年」雜誌所介紹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很深，把他從嚴復譯的勸學篇大談論所受的恩惠影響，向前推進了一步，可是實業救國的思想還是吸引着他。

但等到留法同學開始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時候，他從實業救國的思想轉到實際的政治軍事鬥爭方面來了，特別對軍事上戰略戰術的研究，吸引了他更多的注意。

當德國在一九二三年，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二十四歲的許崇智，從巴黎到了柏林，和德國革命黨人握手握手，在人民黨中，高唱着國際歌在柏林的街道上前進。他從這一個運動當中，吸取了許多鬥爭的經驗。

一九二四年，他被歐戰黨的委員會派到莫斯科學習。他從巴黎到了莫斯科，進了東方大學和黨校軍事學校，這更使他對軍事方面，有了進一步的興趣。

他在一九二五年夏季回到中國，擔任廣東實業補習學校政治部部長和校務主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返粵，他到廣州在中山樓，說說之後，任中共中央廣東省黨委工作。之後，就隨從北伐軍出動，直到武漢。馬日事變之後，被派到九江組織前敵軍部，以十一軍黨代辦的資格，參加鄧錫光的南軍。

起義，後來又領導廣州起義，直到他在一九三二從中央軍委調離江西，他始終沒離開過武裝鬥爭工作。

抗戰以後，紅軍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他是一五師的副師長兼政治委員，正師長是林彪將軍。三七年秋天，他到了五台山。這時候，敵人陷平津，下南口，佔歸綏，進大同，大軍蜂擁而到，在平門關了。孫榮壽將軍和林彪將軍，率領一一五師戰士，進入雁門關以內陣地，敵人所向無敵的飛機的板垣師團，連受劉善群林兩將軍嚴厲的一擊，這就是我軍所知的平型關戰鬥。

八路軍總部和一一五師主力，奉命馳援太原，子關一帶的危急形勢，孫榮壽將軍受命留守五台，深入晉察冀內外長城線之間的廣大敵後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雖然他手下只留有一個兵團不聽賴的兩個連以及一個騎兵營，在他英明領導之下，終於開闢了抗日根據地，解放了無數的村鎮和縣城。

十一月七日，晉察冀軍區成立了，他是司令員。當我走進司令部時，他在會客室裏接見了我。他穿著一身草綠色的軍服，馬鞍，腳上穿著一雙草綠色的布底圓口鞋，扣着風紀扣，左胸袋的上端掛着第十八集團軍的圓徽章，給人一種整潔樸素的感覺。他的兩眼炯炯有神，特別是注視事物的時候，更顯出那銳利而又謹慎的光芒，在兩個圓徽章之間，若一條隆起的有新突出的鼻子，兩眼寬闊，臉頰消瘦。他給我最初印象是一個嚴肅，寡言笑，沒有熱情的人，這就使人覺得不容易接近他，因為他老是那樣冷峻的，彷彿是永遠在閉着，即使給你講兩句話，旋即就又閉了，在嚴神地審視着你。他講話，虛詞少，彷彿每字都有了準備，老是那樣的安步就班，顯得安詳而又幹練，可

使在戰爭最激烈時候，即使突然發生什麼重大事件的時候，他臉上也不會顯出一絲的緊張和忙亂的痕跡。在他那裡，什麼事都佔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步驟，一定的處理方法，使你信任他。這是我最初的印象，大體上都可以說不差不少，但不一定是完全對的。

在以後和他相處的時日裡，從我所見到的，聽到的，所知道的，有些印象是更加以修正的。首先他是一個熱情的人，不過不輕易表現在外表上。在他的嚴肅的外表裏却潛藏着豐富的感情，他的眼光裏就充滿了慈愛和同情，他對軍區每一個指戰員有深切的體貼，關心他們的生產工作，關心他們每一件小事，就像他父親關懷他的親生子女一樣，戰士們常給家寫信，「我們司令員他信得真，可常給我們說話，教我們的事情可多哩。」而我們司令員自己說：「離開了他（指戰士），我就感到不安和孤獨。」當他接到家信時，自來水的燈盞時，他更按捺不了他對親切的感情：他看穿了兩兩行，眼淚便忍不住流下來了。這時他正在廚房南牆的泥塗壁成立三週年的大會場上，他頓時離開主席台，一個人跑到這燈盞下，低頭祈禱，用手拍地流淚，聲聲哭泣了。

他對人民更是充滿了熱愛。當一九三九年，晉察冀邊境那幾十年來罕有的大水災時，他傷心領地地設法把人民從水災的災區解救出來，他這種表了感情：「……政府應該救濟救濟，粥食食糧，種種救濟，盡力進行補助工作，全黨同胞要高度發揚友愛互助的優良傳統，同甘苦，共患難，共存亡……」

全邊區於是掀起救災的浪潮。人民在政府和軍隊的幫助之下，渡過了嚴重的春荒。

如果從他參加革命二十多年的經歷來看，他

人與本來的軍事更有着無比之忠誠和勇氣，一個  
燒熱的軍情，貫穿在他們的戰鬥生活里。

這可笑，也不確實的，應該說是不苟言笑，僅  
的一舉一動都有分寸，一有一笑，必有分寸。當他指  
揮大軍消滅敵人的時候，他的臉上常常露出笑容，  
常常於大笑。三八年冬季他指揮部隊向敵人的  
斷攻，當他從電報里知道各路敵軍潰散，五台敵人  
亦有被毀滅，他就下令：『五台這股敵人，一夜  
行軍進入到高洪口，一定要打掉它！』當時的部隊  
今天還保留，趕到河口臥伏，等敵人趕到去的時候  
，即決消滅！』

第二天正午，他和大家在院子裏吃午飯，使  
報來了：

『河口戰鬥我軍跑步趕到指定地點，設伏完畢  
，敵已退至，我將敵全數殲滅，請速甚多。』

他馬上放下筷子，仰面放聲大笑了。  
然而他並不是滿足於自己的勝利而笑，更不地

因勝利而忘記戰鬥任務。全邊區把敵人打退以後，  
各地湧起了祝賀的歡呼，千萬個青年同着那英雄將  
軍高呼。他通過歡迎的行列進入解放了的阜平城，  
在一個晚會上他說：

『敵人吃了一次虧，總要來報復一下的。敵人  
是很講面子的，這一次，它是被要臉要成怒的！』  
說完話，他恣情的笑了，不過一會又恢復那嚴嚴的  
表情，準備下一步工作了。

他不但不是發笑，而且是很很有風趣，談吐很  
幽默的人。看這真是敵人的心腹之患，桑木師團長  
在東京的師團長會議上說：

『不斷消山地「匪軍」，要趨明朝舉北，是很  
困難的。』

但是一些少不更事的年青法西斯軍人，却夢想  
肅清山地，敵酋田中部長，探知這軍區後方動向

和抗日火線是在其後方，他派了  
幾萬子弟，企圖吞下「紅大學」——即抗日日  
大學而言，並且寫了一封給新榮，這封信送到  
了。敵人在國匪山一帶調到了自己的軍隊，八百  
多敵人無目的地在山下，企圖消滅敵人的，這屍  
骨也來不及帶走，只剩下八百多隻左手，企圖帶  
走，被敵軍打，帶回國去，俄所謂「無算的頭腦」  
。後來敵軍地只圖逃命，這八百多隻左手也帶回  
去。

最後，田中司令到了陳莊。這時他才得到田中部  
隊長斯訂他的那封信，他看完了那封「戰書」信  
，便哈哈大笑。原來是田中部長長遠約他在那莊  
師，要他「和平合作」的「招降書」，他隨即放去  
笑容，對四處的人說：

『可惜的很，我現在到陳莊，已經看不見田中  
部長的官兵了，我只看見他們在戰場上的屍體的  
屍骨，惡吊一番而已！』

他雖然笑，也是很矜持的，雖然幽默，也是很  
莊嚴的。你在他的面前，永遠感覺得他是一個長者，  
和他在一塊，彷彿天下什麼了不起的大事，都不值  
得驚奇，可以應付得神神有餘，覺得有條有理，一  
切事件的發展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難怪得在他  
部下的指揮員，既敬畏他，也信任他，更是愛他。

曾經和他指揮下戰鬥了十多年的老指揮員，甚而至  
於是很調皮的，但是聽司令員一說話，或者聽他的  
命令一來，那說話也沒有話說，剩下來的是：

『行動！』  
因為無數次的戰鬥經驗證明他的意見和指揮是  
英明而又正確的。

甚至在最危險的時候，大家只要看見有司令  
員在，即連最胆小的人也會放心的。因為即使戰  
鬥最危險的時候，司令部距離敵人只有幾里地，他

總是英明的，不顯露色，他總使情上着，像其  
會以為附近沒有敵人的，他就有這這這這人的眼量。

自熱，原有過人的胆量是不好的，他還有過人的智  
慧。記得一九三九年冬天，我部還於如參加掃蕩  
敵後，當軍區司令他過過了河，派次到北北邊  
付一帶時，敵人大隊給我糾纏了二十里左右的距  
離，我們前進，敵人前進，我們休息，敵人休息  
，我們休息，到後來，敵人以離我，十里地左右，因為  
敵不清我們的實力，不敢放膽下手。而我們的行動  
，無形之中，被敵人監視住了。但敵軍榮耀將軍便  
安定地在地圖前無視路線，最後他命令一部分武  
裝部隊浩浩蕩蕩公同宣稱向大路到對面去，其餘  
的部隊也向對面方向走去，可是走到半路上就消  
銷住消息，所有的部隊都在途中停住，轉折入一  
條狹小的山谷，這是一條絕路，如果敵人在兩側一  
封鎖，那所有的生命都將在敵人手中了，敵人絕不  
不到新的命令都會走入這條山谷的。跟隨我們前進  
的敵人部隊，果然給我們武裝部隊引到對面去了。

敵人到了對面，想對面為什麼到了對面，八  
路軍就沒有呢？八路軍就在他後面，而且襲擊上  
來了。

過人的胆量加上過人的智慧，終於勝利。  
這樣，跟着司令員打戰，誰會沒有一點點不  
信任他呢？

他不僅僅是個英明的軍人，而且是一個出色的  
文人。雖然他不會寫文章，但如思他勤筆寫文章  
，字里行間，便充滿了一種藝術的感染力  
，使讀了之後，永遠不忘。他還寫了你的  
思想，一直會貫穿到你的行動中去。他自己身子  
里有一個活動的白木書架，上面有各種地放着他  
精讀的書，他寫馬列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有關  
到的地方。對一般藝術作品，他也有深湛的愛好。

他不僅僅是個英明的軍人，而且是一個出色的  
文人。雖然他不會寫文章，但如思他勤筆寫文章  
，字里行間，便充滿了一種藝術的感染力  
，使讀了之後，永遠不忘。他還寫了你的  
思想，一直會貫穿到你的行動中去。他自己身子  
里有一個活動的白木書架，上面有各種地放着他  
精讀的書，他寫馬列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有關  
到的地方。對一般藝術作品，他也有深湛的愛好。



他不但自己這樣，而且把這項工作放在軍隊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位置上，他說：

「文化生活是一個革命軍隊所不可缺少的，它不是沒用的裝飾品，而是活的力量。軍隊需要戰鬥力量，就一定需要文化。」

同樣的，他對廣大人民的文化，也賦予極大的注意，他說：

「現在，根據地建設的條件更進一步需要我們解決廣大人民的文化食糧的問題。我們的人要吃糧，這是有先要解決的；槍砲要有彈藥，這是有先要解決的；現在進一步要解決到人的腦子，要用大量的文化食糧來喂養它。」

他指出並且強調藝術最緊要地服從於一定的政治鬥爭目標，把藝術做為政治工作的武器，他這樣以為，也這是在實際的解放區上，展開了人民的文化運動。這是我過去所不曾見過的，文化是從勞動者羣中產生的，但是現在文化和勞動者羣是息息相關。在新的地區，文化又回勞動者的手中了。

他是個軍人，是個文人，又是邊區的家長。如果說軍區是個大家庭，那他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他如家長愛護每一個子女，每一個指戰員又如子女一樣的尊敬他們的家長。

在孩子面前，他就顯得年青了。他一個孩子接近，他臉龐上就不斷地浮上笑容，天真地和調子在一塊玩耍。甚至是他敵人的孩子，他也一樣的愛護。

記得在百國大戰時，蘇聯在井陘縣俘獲了兩個日本女孩，母親在砲火下死了，父親受傷，昏迷無效，也死了。兩個女孩送到前方司令部來，他親自拿糖給女孩子吃，說：

「小娃娃，不害怕，吃這個糖，甜的呀。」  
女孩子在父親般的慈愛中接受了糖，像回到家裏似的，一點也不怕。第二天司令部裏寫了一封信

，派人把兩個日本女孩子送到敵人的補給部去了。這件事，會深深打動了敵人的良心。他說：

「敵人雖然殘忍地殺害了我們無辜同胞和兒童，但我們決不能傷害這些無辜的孩子，和日本人民！」

他對敵人的界限是何等分明，他對人民的愛是如此的強烈啊！

當我聽在他的談話下，一天天成長起來，解放了遼闊的土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和人民的軍隊，帶着徒手的人民去打掃殘敵，擊斃敵人的武裝，來武裝自己。自己又建立了「邊區的兵工廠，修理武裝，製造武器，我曾經看到軍區兵工廠製造的步槍，戰士們都喜滋滋地使用，因為這自己造的步槍，那火力，那射程，真等於從前式的。

美國大使館武官魯贊，卡爾遜先生參觀，邊區之後，他說：

「我實在覺得驚奇，在四面被包圍的敵人後方，能夠辦這多的事情，我從未見過；：第一次歐戰，我在德軍後方，：啊，那是決不能與你相比的。」的確的，誰能走到這區，而不驚奇呢！他在這地區，雖然被廣大人民所愛護，被「大的戰士們擁護，但是敵人是恨恨他們的。從敵人每一次掃蕩時所散發的傳單上，就可以看出敵人是怎樣的痛恨他啊。傳單上說：

「孫榮發已陣亡！」  
「孫榮發病重垂危！」  
「孫榮發，身逃亡延安。」

他看到這些傳單笑了：  
「可惜我沒有飛機，敵人也會知道，我還是靠清國條路走呀！告訴敵人，我始終和他保持最親密的接觸。」

敵人也知道他們經常在被圍司令部所指揮的區隊打擾着。

他這敵人痛恨的人，就這被人民所愛護。孫榮發將軍和他手創起來的晉、冀、魯、豫解放區，成爲抗戰中東北的一個堅強堡壘，解放了東北一千二百萬人民，他組織的旗幟一直插到北平近郊，「滿」的邊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這個堅強堡壘成爲解放華北人民的前進基地，孫榮發將軍指揮着無窮的兒，在廣闊的戰線上，向敵佔區反攻，解放了張家口，解放了平山，解放了天津西北六十里的楊村車站；：大抵向敵人的心臟地區推進；：孫榮發將軍將與人民的太陽，他的光芒照耀着解放區。

我在會客廳里和孫司令談話了將近一小時，最後他很關心地問我後方的文化情形，我談到後方我們做文化工作的人，面對着這一位位被敵地創造者，我們在文化崗位上的努力情形，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呢？

隔幾屋子他還有客人，我便辭了出來，準備回到政治部去。

(未完)





# 租佃制度的調查研究

怡然

——評「四川租佃制度問題」

郭漢鳴孟光宇合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在書中提出關於租佃制度一問題調查研究的實情，「四川租佃制度問題」，要算是較為詳盡的，見實參閱。不過，在我讀過之後，有兩點準備在這裏提出來：一是關於調查研究的方法；二是關於內容的討論。

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從書中調查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我所讀方法，材料是蒐集一端，最要緊的是我們對待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把問題看成靜的？或看成動的？如果僅把問題看成靜的，那末在蒐集材料上，我們僅注意於問題內部的方面；如果我們把問題看成動的，那末在蒐集材料方面，不僅止於注意問題的材料，更須注意實際的材料。在研究分析上亦復如此。

方法可以影響到內容，更可以影響到對問題的理解。如果我們把問題看成靜的，那末在蒐集材料方面，我們僅注意於問題內部的方面；如果我們把問題看成動的，那末在蒐集材料方面，不僅止於注意問題的材料，更須注意實際的材料。在研究分析上亦復如此。

來研究起來看，而不能從問題發展過程的本質去研究，這是不對的。雖然不是決定的因素，所謂決定因素，是從相對的意義上來了解的，因為這因素的本質，也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

研究問題，有時為了方便起見，常把問題放在靜態的假定上，那是必要的，但只是一種假定。止於靜態的假定，如果真正從事調查研究的時，那是不夠的，還必須進一步從動態，從問題的發展過程去調查，去研究，才可能獲得生動而豐富的內容，與正確的結論。

郭孟兩先生合著的這一本書，我看過兩遍。我對書中的觀點的印象是：偏重在靜態方面的調查研究，無從蒐集材料，調查內容，以至於兩先生對這問題所做的結論，均保如此。如果從動態的假定上來估計調查，郭孟兩先生材料的蒐集與調查方面，給一般研究租佃制度問題的人，確實許多

的。這調查，包括兩區域，與可能接觸的問題，都非常廣泛的。據書中的第一節說：「自一十八年夏間起至二十九年冬止」，「足跡遍四十九縣。凡二百餘鄉」。計四十九縣中共得租佃戶調查表二百二十八份。又每縣每鄉得租佃戶調查表二百戶至四百戶之間，共得調查分戶調查表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份。其次由四川省土地陳報處分訪各縣土地陳報處或財務委員會，依地政學院擬定之租佃制概況調查表從事調查，計收到回件七十二份，表九十七張。除此，并搜集租佃契約一百八十一份，作為參證。被調查的七十二縣，按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的分類，(一)成都平原區，共十四縣；(二)川西南區，共二十一縣；(三)川西北區，共十七縣；(四)川東區，共二十一縣。包括的區域是相當廣泛而且很多都是較為重要而繁榮的，如成都平原區之成都，綿陽，溫江，大邑等；川西南區之嘉定，宜賓，資中，瀘縣等；川西北區之三台，

續編，南充等，川東區之巴縣，涪陵，萬縣，宜賓等。這些縣份，有的是平原地帶，有的是丘陵地帶，有的是近河地帶，有的是近山地帶，大體上算是包括了四川不同屬性的地區。

調查的方法，據作者自己的敘述，分作兩方面：一、由作者實地調查，一面採取通訊調查的辦法。兩種辦法，作者是以實地調查為主。依據調查第一表，實地調查的成果，與通訊調查比較，是一千與七之比，在比重上，這實地所獲之實地調查材料，顯然成爲這書內容構成之主要部份。所謂「實地調查」，據作者敘述：「是除過四十九縣，凡二百餘地，各縣逗留之時間雖短，然所到之地，或直接或間接，或請托土地陳報處派員，用鄉區佃制調查表，分頭進行，深入民間，門到戶說，匪特訪諸父老，且亦隨隨隨。每至一縣，寧不登其公堂，必履其田野，每至一鄉，寧不識其諺語，必親其民衆，盡其知地方情形而能道出其原委者，乃爲久居鄉間從事耕作之農民，聽其自陳述，察其生活狀況，自屬求所真實之必要步驟，故雖跋涉窮鄉僻壤，亦不嫌煩。」由此，我們知道作者實地調查的材料來源是有兩方面：一是直接派員，一是請托土地陳報處派員。此種實地調查的材料，據作者說「深入民間，門到戶說」，嚴格地講，還不能自爲直接材料。直接材料，必須作者自身深入民間，門到戶說，對「久居鄉間從事耕作之農夫」，親自訪問，而且在訪問的時候，還得要「眼睛向下」，具有一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否則，雖履田野，也不能獲得田野之真實情形。至於調查，假手於員司或土地陳報處派員，所得材料之真實程度，那更有限，這點，凡初爲了解一般公務員與農民之間隔膜情形的人，都應該知八九。

從調查方法上說，實地調查較通訊調查爲重要

，且可靠，但如實地調查不是作者親自訪問，而是假手員司，或者，即便親身訪問，而非以「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求對於老農深問，其所得材料之真實程度，和通訊所得，也不致會相差太遠。如果我們要論及實地調查的話，對劉孟兩先生所採方法，則不無商榷之處。

實地，在內容的處理上，會就材料分類：佃農戶口；佃地面積；承租手續；租約種類與形式；租期；押租；納租種類；租額；交租時期與方法；荒歉減租；佃租佃習與中間制佃；租佃糾紛；退佃；佃農生活與教育；地主及地主所有地而租與農業分類。除此，作者并有統計表三十二幅，凡有數目可稽的，作者均以之附列統計。

作者在處理這些材料的時候，租佃問題所包括的各方面，大體上是按類別的，而且在處理材料上，還提供了我們一些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比如：關於租佃制度與農佃國家經濟發展的前途問題。

雖然，作者在主觀上并未把租佃問題的重要性與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前途聯繫起來看，但從這書第二章，第十四章，與第六章第二節各部份的敘述歸併在一起考察，則是證明現行之租佃制度，是障礙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因素之一。據該書第二章關於佃戶比率與佃地比率的記載，四川省內被調查的四十九縣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戶中，計佃戶數佔百分之四十八，幾達各類戶數總和之半，其他佔百分之十五的自耕農佃戶，尙未計入。如以人口計，被調查的六萬四千六百餘人口中，佃農人口要佔百分之四八·三，自耕農佃農的人口佔百分之十六。如以耕地面積計，被調查的十二萬二千六百餘畝中，佃耕地要佔百分之七九·七（包括自耕

農佃農的土地在內）實地耕種地九萬六千九百餘畝，佃農在整個農業生產的地位上，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不僅是指四川而言，比如作者在第十四章的一節中，舉全國佃耕地面積和全國耕地面積比較，承租佃戶平均佔百分之三·七三。自然，就租佃問題嚴重的程度而言，當推四川。根據該書第二章的記載，四川納租租額，「統計數租佃佔百分之六，上中下等田土，悉行此法，其租額不厚者僅有，租額佔百分之八九。因爲納租以穀計，無國地主或佃農，都怕穀租受旱災歉收的影響，對一切「靠天田」，則穀租積多水，不積麥豆，名此爲「水田」。」據中央農林實地所於二十七年秋之調查，川省納租冬休佃者佔租佃百分之五十六，中蓄積冬水者佔三分之一，約一千萬畝。佃戶平均以產麥一石五斗（市石）計，以產麥一市石計，那末全川在總的收穫量上，至少每年平均上收麥一千五百萬市石，或者少收幾百一萬市石。

這還是僅就平年而論。一遇過次春乾旱，則高產田額之冬水田，每易乾涸而不得補救，此於川省中飽爲尤甚。蓋其全年雨量不過八百至一千公厘，在時期適宜，分佈均勻之年，乾收水稻之生長，若遇偶旱，蒸發容易，即遭乾涸。」如此，不僅春旱失，而秋收亦往往茫然。此種現象，如果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上看，顯然是極不合理的現象。然而，此種極不合理的現象，在抗戰時期，軍事需要的形勢下，不惟不會有減少跡象，在民國二十九年秋，反因「米價高漲，超越其他農產價格，地主貪圖厚利，絕令佃農蓄冬水，以備翌年種稻。凡此靠天之稻田，幾全部蓄水」，足證此種不合理的租佃制，障礙整個農業生產之發展，達到何等程度？農業生產萎縮，市場縮小，在對全國經濟的影響，又將如何？凡此，都是值得重視租佃制問題

曾增成的人，好好考慮的問題。

其次，關於現行租佃制與封建強租制問題。

封建性的強租制，是東洋農業生產最主要的原因。在現行農村中，強租制則還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根據本卷第七、第八、第九等章，恰足以證明這一點。以最普遍的穀租而論，「全川平均穀租佔收益百分之六十以上」，在成都平原，「最高竟達百分之八十四最低亦在百分之四十」。除此，尚有種種附加租。關於附加租部分，作者列舉了六種：(一)力役；(二)送柴草；(三)送菜蔬；(四)送年節；(五)送新粟；(六)送租雞。關於附加租部分，作者列舉了八項：(一)代種扣租；(二)合會担保；(三)升租加佃；(四)埋明酒(上下佃發生爭持時)；(五)請主讓租；(六)掛紅禮；(七)押租和；(八)壓田法。在租佃制中，尤以「代種扣租」，為戰時佃農最痛苦的事。四川省備徵，有「跟田帶租」之制，一般地主於納田賦交地捐時，多令佃戶暫墊，俟交租除於租額內扣除，佃戶缺款，只得賣穀，至佃戶因此而欠租，地主於次夏將市價折合，賣於佃戶。此種代種扣租之實價，相差甚遠；且所代墊之款，雖達八九個月之久，亦無絲毫利息。而到了到時，沒煙酒供應，租額不足，則「封權坐卡」即在這種情形下，佃農亦不能不忍氣吞聲。蓋於此，似無其他求生途徑。在國家經濟呈現着普遍困難的時候，農村中的強租制，將更加強。據本卷第七章記載，三十年來，鄉村中租額之增加平均達百分之十。以四川的地租額而言，實已居全國第一位，然農民尤俯首帖命，任地主驅佈，考其原因，實由於現行租佃制度未臻合理所致，而此種不合理的租佃制度，恰又是構成地主對佃農強租制的根據，如剷除農村中之強租制，改善現行租佃制，自屬當務之急。

當務之急。

其三，改善租佃制，必須從改變政治着手。

許多改善租佃制的人，往往避開政治，把改善租佃制度的問題孤立起來，而操具若干無法付諸實施的方案，結果，這些方案都停留在紙上，對現行租佃制並沒有絲毫影響。對此，本書作者亦不無缺點。不過，本書租佃制一章(第十章)，從樸素的敘述中，却告訴我們一條解決糾紛的途徑——必須從改變政治着手，沒有政治上的徹底改革，現行租佃制度想使之合理化，殆不可能。比如本書列舉糾紛解決的程序說：「糾紛既起，情事既微者，尚能自行解決；但不論曲直，佃農例須請酒吃茶，案情重大者，則須調解。」其調解程序：(一)由糾紛當事人之一向鄉區調解委員會或鄉區長及士紳，用書面或口頭正式申請調解；(二)調解委員會或鄉區長及士紳接受調解，規定調解時日，以書面通知或牌示或口頭通知當事人；(三)屆時由調解委員會或鄉區長及士紳同當事人，共同調解仲裁之；(四)業佃自動履行仲裁所決定之一切和解條件，而不能強行執行。此種處理辦法，為時雖短，但當事人每當請求調解時，亦「須先在指定地點購買禮券一張，價格三元至五元不等，憑券申請，則此券實是調解費收據之別名；至調解時，所需之茶資，公差之「草鞋錢」尤其餘事。」倘經此次調解未能解決，則移送法院。法院的訴訟程序，「最少非三四月不可，而所需費用，如(一)審判費；(二)送達費；(三)抄錄費；(四)執達員食宿費，為數極大；故無論在時間上，金錢上，均非佃農所能負擔。」且無論調解也好，法院起訴也好，在事實上，勝訴多屬地主。本書第十章第三節會這樣敘述：「蓋在鄉區主持調解者乃地主階級之代表，佃農在權威下，惟俯首帖命而已。其在法院起訴者，地主之法律知識較佃農為高，又較善巧詐；且有實力延聘律師為之辯護，其勝訴機會，自較佃農為多。況法院審判乃根據書面租約所規定；而此種租約之成立乃地主片面制定，佃農對其程度極低，多有不識字者，不知計較租約之利害，蓋即已簽押章，便無法脫離約束。」換句話說，在現勢下，從法律到政治構成，均不利於佃農；而佃佃制度臻於合理途徑，當然不可能。

法院起訴者，地主之法律知識較佃農為高，又較善巧詐；且有實力延聘律師為之辯護，其勝訴機會，自較佃農為多。況法院審判乃根據書面租約所規定；而此種租約之成立乃地主片面制定，佃農對其程度極低，多有不識字者，不知計較租約之利害，蓋即已簽押章，便無法脫離約束。換句話說，在現勢下，從法律到政治構成，均不利於佃農；而佃佃制度臻於合理途徑，當然不可能。

實現一種合理的經濟制度，必須以合理的政治制度為其前提，這合理的經濟制度才不致落空。作者對此，無疑的，是不會注意的。正因為作者把改善租佃制度於孤立起來，在結論上，自難免留下大漏洞，落於紙上空談。

總之，就階級方面說，這書提供的材料和可歸接觸的問題，均較為廣泛，不過值得商榷之處，仍不少。自然，最理想的調查研究，不把它僅僅歸於階級的假定上，進一步，從動態方面蒐集材料，證明問題，在估價上，在結論方面，當更為確切，深入。比如，對佃農的估價：究竟佃農是屬於農村中上升的階級？抑或是下降的階級？佃農中的中農、貧農都是上升或下降的階級呢？抑或佃農中某一階層是上升了某一階層是下降的階級？凡此，都未盡顯態的假定可能說明的，必須從動態方面蒐集材料，再依據這些具體的材料加以說明。這是動態研究的一例。僅就這樣的例子，證明從動態而蒐集材料，說明問題，是必要的，是更能顯顯顯顯顯的本質。這是我讀這書的一個總的意見。